

隨筆六種
1

奧斯維辛之後

邵燕祥

主編・林賢治



CITYU HK
PRESS

奧斯維辛之後

邵燕祥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編輯 陳明慧

書籍設計 蕭慧敏

排版 劉偉進



©2019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96-2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9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swiecim: Then and Now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396-2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總序	ix
前言	xiii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1
希特拉焚書六十周年	4
反法西斯（I）	8
反法西斯（II）	13
搞不懂啦，希特拉	17
獨夫心態——夜讀抄	22
白玫瑰：1943年的鮮血——夜讀抄	27
憑弔：在諾曼第海灘	36
遙望諾曼第	45
希特拉的伎倆——夜讀抄	49
又見卅字	52
五十年前孽債	54
讀斯大林的一封信	57

小朱加什維利	61
悼安娜·拉林娜	65
讀布哈林遺囑	68
卡廷紀念碑	82
以蘇為鏡	86
說起《祖國進行曲》	91
不安的靈魂歸宿何處？—— 讀高莽《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	100
歷史的感歎	105
三月五日斷想	110
重過莫斯科	116
政治色彩	154
「國際恥辱」	156
石溝的名單	158
百年創痛	161
對虎彈琴	165
「殺手無罪」論	168
飲食也有「武化」	171
從「俳句事件」說起——夜讀抄	174
遙遠的祝福	184
今日是何年	188

推薦《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	191
誰管誰	194
何必改詞	198
關於《人權宣言》——為《青年小百科》作	202
回答和不回答	206
不僅是美國的事情	211
看艾琳，說賣座	217
也談格瓦拉	221
擬外國故事	225
何必諱言「統治」	227
《愛因斯坦語錄》	232
陽光下的黑夜	236
為自由而閃耀—— 讀《自由星輝——世界猶太裔文化名人傳續集》	244
伯利恆之星	251
「波將金化」	254
首腦的睡眠	256
勳章的誘惑	260
高貴的屍體	263
同僚與冤家	267
戲說音樂	271

論醜聞	277
多少人想當國王？	279
一幅畫前的兩種愛國心——夜讀抄	282
都是過客	286
全斗煥盧泰愚功罪論	288
逸事與醜聞	292
老皮真逗	296
小議「跟屁蟲」	298
斯大林格勒站	301
國會大廈	306
示眾台	310
吃什麼好	314
畫中人	316
一樣的廣場	319
那遙遠的磨坊	324

總序

去秋，香港城大出版社的朱國斌先生和陳明慧女士過訪。席間，話及人文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朱先生深表贊同。及後，他邀我為社裏組織一套隨筆叢書，我便欣然應允了。

隨筆是我喜歡的文體。「筆」，是一種斷片式記錄，大約相當於姚鼐《古文辭類纂》中說的「雜記」，國外有人稱作摘記式短文。至於「隨」，放任無羈，所指無疑是一種自由的形態。隨筆的定義簡單明白，就是自由的記錄。沒有自由，便沒有隨筆。可以想見，隨筆是不安分的，嘗試的，探索的，總是置身邊緣。所謂「先鋒」，其實也是邊緣。隨筆不喜停駐於某一場域，卻喜深入交叉的小徑，其間榛楛弗剪，卻又沒有巴洛克式的那種繁複而華美的風格，而接近數學般的明晰。所以，雖然有作家用於記敘日常生活，如蘭姆（Charles Lamb），如阿索林（José Martínez Ruiz），但是更多的還是藉以承載思想，像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帕斯卡爾（Pascal Quignard）、培根（Francis Bacon）、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薇依（Simone Weil）、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等，直到魯迅，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隨筆型作家。

這裏的幾位作者，多年來一直從事嚴肅的寫作，隨筆是常用的形式之一。其中，邵燕祥和王得后是內地著名的雜文家，被譽為魯迅的「傳人」。邵燕祥給集子起名《奧斯維辛之後》，取意於思想家阿多諾著名的警句，肯定寫作的道義感。他認為，法西斯並不只是意味着極端民族主義，而且意味着專制獨裁、思想禁錮，意味着屠殺、戰爭、毀滅和死亡。因此，它也就不只限於德國、意大利，不限於 20 世紀，而是切切實實地延續並威脅到 21 世紀全人類的命運。作者強烈呼籲「反法西斯」者以此為鑑，他希望作為一個口號，不至於在代際傳遞間中斷。王得后的《刀客有道》返回中土，直接取材於周遭的社會現實。說市民，說師友，說自己，全書似乎沒有一個集中的主題，字裏行間，卻無處不響應着同一的脈搏，就是新與舊的鬥爭。就連魯迅，在書中也非「過氣」的人物，而以其獨有的姿態，參與到實際的變革中來。趙園和錢滿素同為學院中人，隨筆的材料多來自各自的專業，態度卻並非純學術，沒有絲毫陳腐的學究氣息。趙園的集子就叫《讀人》，很大篇幅述及中國皇權專制時代中魏晉與明清兩個最黑暗的時段，且及於當代「文革」，特別注重具有中國特色的家族倫理與文化心態，可謂洞悉幽微。而錢滿素的《覺醒之後》，則致力於政治社會制度的描畫，橫看成嶺，側看成峰，全方位展現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的形象。

彼敏別具心眼，讓《灰燼與記憶》重燃火焰。所涉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事件，包括閱讀種種，充滿隱喻，在人性道德的最高意義上，閃爍着詩意的光輝。把這樣幾個集子合到一起，古今中外都有了。

在叢書中，我加入了自己的一個集子，寫的是另類文化史：《地下寫作和秘密閱讀》。卑之無甚高論，唯書中保存的一點文化壓制的故實，或許還有一瞥的價值。

叢書作者的敘事各有不同，但是所關切的，都是人的生存境遇。人首先是個人，為自己而生存：安全地生存，自由地生存，有尊嚴地生存。事實上，如此合理的生存，卻不斷遭到合法性暴力的摧殘和國家神話的誑騙。正是基於共同的理念和認識，所以，納粹德國、沙俄和蘇聯，那些「中午的黑暗」，會成為叢書反覆述說的內容。作者都是有「歷史癖」的人，用魯迅的話說，是有「記性」的人。他們記住，而且要大家也記住，記住那許許多多的犧牲者、不幸者、被湮沒者，記住黑暗是從哪裏開始的，人們憑藉什麼樣的力量去驅逐它，直至一次次曙光重現。

歷史學家一再強調說，應當重視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關聯。唯有歷史，才能給我們目下的行動提供重要的依據；而且唯有它，才能為我們走向未來提供必要的想像力。所有的光榮與夢想，崛起與覆亡，都已在過往的時日裏作出分明

的昭示。因此，每一回顧，都將使我們在意識到重負的同時，增進對於人類自由、民主、正義與進步的信心。

出版社提議給叢書命名，我到底取了一個沒有名字的名字，叫「隨筆六種」。心想，猶如原木製作的家具，本色便好。

是為序。

2018，戊戌年大年初一夜

林賢治

前言

從 1985–2005 二十年間所寫 112 篇國際題材的隨筆中，選出這麼一本讀物，題名《奧斯維辛之後》，是因為德國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說過一句話，使我震驚，並久久難忘。

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¹

奧斯維辛是納粹德國二戰中在波蘭所設的集中營——死亡營之一，它的存在，象徵着人類的大災難。

一場大災難後，人們應該做什麼？阿多諾此語，出之於 1949 年，奧斯維辛剛剛封閉四度春秋；他必然是想到了，只有做一些什麼與消弭和防止大災難相稱的事情，才能避免未來再出現這樣的厄運。

從 1949 至今，又是將近七十年過去了，這位給我們敲警鐘的哲人已經不在，但是他這句話留下的聲波，依然震盪在我們心中。

1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是德國哲學家泰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語，出自他寫於 1949 年的〈文化批判與社會〉一文，1951 年發表，1955 年收入文集《稜鏡》。

在人類從野蠻向文明跋涉的千萬年途中，多少人為文明付出了勇敢、勤勞、智慧，付出了青春、心血以至生命。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珍惜這文明一脈，不戮力保護我們已經達到和保有的文明成果，抗拒一切要把人間拖回野蠻的意向和趨勢呢？

是的，不要忘記，我們生活在奧斯維辛之後，而且無可逃避地面對着奧斯維辛的殘留。

讓我們時時以阿多諾的這句話來互相提醒，也敲打我們自己吧。

2017年12月27日，於北京
邵燕祥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1985年5月，是戰勝希特拉（也譯：希特勒）法西斯四十周年。但是據說在某些「慕尼黑啤酒館」式的角落裏，還有把戰勝法西斯的節日看作哀悼日的人。

人的是非、愛憎、哀樂，其不同，有如是！

原來遺老遺少並不是我們獨有的「國粹」；納粹的第三帝國也自有它的餘孽。

今天的孩子們，也許已經不知道五十二年前柏林菩提樹下大街廣場上有過一個火光沖天的焚書之夜；¹也許只是

1 1933年，希特拉上台後，鼓動大學生「對抗非德意志精神」，統一思想。同年5月10日，柏林大學生自發於劇院廣場（Opernplatz，1995年更名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焚燒超過二萬本「意識不符」書籍，被認為是日後大規模排異化、屠殺猶太人的開始。

從影片《王中王》(*L'As des as*) 看過有關 1936 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軼事奇聞；也許完全不能想像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滅跡和克拉古耶瓦茨 (Kragujevac) 的血洗屠殺；也許對英格麗·褒曼 (Ingrid Bergman) 自述她在柏林不肯舉手高呼「萬歲，希特拉」，只不過付諸一笑；甚至就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50 歲以上的人，也把那些逝去的歲月僅僅當作過眼雲煙了。然而，卻不知世上至今仍有人哀納粹之敗亡，痛狂瀾於既倒，不勝懷舊，時唱挽歌呢！

德國作家沃爾夫 (Friedrich Wolf) 在希特拉上台不久後的 1935 年寫的劇本《馬門教授》(*Professor Mamlock*)，很早就曾介紹到我國來，由金山同志主演過。劇中的猶太醫生馬門教授在受到迫害以後痛悔自己原先對法西斯主義的猖獗漠不關心，留下這樣的警句：「在應該鬥爭的時候放棄鬥爭，就是犯罪！」面對十年動亂中封建法西斯的猖狂肆虐，每念及此，多少人曾經心弦震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今天是否還會麻木遲鈍，以致貽悔於將來呢？

德國納粹化不過十二年，而四十年後還有遺老遺少為納粹招魂。那末林彪、江青等前後為害十年，以野蠻的暴力和蒙昧的個人迷信，摧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影響至深且巨，如火延燒，如水滲透，能輕易地說餘毒業已肅清了嗎？

況且，文革的流毒中又纏裹着半個世紀以來的「左」的影響，還有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包括一百多年「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殘餘，並沒有廓清無遺。歷史的渣滓一時借助於「左」的載體，一時又作為對「左」的懲罰，多方面侵擾着社會政治生活，毒害黨風，銷蝕民氣！每個朝代，每一種被推翻的社會勢力，都有自己的遺老遺少。重要的在於我們要使今天的「七斤」和「六斤」²們腰杆挺直，徹底否定文革，肅清「左」的流毒，堅持開放和改革，不為一切的「風波」所動。

為此，必須讓今天和明天擔當改革主力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文革中適應篡改歷史和培育一代愚民的需要，中小學的歷史課都廢除了。不「知古」也必然昧於「知今」；一定要懂得歷史發展的趨勢，懂得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才能明敏地辨別新歌和舊曲，「左」調和正聲。這也是一件百年大計。在這方面，文教工作者和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有不可忽視的責任。

對青少年來說，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對教育者來說也一樣：歷史，是不能忘記的！

1985年4月1日

2 魯迅短篇小說《風波》裏的人物，小說裏人物以出生體重命名，祖母「九斤」，生兒「七斤」，孫女「六斤」，故九斤老太總嘆說「一代不如一代」。

希特拉焚書六十周年

1933年5月10日接近午夜的時候，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廣場上火光沖天，大約兩萬冊具有世界聲譽的德國和外國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

曾經滄海的今日讀者，也許以為兩萬冊書微不足道。把別的城市同樣景象裏燒的書加上，就不止兩萬冊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中引用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Joseph Goebbels）在焚書現場說的話：「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這次焚書發生在希特拉當總理後約四個半月，它是一個象徵，一個信號。

1933年2月27日發生了國會縱火案，第二天希特拉就利用此事，使興登堡總統（Paul von Hindenburg）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規定為了預防「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可以在「法律限度以外」，「限制個人自由，限制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制財產的命令」等等。所謂「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是指希特拉捏造的共產黨威脅，其實真也冤枉了共產黨；當時德共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曾把社會民主黨當作主要政敵，形成對納粹黨的實際支持。

1933年3月23日，德國議會通過所謂授權法——《消除國家和人民痛苦法》，拱手把立法權力交給了希特拉。這項法律規定內閣制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可以不同於憲法」。從這一天起，希特拉成為全國「合法的」大獨裁者。

接着，在納粹的大事記上，就是以焚書為標誌的文化納粹化，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把德國文化納入納粹的控制之下，不得越雷池一步。1933年9月22日，設立由戈培爾掌管的統一的德國文化協會，下設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新聞、廣播、電影七個協會，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必須加入有關協會，服

從管理。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開除出會或拒絕入會的人，生計也就被剝奪了。「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誰是「國家」呢？當然首先是希特拉、戈培爾，然後是他們的「文化」爪牙們。每一本書或者劇本的手稿，都必須先送戈培爾掌管的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者上演。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是個名叫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的失敗劇作家，他曾公開大言不慚地說，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像掏出左輪手槍來！——原來是一批仇視文化的「文化」官員。

每天早晨，柏林各報編輯和地方報紙記者齊集宣傳部，由戈培爾或他的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1934年內有一個時期，戈培爾和納粹的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都要求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一位魯莽的周刊編輯埃姆·韋爾克把這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刊乾巴巴。他的《格魯恩郵報》立即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他本人則被戈培爾撤職，送到集中營去了。

戈培爾親自主持的焚書大典是得到過狂熱的學生們的合作的。德國從小學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希特拉《我的奮鬥》一書被奉為「教育方面絕對正確的指南星」，所有

教師都得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拉」。

在科學方面，有個亞琛技術學院（編按：現稱亞琛工業大學）的威廉·繆勒（Wilhelm Müller）教授在《猶太人和科學》（*Jewry and Science*）文中把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當作「頭號惡棍」。柏林大學的路德維希·皮勃貝克教授，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萊納德教授（Philipp von Lenard）則說「這個猶太人」的「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於是他們大搞其「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了。

1934年8月，興登堡去世，軍隊支持希特拉把總理、總統、三軍統帥集於一身，第三帝國進入全盛時期。這時德國經濟復蘇，失業減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九成人表示接受這個恐怖的獨裁政權。

希特拉從1933年焚書到1945年焚屍——據《百科簡編》（*Micropædia*，也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希特拉和情婦自殺前「兩人遺囑死後均火焚」——不過十二年。從1945年至今，又是四個十二年過去了。雖於歷史的長河只是一瞬，我們畢竟經歷了很多，相隔六十年的時間和千萬里的空間，回首希特拉焚書的前前後後，多少看得會清楚些。希特拉者，固一世之梟雄也，而今安在哉！

1993年5月3日

反法西斯（I）

二戰結束那一年我 12 歲。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過了八年，耳目都堵得死死的。暑假裏日本投降，人們開始大聲說話，一下子出了不少報紙，書攤上也有了沒見過的新書。就在那時我知道了有個艾青寫了一本詩集《反法西斯》。最使我幼小的心靈震撼，不能自己的，是其中一首〈人皮〉。日本兵從一位中國農婦身上剝下皮來晾在中國的土地上。詩人發出了悲憤的控訴。

反法西斯！在當代，還有什麼口號能像這一聲，發自億萬人的肺腑，又引起億萬人的共鳴嗎？

後來，我常想，在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大張「法西斯」的旗鼓以前，法西斯現象早已存在了。歷史上一切對內專制鎮壓、對外窮兵黷武的，不就是法西斯麼——德意日軸心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祖師爺、難兄難弟或徒子徒孫，也就逕稱之為法西斯不是恰如其份麼？嚴謹的歷史學家也許不同意，可礙不着我們這麼說。

這一回去大連，我本無心訪古，卻還是隨着朋友們到旅順踏訪了日俄戰爭的遺跡。日俄兩國在我們大好的國土上鏖戰，兩萬多中國和平居民無辜見殺，還不算後來日本統治時期屠殺的數字。死者已矣，今天只剩一座萬忠祠作紀念了。

1983年夏，朔望先生和我先後過旅大。¹他留下一首《日俄戰爭炮台廢址口占》給我：

一艦從容出北東，海山爭碧異時同。斑斕殘壘遲兵氣，揚抑清歌失遠風。石柱欺天人子死，金州展野菽梁空。百年好景生岩電，欲過朱門哭萬忠。

1 編按：即現大連市；旅大市取旅順、大連各一字得名，旅大市先後被俄國日本佔領，1981年改稱大連市。

我步韻和了一首：

黃海西頭虎尾東，兩間寧與舊時同？雲橫水立吹秋雨，石破天驚唱大風。已拒虎狼千里外，曾經兵燹萬家空。斜陽多事歆殘壘，八十年都一望中。

十年一瞬，今年已是日俄戰爭九十周年，又恰恰是中日甲午海戰一百周年了。在不健忘的人來說，一百年前猶如昨日！

此番沒去萬忠祠。聽說最近又挖出一些遺骨，連同煙袋鍋子一類遺物；這些平民百姓的尋常物件，日本兵是不屑一捨的。在旅順博物館看到唐鴻臚井碑記的照片，原件據說至今仍存於日本皇宮。日本派遣軍裏是頗有一些內行與識貨的文職專家的。六十六米高的白玉山塔，是日本人1907年驅使兩萬多中國勞工所修建。不死於日本的槍口下，也還要在日本監工的皮鞭棍棒下為奴隸。登上用中國人的屍骨堆成的塔頂，四望海天蒼茫，回顧百年風雲，又憶起日本不斷有政壇人物呼號於上，右翼暴徒回應於下，篡改歷史，為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對中國人民、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所犯的罪行辯護、掩蓋以至推諉罪責……我不禁從心底罵出聲來：「法西斯！」

在我還不知道有法西斯一詞的時候，就知道什麼叫國恥了。一連串的國恥紀念日，標誌着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蠶食鯨吞，侵我國土，侮我人民；而近百年來

中國的國恥，除了北鄰相關的沙皇俄國以外，多與日本這個東鄰有關。日本對中國這般「關注」，中國人若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和囂張氣焰視若無睹，安之若素，豈不是太麻木、太窩囊、太沒出息了嗎？但大家記得 30 年代，東三省已經淪陷，而在蔣介石治下，深怕「友邦驚詫」，言抗日便是犯禁；《新生》周刊發表易水〈閒話皇帝〉一文，提到日本天皇，日本領事提出抗議，不得了啦，雜誌封門，主編（杜重遠）嚴懲，連聲道歉，敬請息怒。在本國人面前言出不二，做威做福的蔣介石，當年在日本人面前就是這樣誠惶誠恐，畢恭畢敬，惟恐哪點不周，得罪了東方法西斯。而中國的平民，已蒙國恥，不但不許抗爭，並且不許言恥，無異於為奴隸還要甘之如飴，滿臉陪笑；至少也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忘記歷史，背對現實，吞聲忍氣，唾面自乾：這真是恥辱中的恥辱，痛苦中的痛苦了。

明年，1995 年，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節日。在二戰中死去的幾千萬受害者是不會復活了，許多親歷者也已永別人間，倖存者和戰後出生的人們紀念這個節日，難道只是為了懷念半世紀前人民的勝利而重新舉一舉杯嗎？

不久前，日本自民黨人小粥義雄寫了一本讚揚希特拉之政治策略的書，名為《希特拉的選舉——戰略：現代選舉必勝之聖經》。雖據日本官員 6 月 15 日說，作者在受到國

際猛烈抨擊後已撤回這本書，但那作者及其同道們接過希特拉的衣鉢，企圖在現實中取勝的野心，豈能輕易地相應「撤回」麼？他們一刻也沒有忘記歷史，他們是自命法西斯的傳人的。

讓我們也重溫歷史吧！

讓我們重溫歷史。面對黃海，我忽然想，無論經歷過日本侵略的過來人，或是只從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接受過有關中日關係的正面教育的中青年和少年兒童，假如在了解若干年來日本某些人包括官方人士曾經怎樣為法西斯招魂之外，再有機會接受一番直觀教育，例如廣泛地觀摩一回當年日本自己拍攝的宣揚大日本侵略武功的故事影片和新聞紀錄片，就會如臨其境，感同身受，自己做出應有的結論。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業已放棄了向日本索取巨額戰爭賠償的權利；那末，我們放映一批老掉了牙的日本片子，也許不必花大量外匯去買放映權了吧？

1994年7月4日

反法西斯（II）

什麼是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最好的紀念？什麼是對戰爭死難者最好的悼念？就是：反法西斯！反法西斯！永遠的反法西斯！

20世紀快過去了。那在世紀上半葉給人類造成巨大劫難的法西斯主義的幽靈，至今仍然在小小地球上四處遊蕩。

我這樣說，不光是指新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某些地方選舉中獲勝，新納粹分子在德國某個城市遊行，日本某個內閣成員又在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也不光指一夥右翼極端分子在前南斯拉夫地區接受軍訓，準備攻擊德國本土……

按照法西斯經典、希特拉《我的奮鬥》(*My Struggle*, 德語 *Mein Kampf*) 一書的說法，只有日爾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級的人種」，有權進行擴張並主宰世界；他表明不會允許有「民主政治那種無聊玩意兒」，第三帝國將用「領袖原則」來統治；同時「人類在永恆的鬥爭中壯大，而在永恆的和平中它只會滅亡」，「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東西，就用拳頭來取」。

因此，以希特拉的思想主張為代表，法西斯不僅意味着極端民族主義，而且意味着專制獨裁，思想禁錮，意味着屠殺、戰爭、毀滅和死亡。希特拉這樣說了，也這樣幹了。

希伯萊文版《我的奮鬥》是 76 歲的以色列人達尼·亞龍 (Dan Yaron) 翻譯的，這位有心人認為要讓年輕一代了解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罪行，這本書是「一份重要的歷史材料」。希特拉留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則是他統治全世界的藍圖和樣板。1945 年這個位居波蘭的集中營解禁時，堆積着的死囚頭髮竟有七千公斤，有一些已經經過紡織，加工成背心和披肩。這個集中營裏毒死焚屍的猶太人、吉卜賽人，波蘭政治犯和蘇軍戰俘，各國抵抗組織成員和愛國者，不少於一百一十多萬。發生毒氣的罐裝粒狀含氰化學產品，是德國 Degesch 公司 1941 至 1944 年間出廠的；僅 1942 年至 1943 年，奧斯威辛的兩個集中營就使用了二十噸，而據

集中營司令官魯道夫·豪森 (Rudolf Höss) 後來供認，它所產生的毒氣每五至七公斤就可以毒死一千五百人！

不久以前，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製造的毒氣案件中，使用了「沙林」即學名甲基氟磷酸異丙酯的化學製劑，是一種高毒性氣體，有一毫克滴在皮膚上就能致命。它是二戰期間德國科學家發明的，曾經被納粹德軍用作化學武器。40年代，90年代；納粹，奧姆真理教——是這樣一脈相承的。

當我們聽說去年春夏盧旺達 (Rwanda) 持續三個多月的內戰和部族仇殺導致五十萬人死亡 (一說為有一百萬人)、上百萬人逃亡的時候，當我們聽說目前布隆迪 (Burundi) 也發生種族屠殺，目前已經有四百多人——主要是婦孺被政府軍殺死的時候，當我們聽說4月4日菲律賓南部的伊佩爾小鎮，慘遭二百名全副武裝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洗劫焚燒，至少有一百多無辜平民死於血腥屠殺的時候，當我們聽說包括許多靠詐騙、搶劫、走私毒品軍火、操縱賣淫業和洗黑錢而暴富者在內的俄國黑勢力，正如章魚觸角一樣伸向法國、意大利的時候……我們怎麼能不為形形色色種族主義、宗教和邪教狂熱、恐怖組織和恐怖行為感到震驚：各式各樣非理性喧嚷和暴力行為的陰影下，所庇蔭的不正是法西斯的土壤、衣鉢或變種麼？

世界並不安寧。假如我們在本世紀末不能清醒地面對導致法西斯或重演法西斯的災難性因素，人類的命運就沒有免除威脅，未來的 21 世紀就絕不會多麼美妙。

安理會就盧旺達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作出決議，在全世界範圍捉拿兇犯，交付審判。這代表了人類的良知。我們中國人當然更不會忘記，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我們有成千萬的軍民死難，單是死於南京大屠殺的就達三十萬人。五十多年過去，他們在天之靈還未曾安息，法西斯死灰復燃的危險一天沒有消除，他們是一天不會安息的。

「反法西斯」不但是我們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的口號，也是我們下一代的口號。

1995 年 4 月 17 日

搞不懂啦，希特拉

德國兩名歷史學家年前出版一本新書披露，納粹頭子希特拉在他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年代，曾經用數以千萬計的巨款，賄賂他麾下的將軍，換取手下人對他的唯命是從。

這是從廣州一家報紙的國際新聞中抄出來的。從前只知道無權的向有權的行賄，官小的向官大的行賄，這一回才發現希特拉如此的「不恥下賄」，比「劉備摔孩子——邀買人心」顯得更務實，大約也更加立竿見影了。這倒真是一新耳目的新聞。

不過，作為一個並非少不更事的讀者，看着這條新聞，總覺得有些搞不懂的地方，也許就是東西方的「文化(?)

差異」，或者逕直說，是我以中國的為官之道去揣想希特拉的馭下之方吧？

隨手把這條新聞抄下，方頭括弧裏則是我的感想和疑問：

來自「軍事歷史研究所」的烏貝茨爾和退休將軍弗格爾，在名為《服從便能致富》的新書中，根據納粹黨留下的機密檔案指出，希特拉每年動用他總值二千萬馬克的私人秘密儲備，收買他的得力助手，以保證他們對他忠心耿耿。【這沒什麼不明白的，連鳳姐都用她的私房錢收買平兒；只不知希特拉秘密私人儲備的來源？多半也是「公款」。而「服從便能致富」，當然指的是服從希特拉，但那麼多德國平民服從希特拉的結果，替他去打仗，化為炮灰，因對他服從而能得他財賄的，只是他的「得力助手」也就是得力的幫兇而已。】

其中大部分的款項都落入三千名德意志第三帝國年代的元帥和將軍手中，包括收取了八十八萬馬克的萊布將軍，以及分別收取了二十五萬馬克的倫德施泰特將軍（Gerd von Rundstedt）、米爾希將軍（Erhard Milch）、克盧格將軍（Günther von Kluge）和雷德將軍（Alfred Jodl）。【原以為只是「布施」給所謂身邊的助手，沒想到竟是三軍將帥，且竟達三千名之多！消息卻只點了這五位將軍的名，是不是因為他

們收受的數額最大？那末像他最核心的幹將、最親密的戰友戈林（Hermann Göring）、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戈培爾等等，難道所得倒少？戈林本是極富有的，戈培爾呢，是另有財源？要麼就是希特拉對他們已經不必用錢收買？還是在此項專款之外別有出賬？】

古德里安將軍（Heinz Guderian）更獲贈一幢位於西里西亞（Silesia）、總值高達一百二十萬馬克的物業，而曼施坦因元帥（Erich von Manstein）則妒忌古德里安得到的物業，於是要求希特拉同樣給他一幢位於奧德河（Oder River）的物業。【因為不可能三千將帥每人分配一套別墅，這可視為額外的恩寵有加，故引起別人的爭寵。消息中語焉不詳，那個曼施坦因元帥怎麼能像中國人要官那樣開口向希特拉要物業呢？無乃太赤裸裸了乎？要麼就是他同希特拉有不同尋常的「哥們兒」關係，否則豈不像綠林草寇分贓似的，希特拉的統帥部裏會演出這樣的鬧劇嗎？待考。】

希特拉通常會將賄款支票放入信封內，並在信封面上加印「德意志機密文件」字樣，當生日禮物贈予部下。【如果希特拉親自動手，那也真夠累的。「機密」不錯，「文件」云乎哉？】希特拉 1940 年戰勝

法國後，露骨地說渴望下屬完全受他支配。而他的參謀長恩格爾（Gerhard Engel）也引述希特拉當年的話表示，得到恩惠的將軍會感激希特拉，對他馬首是瞻。【贈送生日禮物，例如生日蛋糕，現在中國連大一點的賓館都視為常事了。希特拉不可能記得三千部下的生日，顯然是由辦事人員具體操作的。但得到最高統帥部送來的「文件紅包」，虛實相生，還是會令受之者感激得很，從而更加俯首聽命，希特拉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然而希特拉此舉須做得十分機密，不然三千名將帥發現這份恩寵人人有份，自然也就不稀罕了。不過，竊以為，希特拉這番苦心，其實是多此一舉，在納粹體制內，你希特拉權傾天下，一個人說了算，你要讓三軍將帥聽你的話，憑你的權力給他們加官晉爵就是，我們中國封建時代有句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難道你們納粹德國不是這樣？武將也愛錢，給他官階不就全有了嗎？那末，比起你送紅包來，一是「公事公辦」，他照樣領你的情，卻不留痕跡，後代史家也就不會出來考證你的「行賄」，二來他們在其位撈其錢，萬一失風，自負其責，一概與你無干。再說，找一兩個不是對你唯命是從、甘受支配的傢伙，殺雞給猴看，哪個不變得噤若寒蟬，惟恭惟謹，令行禁止，敬若神明？何需你一反常態，婆婆媽媽地私送紅包？】

拜讀以上新聞，我想，如希特拉這麼向自己的部下遍送賄禮，大不類他這個混世魔王之所為，或者說，替他着想，頗有一點跌份。難道一個如此專權的專制主義者，竟不擅於用他手中的黨政軍權來轄制部下，使之從消極就範進而積極效命，倒還要乞靈於金錢的小恩小惠嗎？搞不懂啦，希特拉！

2000年3月16日

獨夫心態

——夜讀抄

外國的書我讀得不多。關於二戰，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回憶錄中文版很晚才買到，倒是很早就讀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董樂山、李慎之等的中譯本，文革後期就內部發行了，借來讀過，對希特拉這人的真實情況，主要是從此書來的。

不久前重新翻翻，對希特拉敗績時要毀壞一切這一點，感觸殊深。

1944年8月25日，盟軍和法國抵抗運動部隊解放了巴黎。在這之前兩天，8月23日，希特拉下令毀壞所有巴黎

的橋樑和其他重要設備，「即使藝術紀念物遭受破壞也在所不惜」。時任德國西線 B 集團軍司令隆美爾元帥 (Erwin Rommel) 的參謀長的斯達派爾將軍 (Hans Speidel) 拒絕執行這一命令；這個斯達派爾是 1925 年圖平根大學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的哲學博士，不久前剛剛參與了 7 月 20 日謀殺希特拉的事件，他是所謂謀反分子，卻是幾乎僅有的逃脫希特拉懲罰的人。他後來揭露說，巴黎失守以後，希特拉馬上命令用重炮和 V-1 飛彈摧毀這座城市，但這個命令他也拒絕了。

幾個月以後，希特拉敗局已定，他在 1945 年 3 月 19 日下了一道「焦土政策」的總命令，要把所有德國的軍事、工業、運輸和交通設備以及所有的儲備統統毀掉，以免它們完整地落入敵人之手。他在向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長斯佩爾 (Albert Speer) 解釋這一決定時說：

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這種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必要考慮這個民族維持一個最原始的生存基礎的問題。恰恰相反，最好由我們自己動手把這些基礎破壞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民族，而未來只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俄國）。而且，在戰爭以後留下來的人不過都是劣等貨，因為優秀的人已經戰死了。

3月29日，元首希特拉信託的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下達了一道同樣野蠻的命令，旨在把德國東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國工人和戰俘在內，移至德國中部，而數以百萬計的人必須徒步行走。

假如希特拉和鮑曼的命令和其他補充指示等等全都付諸執行，那末數以百萬計的尚未死於戰爭的德國人也要送命了。

按照當時的各種「焦土」命令，必須摧毀的有：「所有工廠、所有重要的電力設備、自來水廠、煤氣廠、食品店、服裝店；所有的橋樑、鐵路和交通設備；所有的河道、船隻；所有的機車和貨車」。

這是要在盟軍來到之前，滅絕仍然存活的所有德國人的生路，這是要讓整個德國民族作他的陪葬；希特拉橫下一條心要在最後時刻自殺，他對他曾經表示無限熱愛的德意志民族繼續存在是心有不甘的。

德國人民能夠倖免於這一次最後的災難，除了因為盟軍進展神速使得這次巨大的破壞未能執行以外，還由於斯佩爾和一些軍官直接違抗命令，奔走努力，保證重要的設施不被那些死心塌地執行命令的軍官和納粹黨棍所炸毀。（按：這個納粹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部長、戰犯斯佩爾，因此在紐倫堡法庭上得免判處死刑，被判二十年徒刑。）

希特拉不但要毀滅別人之國，而且要毀滅自己之國；不但在發動戰爭時要制服敵國，而且在兵敗垂死時，恨不能把自己再也不能君臨的一切，毀壞得片瓦無存，寸草不生，人丁絕跡。真是徹頭徹尾的獨夫心態。

環顧中外古今，獨夫心態莫不如此，只有程度不同罷了。在中國，從「咸陽一炬」肇其端，打下天下，進得城來的，大掠三日，要燒要殺；失了天下，敗走之前，放他一把大火，我不能佔有，你也別想得到。像梁武帝那樣，只是在亡國之前燒掉自己珍愛的藏書，已經有點文縐縐的書呆子氣了。至於李自成逃出北京，大概過於匆忙，居然把紫禁城完好地留給了滿洲大清國。在西方和中東，暴君尼祿（Nero）縱火燒得古羅馬成為廢墟，歐仁·德拉克盧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名畫《薩達納帕爾之死》（*La Mort de Sardanapale*），則表現了被圍困宮中的國王命令太監殺死他的后妃宮娥侍從以及心愛的犬馬。這與項羽之殺虞姬，朱由檢（明崇禎帝）殺公主異曲同工。

希特拉命令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徒步大遷徙，不但使人想到了他曾把六百萬猶太人置於死地，而且使人想到斯大林把成千上萬的農民和少數民族趕出家園，流放到荒遠的邊區和極地，波爾布特（Pol Pot）把整個金邊城抖落一空，驅趕男女老少長途跋涉到鄉村，都造成大量的非自然死亡。

天下獨夫都不把人當人，自然不管人民死活，他們只顧逞一己的野心，而視人民如草芥，如兒戲，甚至妄言死一半人也不在乎，當然那前提是他享命萬歲，大權在握。可惜，即使權傾天下，叱咤一時，也還是人間的匆匆過客，不死於人，則死於天。世上水照樣流，草照樣綠，女人照樣生孩子，而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斯大林以至波爾布特等如今安在哉！

2002年8月12日

白玫瑰：1943 年的鮮血

——夜讀抄

他們是在斷頭台上被斬首處死的。真真正正的拋頭顱灑熱血。

他們是為世界上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而死的。

看着他們熾熱殷紅的鮮血在陽光中一路灑滿歷史，
41 歲的我眼中濺滿了 1943 年的淚。

2 月 22 日，那是個春天觸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還遠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們是為我而死的。

這是《永遠的白玫瑰》篇末激情的訴說。原作刊於《當代》今年第三期，作者虎頭，是一位北京的德語副教授，他在這裏敘述的是他不曾親歷的往事。往事並不遙遠，距今六十一年，在納粹統治的德國。

那「為我們而死的」是一對年輕的兄妹：舒和家的漢斯（Hans Scholl）和索菲（Sophie Scholl）。從來沒有聽說過，作者也是去冬旅居柏林時才知道的。

2003年11月28日，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專題節目「德意志俊傑」，評選德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十大名人。當場由觀眾電話評選（可以重複投票，但不能給同一個人投兩票）。

結果，在只有九千萬左右人口的德國，舒和兄妹得了五百萬張票；按得票數排名第四。當選的前三名是：一手領導了德國戰後重建的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一手創建了在全球擁有七億信徒的新教領袖馬丁·路德，一手奠定了共產主義理論基礎的哲學偉人馬克思。

在舒和兄妹——漢斯、索菲之後，依次是：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1970年在波蘭華沙反納粹起義紀念碑前驚天一跪，因此被視為德國人真正開始反思的代表），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創立了輝煌賦格王朝的樂壇領袖），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無論按什麼劃分都當仁不讓的世界文豪），約翰內斯·古丁堡（Johannes Gutenberg）（被視為德國現代印刷術發明者），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德國歷史上首次統一全國的普魯士帝國鐵血宰相)，愛因斯坦 (公認改變了人類宇宙觀的科學奇才)。

兄妹二人都是慕尼黑大學學生：哥哥學醫，妹妹學生物與哲學。

哥哥死時 24 歲，妹妹死時 22 歲。

他們是在 1943 年 2 月 22 日被處決的。

索菲在臨刑之夜睡得很香，她被叫醒的時候，坐在監鋪上講她剛做完一個夢：「我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抱着一個嬰兒去做洗禮。嬰兒穿着長長的白袍。到教堂必須通過一座險峻的山。我穩穩地抱着嬰兒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現了一道冰川深澗。我剛把嬰兒在身邊放下，就墜入了深淵，」她向同監號的犯人解釋自己的夢，「那個嬰兒就是我們的信念。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擋他成長。我們是他的開路人，但我們必將在他成人之前死去。」

下午四點到五點，在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的蓋世太保監獄 (Stadelheim Prison) 執行對她們兄妹的死刑。

先帶過來的是漢斯，他明顯地瘦了，但步履莊重，越過隔離線和父親擁抱，和每個人握手，囑咐問候所有的朋友，最後說到一個姑娘的名字，一滴淚出現在他的臉上，他隔着隔離線彎下腰來，不想讓任何人看見自己的眼淚。然後他就走了，像來時一樣鎮靜。

在行刑的一剎那，漢斯高喊一聲：「自由萬歲！」

妹妹索菲被看守帶來，她腰杆挺得像標槍一樣直。她滿臉灑滿陽光微笑着品嚐家裏帶來的甜食：「謝謝，我還真沒吃午飯呢，」她說，「多麼美麗的豔陽天啊！而我必須離開。可今天在戰場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麼多充滿希望的年輕生命……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喚醒千百萬人民，那我們雖死何憾？」「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媽媽說。「不過幾十年而已，」她輕描淡寫地說，然後加重了語氣：「我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媽媽再次對她說：「索菲，耶穌與你同在。」索菲堅定地、有點像下命令似地說：「還有你，媽媽。」然後她也面帶微笑，無所畏懼地走了。

他們為什麼能這樣視死如歸呢？

他們是在四天以前，2月18日被捕的。在他們被捕前兩天，索菲，這個美麗而弱小的女孩向朋友說過：

已經有如此多的人為了這個暴政而死，現在應當有人為了反抗這個暴政而死了！

也就在這一天，漢斯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走過太多的彎路。我知道，深淵正在我面前張開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圍了我求索的心靈——但我義無反顧地踏入深淵。想想克勞岱爾（Camille Claudel）的那句話吧：「生命，就是導向光明的冒險。」

他們對於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早已有了精神準備。

《永遠的白玫瑰》作者由此想起了中國的文天祥、譚嗣同，以及「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的渣滓洞的烈士們：「因為無知所以無畏的人到處都有，但舒和兄妹卻是因為有知所以無畏。」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要有怎樣堅定的信念，才能讓舒和兄妹超越這種植根於基因中的（對死亡的）恐懼？」作者回答：「那是信仰。——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納粹這樣的暴政沒有理由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存在。」

他們與納粹不共戴天，這種憎恨之情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相反，他們都曾狂熱地信仰過納粹。希特拉 1933 年上台以來的十年，正是他們的成長期；漢斯 15 歲就加入了希特拉青年團，索菲 12 歲時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聯盟，他們熱切地參加納粹組織的一切活動，並因他們的熱情和創造力而先後成為這兩個組織的佼佼者。

但戈培爾式的欺騙，能夠蒙蔽人於一時，卻終要在事實面前露出破綻而破產。許多納粹的倒行逆施本來已經使漢斯對納粹的信念開始動搖；1942 年假期，漢斯奉命去俄羅斯戰線的德軍野戰醫院實習三個月，橫飛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使他徹底認清了納粹的實質。

回國後，面對着納粹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還有發生在身邊的一系列事件：以吉他伴奏彈唱俄羅斯和挪威民歌被禁；讀茨威格（Stefan Zweig）《人類群星閃耀時》也被禁；一個敢於說真話的年輕老師失蹤……這促使他從思考中得到了一個嚴重的結論：沉默服從納粹，就是納粹罪惡的脅從犯！思考之後，他又感到了胸中塊壘不吐不快。

漢斯決心不做「沉默的脅從犯」。於是在 1942 年夏，盟軍大規模轟炸科隆之後，就有了亞歷山大·施摩賴爾（Alexander Schmorell）和漢斯·舒和第一次印發的傳單，亮明自己的立場，反抗納粹暴政和爭取個人自由！

第二號傳單揭露納粹屠殺三十萬波蘭猶太人的暴行。

第四號傳單：

從希特拉嘴裏說出的每個字都是謊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納粹邪惡存在的人，他們遠遠沒有理解這場戰爭的背景……我們必須在邪惡最強有力的地方攻擊它，這個最強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拉的權力！

這些挑戰希特拉權力的年輕人，成立了自己的反法西斯小組：白玫瑰。

第六號，也是最後一期傳單，是由庫特·胡伯教授執筆，舒和兄妹散發的：

「自由與尊嚴！」

十年了……（希特拉及其同夥）剝奪了德國人民所有物質和精神上的自由，毀滅了德國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礎……同學們！德國人民在看着我們！他們在期待着我們！我們要……摧毀希特拉的暴政！

在他們的傳單中，他們甚至預言了當今歐洲統一的基本原則：

新歐洲的基礎是：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護國民不受國家暴力的任意欺凌。

整整六十年之後，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主持起草的《歐洲憲章》中，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這些話。

1943年2月18日，從天上紛紛揚揚地飄下瑞雪一樣的傳單時，慕尼黑大學的守門人衝上屋頂抓住了舒和兄妹，連同他們包裹沒有撒完的傳單。

2月23日，舒和兄妹被押上斷頭台的次日，納粹喉舌《慕尼黑新聞》幸災樂禍地寫道：

這些不知改悔的反動案犯在房屋上刷寫反國家的口號並散發陰謀顛覆國家的傳單，不知羞恥地對德國人民的武裝力量和德國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

納粹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在舒和一案中還株連了八十多人。他們或是小組的中堅，或是周邊，有的只不過是熟人而已。這些人都被逮捕，被嚴刑拷打，被判處徒刑，甚至也被處死。然而沒見任何文字材料表明他們中有人反咬舒和兄妹以圖減輕自己的痛苦。

《永遠的白玫瑰》作者由衷地讚揚說：

這就是「Zivilcourage」——普通民眾不畏威權反抗一切壓迫的那種以卵擊石、響遏行雲的勇氣。我把它翻譯成「平民勇氣」。

在納粹殺害舒和兄妹和他們的同志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Christoph Probst）以後的八百天，僅僅八百天，希特拉走到了他的末日。在呼喚德國人民覺醒，清算納粹罪行，特別是在戰後廢墟上重建一個繁榮德國的日子裏，人們會發現漢斯、索菲及其同伴們的血沒有白流。

讀到作者對這件我們過去全然不知的史實的激越的複述和思辨時，我忽然想起魯迅在為劉和珍跟她的年輕同學喋血而寫的一系列出離憤怒的文字。他曾這樣說到死屍的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魯迅這話，說了八十年了。今天依然令人感到沉重，也許僅次於死屍的沉重吧。抄書至此，憮然而歎。還是請讀者親自去讀《當代》上的新篇和《華蓋集續編》裏的舊文。

2004年5月17日

憑弔：在諾曼第海灘

到諾曼第去。

從巴黎向西，有很長一段路與塞納河同行，車行左岸，河水向西奔往出海口。

過盧昂城而不入，說好歸程再來，瞻仰法蘭西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紀念地，她是在此遭受火刑的。

諾曼第！諾曼第！這個遙遠的地方在我童年的記憶裏，是個響亮的呼喚。它與「登陸」兩個字聯在一起，與打敗希特拉聯繫在一起，也與結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聯繫在一起。

那是 1944 年，臨近我小學五年級的暑假，在日本佔領的淪陷區報紙上，頻繁地出現諾曼第的戰況。平時沉默整天沒話的父親，披閱報紙眼睛不時地發亮。

我們毋須到諾曼第西北角瑟堡的「戰爭紀念館」去。我們就在卡昂城北面阿羅芒什那一帶海灘下車。

天陰沉，一陣一陣的毛毛雨。低空的雲壓在粗礪的海灘上。這是法國 5,500 公里海岸線的一段，生死攸關的一段；位於跟英國隔海相望的法國西北角。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¹ 的水，此刻共長天一色，如滿布的雲似的灰沉沉。

五十八年前的 6 月 6 日，那是歷史上稱為 D 日（D-Day）的進攻日，從午夜到拂曉，也是這樣陰霾的天氣，而空中有更狂的風，海上有更惡的浪。

那年 5 月裏有十八天好天氣，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統率的盟軍卻按兵不動。

好一段時間，英美最高司令部在諾曼第之東、法國東北角加萊海峽（多佛海峽）² 部署了一系列虛張聲勢的行動以迷惑敵人，完全符合「聲東擊西」計策的原旨。1940 年英

1 拉芒什海峽即英吉利海峽（也譯英倫海峽），為分隔法國和英國的海峽。「拉芒什海峽」譯自法語 La Manche，「英吉利海峽」則譯自英語 English Channel。

2 加萊海峽即多佛海峽（也譯多佛爾海峽），為拉芒什海峽的最狹窄處。「加萊海峽」翻譯自法語 Pas-de-Calais，「多佛海峽」則翻譯自英語 Strait of Dover。

法軍隊的鄧寇克（Dunkirk，也譯敦克爾克）大撤退就選在這裏通過了最窄最近的海峽。因此，德國不是無緣無故在此配置了重兵，實力最強的步兵師和裝甲師。

諾曼第的德國防線也是嚴陣以待的。沿着海灘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個個烏龜殼式的地堡，克虜伯公司製造的大炮依然冷冷地盯着海上，但這時已沒有炮彈，更沒有操作大炮的日爾曼士兵，炮口就像驚愕得下巴掉了環，失神地張着嘴啞然愣在那裏，碉堡上彈痕斑斑。

當時可不是這樣的。關於盟軍可能於6月6日至16日之間登陸的情報，關於登陸地點可能在加萊海峽的判斷，以及希特拉屢次「注意諾曼第」的提醒，固然都是統帥部裏的事情；而每個碉堡裏的一組德軍，不管意識深處誓死忠於元首希特拉，還是不那麼死心塌地，也都只能夙夜匪懈提心吊膽地守在炮位上，等待着最終或是當炮灰或是當俘虜的命運降臨。

他們甚至不會知道，上級認為天氣惡劣，沒有跡象表明進攻「迫在眉睫」，不會知道駐防諾曼第的軍團司令下令暫時解除經常戒備狀態，不會知道德國海軍因為風浪大，撤回了在海峽中巡邏的船隻，也不會知道德國空軍偵察機已經飛不到英國南部海港，而在那裏，大批的盟軍正在靜悄悄絡繹登船……

我是許多年後，從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才得知這一切的。

而龜縮在諾曼海灘碉堡裏的德國陸軍士兵們，則在1944年6月6日拂曉，親自承受了這一串事前都秘而不宣的歷史性動作的後果：

千船齊發，越過風急浪高、霧雨昏瞶的海峽，向諾曼第一線如潮逼來。猛烈炮火掩護着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的盟軍從艦船登上卵石圪塔的海灘。

在這之前，凌晨時分，兩個美國空運師和一個英國空運師，兩萬人已經在諾曼第德軍戰線側翼的後方安全着陸。

希特拉妄稱「大西洋壁壘」的防線，幾小時內就突破了。

這幾小時是你死我活的短兵相接，茫茫霧雨纏裹着血肉橫飛。

我們現在腳下這一帶是英國軍團和加拿大軍團楔入地段，美國軍團的橋頭堡在西邊的奧馬哈海灘和猶他海灘。

一年以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登陸後，節節勝利的美國驍勇善戰的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這一回作為美國第三軍團的司令來了。後來就是這位坦克將軍，對諾曼第地區的德軍進行了大包抄，在攻克了西南方的阿弗朗什以後，回師東南，直指巴黎。這是後話。

直到6月6日下午4時55分，在酣睡中沒人敢於打擾的希特拉終於一覺醒來。他下令對盟軍的「灘頭陣地必須在今晚肅清」。這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當時，美軍已經在兩處海灘，英、加已經在一處海灘取得立足點。而且果然像希特拉所擔心的，盟國的後續部隊正繼續由海空登陸。

6月10日，蒙哥馬利將軍(Bernard Montgomery)報告說，他已經完全在海灘站穩腳跟，可以接受視察了。於是，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和美國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分別登上了英國和美國的兩艘軍艦，順利穿過英吉利海峽前往各自部隊的陣地。蒙哥馬利的部隊已經深入內地七八英里了，他的總部設在離岸大約五英里的一個鄉間別墅。這一天天氣好極了，據邱吉爾回憶，肥沃的土地上到處是黑白花色的奶牛，在陽光下或走或臥。當時居民熱情地向他們招手。

邱吉爾驅車或漫步在這狹長的佔領地，看到沿着海岸線，大量船艦延伸了五十多英里，都得到有效的保護。他在保衛阿羅芒什港（就是此刻我們腳下這一帶）的海軍上將維安(Philip Vian)陪同下，觀看了英國戰列艦和巡洋艦近距離炮轟德軍陣地，炮擊從容不迫，連續不斷，敵人沒有反應。邱吉爾對維安說：「既然已經這麼近了，為什麼不在回家以前再打上幾炮？」其時距離只有六千碼（約五公里多點），在敵軍大炮的射程之內，他們向寂靜的海岸開火，然

後快速駛離。德軍卻沒有回敬一炮。邱吉爾寫信給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說：「我多麼希望你也在這啊！」

從6月6日以來，頭六天中，盟軍已有326,000人，54,000輛車輛，104,000噸物資在諾曼第登陸；從6月9日起，戰爭主動權已經落在盟軍手中，到6月11日，盟軍已建成了一條連續的戰線。

儘管這樣，而不但最初在諾曼第海灘，就是在諾曼第地區的腹地，在塞納河和橫互法國中部的盧瓦河之間，且戰且退的德軍仍在頑抗，戰鬥依然極其慘烈。直到8月25日，法國第二步兵師和美國第四步兵師攻進巴黎，當時法國抵抗運動已經基本上控制了巴黎市區（法國地下武裝起義了，警察也罷工了，巴黎警察總局已被愛國者佔領）。

我在巴黎榮軍院的二戰紀念館和蓬皮杜文化中心陳列的攝影作品中，都看到了巴黎解放時傾城狂歡，入城式時迎接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的照片，一片興高采烈，在那歷史的時刻，所有的樓窗都打開了，所有的街道喧嘩着，所有的手臂舉起來歡呼。

諾曼第登陸不僅打開了解放巴黎的通道，也打開了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通道。我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諾曼第海灘癡望那陰雨中顯得平靜而凝重的海水，遠方，對岸，什麼也看不見，此時連一隻海鷗的影子也沒有，俯首拾起兩塊卵石，覺得應該帶回去留個紀念，這是地老天

荒經受過大西洋或北海的潮水衝擊和磨礪，永世默默無言的卵石——它能證明什麼，它能紀念什麼？

從平地漫到丘陵上的野草，在雨中顯得濕漉漉的，從1944年那個夏天，已經五十八個春秋，一歲一枯榮，也綠過了五十八遍；當時地面上雨水中草葉樹根沾染過的，有盟軍的來自遠方的年輕士兵的血，也有德國步兵的血，濡染過，滲透過，卻也早就在時間裏風乾，在大地上滅跡，在歷史的字裏行間，漸漸消逝為淡淡的血痕。夏伊勒的筆一下子就把諾曼第的戰爭隨手帶過，轉去寫富於戲劇性的一幕——「德國內部謀害希特拉的嘗試」，1944年7月20日的高級軍官謀反案了。

諾曼第漫長的海灘上，不僅留下了德軍堅固的炮台地堡，更留下一片一片十字架，盟軍陣亡將士墓園。據說其間也有德軍死者的墓地。

除了我們，四顧無人。除了細雨打在傘上，萬籟靜謐無聲。

當時敵對雙方成千上萬的指揮官和士兵，共同書寫了這一頁諾曼第戰史。

這一頁戰史的作者今天在哪裏？

這一頁戰史的讀者今天在哪裏？

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應有的眾多讀者在哪裏？

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歷史應有的眾多讀者在哪裏？

用生命有意無意地寫着今天的歷史的人，還顧得上重溫細讀昨天的歷史麼？

終於遠遠開來一輛小車，從車上下來一個人，穿着灰色的雨衣，走上那邊山坡，經過草叢灌木匆匆走過來了。他像是比較熟悉這一帶的路徑，逕直地無所顧盼地走過來。看清了，一個五十多歲左右的中年人，戰後出生的一代，他顯然不是當年這裏戰役的參加者，不是二戰的親歷者。他的臉色嚴肅而陰沉，從我們身邊走過，原想跟他打個招呼，卻沒說出什麼。他走上去又走下去。他肯定不是一般的遊人，他是有目的而來的。那末他是在憑弔先人，溫習寫在海灘和坡地上的歷史，或者是個研究軍事史的學者來作田野調查，誰知道？等我們在一座德軍地堡頂上的平岡照過相，遠遠看到這個沉默的孤客，他發動了車，又匆匆而去。

離岸不遠處，石座上停着一輛盟軍的坦克，是諾曼第登陸二十八年後，上世紀 70 年代從淺海打撈出來的。它以特殊的角色身份留在這裏。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海灘、灰色的濛濛細雨、灰色的雙十字架……只有並列的旗杆上高懸着的法國紅白藍旗、美國星條旗、英國米字旗、加拿大楓葉旗，是於草樹的濕綠外僅有的鮮明顏色，但有雨無風，旗幟都黯然下垂，彷彿在為

諾曼第登陸中的犧牲者默哀；也許到了雨過天晴，來自大西洋的暖風輕拂時，這些國旗才會招展起來，表達當年反法西斯勝利者的歡悅吧。

半個多世紀在擾攘中過去了。這裏已聽不到立體戰爭中鋼鐵的轟鳴爆炸電波的呼叫人的吶喊，看不到熾烈的火網閃電的信號翻滾的濃煙，嗅不到 TNT 硫化物令人窒息的火辣辣臭味和其間濺起的動物血腥……往昔的風雲甘於寂寞地退場，隱入時間深處，讓位給後來者。只是隨處樹立的一些石料的、水泥的碑碣坊柱任我們一路打量，都簡潔、樸素、不渲染、不張揚。歷史彷彿很自信：有人會遺忘，有時會遺忘，但不會是所有的人永遠遺忘。

雨停，我們也將離去。同來的數學家文森，是生在巴黎長在巴黎的巴黎人，40 歲了，他說他第一次到這裏來憑弔戰場，他說他還要再來。我們在停車場看到兩輛大客車，成隊的中學生來了，該是到這裏上歷史課吧，今天 6 月 20 日，星期四，不是假期。

2002 年 8 月

遙望諾曼第

2004年6月6日，在法國的諾曼第海灘，盛典紀念了諾曼第登陸六十周年。

對遠在東方的我們中國讀者，這是一次回顧二戰往事的機會。在歷史面前，在成百上千萬二戰犧牲者面前，所有良知的弦都為人類的和平而顫動，這時夾雜着一聲兩聲不諧和音，卻讓我又想起冷戰時期的宣傳。

戰後不久，就聽說一則謎語：問什麼是打敗日本的決定因素？打一人名，謎底卻有兩個，一是「屈原」，指美國投擲原子彈，一是「蘇武」，就是說蘇聯紅軍出兵參戰。明

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和非此即彼的單線思維，使猜謎的人各執一詞。但為什麼不設想，在各國軍民抗戰的最後一刻，是這兩者雙管齊下，給予日本侵略者致命的一擊，促令日皇要求無條件投降呢？

這則謎語帶着中國特色。在隨後的冷戰格局中，涉及二戰歷史時，對諾曼第登陸這一戰役的評價，就往往以更具學術化的面目出現了，那就是：舉出斯大林格勒¹戰役，來貶低諾曼第登陸的意義，從而宣傳蘇聯在二戰中損失最為慘重，貢獻最為巨大，是反法西斯的「頭功」，是世界的解放者，而別的國家好像都只是被解放者，美國則不過是伺機在戰爭中大撈好處罷了。

這樣的觀點，在我們這兒曾經佔統治地位。

戰後出生的人會覺得那一頁歷史過於遙遠了，除非應付考試，不想深究。我並沒有親歷戰爭，但畢竟保持着童年的記憶：那時在淪陷區，似懂非懂地跟着長輩念道斯大林格勒和諾曼第，對在遠方為反對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而浴血奮戰，而獻出生命的各國軍民，充滿了感激之情，跟對國內正面戰場和敵後抗日軍民的感情完全一樣。

1 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位於俄羅斯南部的一個都市，原名察里津，1925 年改名斯大林格勒；1961 年再改名伏爾加格勒 (Volgograd)。

後來多少涉獵歷史教科書，知道蘇聯在 1941 年夏天以前，盲目認定希特拉會信守互不侵犯條約，而對西線戰事採靜觀態度；待遭受納粹德國突然襲擊，深陷困境，當年秋天便呼籲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但因日本在東線發動太平洋戰爭，大大牽掣了盟軍的兵力，第二戰場遲遲未能開闢。1942 年夏，納粹德國在蘇聯發動新的攻勢，集中主力進攻伏爾加河畔名城斯大林格勒，企圖由此南下高加索，掠奪石油資源，同時北上包抄莫斯科。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城內巷戰中遭到逐屋的抵抗，同時遭到紅軍重兵的包圍，1943 年春，三十三萬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全部被殲，最終阻止了德軍的東進。1944 年的諾曼第登陸，是盟軍經過長期準備，「只准勝，不准敗」的背水一戰，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水陸兩栖登陸戰役，盟軍傷亡一百二十二萬人，共殲敵四十五萬；此役開闢了從西線長驅直入結束戰爭的勝利道路。這就是歷史。但蘇聯認為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僅是蘇德戰爭的轉捩點，更是二戰的轉捩點；卻不承認諾曼第登陸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而認為僅僅是一個局部性的行動。這不能不說是意識形態遮蔽下的偏見。

這種偏見的影響，不能說已經隨着冷戰的結束而完全澄清了。

法國卡昂紀念館歷史學家斯特凡·西莫內認為：蘇聯以前一直認為盟軍是「故意」推遲開闢第二戰場；認為蘇聯

在對法西斯「單獨作戰」中取得的勝利已決定了戰爭進程，1944年開闢第二戰場沒有多大意義了，他說，「兩年前，卡昂紀念館在莫斯科舉辦諾曼第登陸展，我們發現莫斯科人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蘇聯紅軍在二戰中犧牲了九百多萬，僅斯大林格勒一役就死了五十萬平民！」斯特凡·西莫內博士以平常心說，「不可否認，諾曼第登陸是艱苦卓絕的偉大戰役，但它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只是『一滴水』。」（按：說是「一滴水」又未免過謙了吧。）

有一個傳說，在十年前，法國紀念諾曼第登陸五十周年時，曾擬邀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最終卻由於上述的歧見而取消了。

法國這次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盛典，普京欣然前來，意味着俄羅斯對諾曼第登陸意義的肯定；而東道主的姿態也表明，歐洲同樣看重二戰中蘇聯軍民的貢獻和犧牲。

這是對冷戰思維的告別。

偏偏就在這時，我國的個別專家不是在學術爭鳴的講壇，而是在大眾傳媒上，面對多數缺少二戰史常識的受眾，說什麼從諾曼第登陸的時間和作用來看，「倒是難以排除『出場打死老虎』、『搶奪勝利果實』的嫌疑」。這樣的老調，是應該由歷史學者來重彈的嗎？

2004年6月10日

希特拉的伎倆

——夜讀抄

從晚報上讀到新華社專稿，趙卓昀先生報道了希特拉的一件舊事：1939年，阿道夫·希特拉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的同時，設立了所謂神學研究中心，篡改《聖經》，不但把所有關於猶太人的內容大砍大刪，把「摩西十誡」改成了「納粹十二誡」，更抹去耶穌的猶太人身份，篡改為跟德國人一樣的「優等民族」雅利安人。

這本納粹版《聖經》改名《德國與主同在》，跟希特拉自傳《我的奮鬥》並列為當時德國人必讀的兩本書。這還不夠，1941年又送往當時納粹統治下歐洲各地的教會，推進教會的納粹化。

在希特拉以納粹意識形態進行精神控制的進程中，連在教堂裏吟唱的讚美詩也難以倖免，因而在頂替《摩西十誡》的不倫不類的《納粹十二誡》中，塞進了「尊敬你的元首和主人」和「快樂地為人民工作和犧牲」就不奇怪了，前者是要你做「元首和主人」的恭順的奴才，後者是進一步要你去為「人民」（應讀為元首和主人）作「犧牲」，並且是「快樂地」！

讀到這則報道，感到似曾相識。原來這並非希特拉的首創，早在十四世紀中國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就這麼幹過。古代中國的孔孟之書，就是當時的聖經賢傳，而朱元璋看不慣孟子書中的一些話，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便充分動用他手中的皇權，加以大砍大刪，不能禁絕之，乃以《孟子節文》行世。我讀古書不多，這件軼聞，是二十年前從高旅先生文中得知的。

難道希特拉讀過中國野史、清人筆記，從那裏找到了學習的榜樣嗎？當然不是。僅由這一件看似雷同的小事，就見出古今中外大權在握的獨夫寡頭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這些權力者相信自己掌握的權力，要用這份權力控制人們的心理、思想、感情等全部精神世界。他們想望的，是

登高一呼，天下回應，萬眾臣服，眾口一詞。希特拉覺得《聖經》妨礙他消滅猶太人的大計，朱元璋覺得《孟子》有些話挑戰他的權威；他們不是不想從根本上把《聖經》、《孟子》消滅，但大獨裁者的希特拉也無法在一夜間改變德國人以至全歐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心毒手辣的朱元璋也無法完全消除「亞聖」孟軻在讀書人以至老百姓中的影響，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個是不能消滅就「納粹化」，一個是不能消滅就加以刪節，總之是篡改吧。那些統治者最怕的是遭遇異己者的「篡權」，但他們對形諸文字的異己思想，卻又動用「篡改」的刀斧。一個「篡」字，幾重意義，因人而異，功能不同。

然而，這樣由上而下雷厲風行的篡改，收效怎麼樣呢？據說這本 1941 年由德國魏瑪一家出版公司印刷送往歐洲各國的納粹版《聖經》，戰後多半已被銷毀。引起這一話題的，是最近偶然發現了其中的一本。至於明版的《孟子節文》，世上不知還有存貨否也。

寄語當下熱心收藏的朋友們，請留心中外古今篡改歷史、篡改歷史性經典的各類版本，大多數人會嫌惡而唾棄之，但它們作為文物，肯定是會在收藏品市場上不斷升值的。

2006 年 8 月 9 日

又見卐字

大家都知道納粹黨黨旗和納粹分子臂章上有個卐字。¹ 它成為兇暴、殘酷、屠殺和滅絕人性的標誌。

讀蕭乾老人在《深圳風采》上的一篇文章，說卐字本身是無辜的，它出自梵文，據說在 12 世紀由一些印度人帶到中歐，後來常用來作器皿上的圖案。1889 年，波蘭一個圖書館員辦的一次展覽，三百多種展品上有卐字作裝飾，有的還刻在武器上。

1 又，請注意！卐字之外，還有一個卍，這兩個符號不可混同。卐是納粹符號，卍字讀「萬」，在中國是帶有佛教色彩的吉祥如意字符。

到本世紀 30 年代初，納粹黨人硬把它當作雅利安人的標記，印上他們的黨旗和臂章。千千萬萬無辜的人其中有幾百萬猶太人就是在卐字下慘遭殺害。

卐字雖無辜，納粹歹徒們卻讓它浸滿了血跡。這個卐字也隨着納粹一夥為人類唾棄了——蕭乾這樣說。

但就在我讀過老人這篇文章後不久，發現這個被人唾棄的卐字又出現在中國，在北京，在一個叫作「菁華公司」的櫥窗和貨櫃上；而且這種帶有卐字元號的徽章、飾物、制服等等，據說「貨源充足」！

這是在電視中曝光的；另據廣播揭露還有一家餐館裏張掛着希特拉、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的肖像。

怎麼法西斯的幽靈又遊蕩到我們的首都來了？

這一切發生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後不久，能不令人深思？

這個卐字顯然不再僅僅是一個由梵文演化出的無辜的圖案，而是一種極端思想、一種暴力傾向、一種惡勢力的象徵。

卐字不僅僅是個卐字。

卐字是看得見的，帶着卐字的衣物、「紀念品」都是摸得着的，卐字的商標取締並不難。

可還有看不見、摸不着的，改了裝、半改裝或全未改裝的納粹——法西斯主義精神遺產在尋找着傳人？

1996 年 2 月 16 日

五十年前孽債

《諷刺與幽默》刊出華君武漫畫，題詞說：

據北京（市）電台廣播：西單一小飯店公開懸掛法西斯戰犯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等頭像。中央電視台新聞：北京寬街一店公開出售舊德國納粹黨旗、徽章、勳章等。

此畫作於剛慶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後一年。

按：嚴格地說，為時尚不滿一年。又，上述西單小飯店張掛的肖像，聞尚有隆美爾、山本五十六云。

而〈二戰孽債今日算，法一前部長面臨審判〉則報道了一些納粹受害者家屬 2 月 6 日要求法國波爾多上訴法庭以反人類罪的指控審判一名維希傀儡政府¹時期與納粹合作的法國前部長。

波爾多上訴法院將決定是否審判 85 歲的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他在 1942 年至 1944 年任波爾多地方官期間驅逐了一千六百九十名猶太人，其中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兒童。大多數被他驅逐的猶太人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殺害。

如果帕蓬出庭受審，這將是法國有關參與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法國人的司法調查的最後一案。在維希政府時期，帕蓬擔任波爾多所在的吉倫特省秘書長。戰後帕蓬官運依舊，1978 年至 1981 年期間，他擔任法國預算部長。

這些情況表明：一，時隔五十年，法國有關參與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法國人的司法調查才進行到「最後一案」，拖的時間夠長的；二，像帕蓬這樣的罪犯活動能量之大，「人還在心不死」，並不滿足於苟活，還要問政求官，自然有其在上在下的「根子」，這大概也就是使有關的司法調查要拖到半個世紀的原因；三，儘管如此，法國的納粹受害者絕不健忘，堅韌持久地追究，也已奉陪半個世紀，或許有些當事

1 「維希政府」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法國政府。其時，法國政府所在地遷至法國中部的維希（Vichy），故以此為名。

人已不在，是他們的子孫後代在「繼續挖山不止」吧，可敬可佩！他們豈止是為自己所受的迫害要求補償，他們是在為所有的死者索還血債，他們是在為人類申張正義，他們是在為歷史書寫公平。

1996年3月8日

讀斯大林的一封信

偶然讀到斯大林的一封信，寫於 1938 年，過去所見《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中文本，下限為 30 年代初期，未及收入。

這封信是寫給一家兒童出版社的。斯大林在信中說：

我堅決反對出版《斯大林童年的故事》。小冊子充滿大量事實上的錯誤、歪曲和不應有的讚揚……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在於小冊子中有一種要在蘇聯孩子（以及一般人）意識中養成對個人、對領袖、對絕對正確的英雄的迷信。這是危險的、有害的。

「英雄」與「群氓」的理論，不是布爾什維克¹的，而是社會革命黨人的理論。社會革命黨人說，英雄造就人民，使人民從群氓轉變為人民；布爾什維克說，人民造就英雄。小冊子是往社會革命黨人的磨盤裏灌水，任何這樣的書都將是往社會革命黨人的磨盤裏灌水，都將有害於我們共同的布爾什維克事業。建議把小冊子燒掉。

從這封信看，斯大林是堅決地反對「養成對個人、對領袖、對絕對英雄的迷信」的，聽其言而觀其行，他在行動上也堅決到「建議把小冊子燒掉」。如果完全不知道截至1938年蘇聯發生過什麼事，是會把這當作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的嘉言懿行來看待的。

那時，蘇聯已經舉行了以三次莫斯科審訊為標誌，涉及全蘇黨政軍和民族、工業、外交、安全各部門以及知識界和普通公民的大清洗。三次審訊即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1937年1月的「反蘇托派中心案件」和1938年3月的「右派和托派反蘇聯案件」中，五十四名被告除五人判處徒刑外，全部槍決了。後

1 「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為俄語「多數派」的音譯，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一個派別，領袖人物是列寧。列寧認為，社會民主工黨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建立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多數黨員對其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該派別與孟什維克派(Mensheviks)相對立。

來有一份企圖讓貝利亞（Lavrentiy Beria）承擔恐怖統治的主要責任的文件——其實貝利亞是 1938 年 12 月才當上內務人民委員的——也不得不指出斯大林「大大過高估計了他（斯大林自己）的作用和他的成就」，指出他「自以為一貫正確」，他「開始要求對他個人歌功頌德」。

1938 年斯大林主持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就充滿了對他個人的歌功頌德。其中也批判了有關「英雄」和「群氓」之說，指為上世紀末俄國民粹派的思想。到了這封信裏，則把這一觀點直接同社會革命黨人掛鉤，而「社會革命黨人」當時在蘇聯已是「反革命」的同義語；斯大林的批評又不限於《斯大林童年的故事》，而是針對「任何這樣的書」，着眼於「往社會革命黨人的磨盤裏灌水」的傾向之普遍性，字裏行間頗含擴大化的殺機了。這同那時的政治氣氛是一致的。不知《斯大林童年的故事》一書的倒霉作者和出版者後來命運如何，我猜想他們本意很可能不過是趨時隨風，歌功頌德，甚至動機是滿真誠的，然則他們也許至死不能弄懂他們的獲罪之由。即使如我們，身居事外，且有半個世紀的間隔，到底該怎樣解釋斯大林在大搞個人迷信的同時，寫信反對個人迷信，並且拿一本小冊子開刀這個矛盾現象呢？僅僅從有些事可做而不可說的策略角度看，恐怕會失之偏頗；認為這本小冊子也許歌頌得過於笨拙，因此「馬屁拍在馬腿上」，恐怕會失之淺；照我們孔夫子的教誨，「視

其所以（表層的所做所為），觀其所由（動機和出發點），察其所安（深層的興趣意向）」，則只能作出類似「恥其言而過其行」、「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個人道德品質評價，這對於分析千百萬人命運攸關的重大社會歷史現象，又顯得太不夠了。

這封信是 1955 年 12 月 22 日蘇聯《文學報》副主編伏·柯索拉波夫紀念斯大林 76 歲誕辰的文章〈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人〉所引。在斯大林去世兩年半後的這次冥壽期間，蘇聯各報發表了大量頌揚文章，還發表了成百張照片，把這位已故領袖奉為「偉大的革命家和深刻的思想家」。局外人大概想像不到，兩個半月後的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魯曉夫就在蘇共二十大上閉幕前，作了揭露斯大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事後回顧，當時圍繞斯大林個人迷信問題的幕後爭論想必極其激烈。那位副主編在彼時彼地挑選了一個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的題目來做頌聖文章，既佔住反對個人迷信的地步，又維護了斯大林，真也可謂用心良苦了。不知於今安在哉？

1990 年 9 月 3 日

小朱加什維利

讀過斯大林傳記的人，都知道朱加什維利 (Dzhugashvili) 是斯大林的原姓。小朱加什維利，指的是斯大林的大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 (Yevgeny Dzhugashvili)，他對他的祖父佩服得五體投地，以擁有跟爺爺一樣的姓氏感到無比榮耀。斯大林開始革命生涯以後，就告別了朱加什維利。他的孫子重新用這個姓，其實不必在前面加個「小」字的。

朱加什維利 62 歲，應是 1935 或 1936 年生，他的父親雅科夫 (Yakov Dzhugashvili) 是斯大林的長子，蘇德戰爭中

被德軍俘虜。希特拉提出要求，讓蘇聯拿被蘇軍俘獲的納粹將領交換。斯大林拒絕了。最後雅科夫死於集中營納粹武裝分子槍口下。

斯大林逝世時，他的長孫朱加什維利已經十七八歲了。他後來成為一名軍人。據說他性情暴躁，而更大的特點是「奉爺爺若神明」，「特別懷念爺爺的那個時代」。

斯大林時代應該怎樣評價，在俄羅斯和前蘇聯，已經不止是歷史家的事情。那裏的人民最有發言權。在中國，1949年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為斯大林祝賀七十大壽，對蘇聯和斯大林是不許說一個不字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對斯大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之後，中共中央發表的官方評價，對斯大林持「三七開」的觀點，肯定其「七分功」是繼承列寧的事業，在一國內建成社會主義，並領導衛國戰爭直到勝利，形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指出其「三分過」則在於肅反擴大化，使無數忠誠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蘇聯公民慘遭鎮壓。四十年來的眾多歷史事件，加上前蘇聯歷史檔案的公開，使更多的人對斯大林時代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在30年代後期斯大林組織三次莫斯科審判，以及在此前後的大清洗，把列寧時代的老近衛軍剪除殆盡。這時候他的孫子朱加什維利還小，不懂事也不記事。1941至45年的戰時生活當會進入他的記憶了。他記住祖父領導打敗希特拉的功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斯大林重作評價的時候，

他已經成年，卻認為所有對斯大林時代真相的披露和批評，以及一切對斯大林的批評，都是「詆毀爺爺的榮譽」。

在這方面，他的堂弟，斯大林的小孫子亞歷山大·布爾達斯基（Alexander Burdonsky）就與他不同。57歲的布爾達斯基，他的父親是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Vasily Stalin），他大約生於1940或1941年，13歲那年改從母姓。他是一個戲劇導演，喜愛詩歌，輕聲慢語，但對他祖父有所不敬；他說：「我不知道堂兄為什麼那麼熱衷於為爺爺的榮譽而戰。爺爺犯下的罪惡不是誰能否定得了的。」

這兄弟倆在對斯大林的態度上不可調和。觀點不同，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朱加什維利採取的卻是極端的立場。他搜集那些他認為是「詆毀」他爺爺的人的名單，他說：「被我列上名單的都是人民的敵人，他們應該受到懲罰。總有一天我會跟他們算賬的！」「我真想像爺爺一樣親手槍斃了他們！」這個名單裏，自然也包括他的堂弟布爾達斯基，他說：「布爾達斯基是一個賣國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親手吊死他的！」真可謂有其祖乃有其孫，他對祖父的崇拜和迷信，確是到了不顧史實、不問是非的絕對化程度，不知是親情，還是盲目的家族榮譽感蒙住了他的眼睛？讓他對歷史上從老布爾什維克到普通農民以及工人、軍人、知識分子成千上萬無辜被殺的事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直到今天，他還頑固地堅持斯大林以暴力治國，以暴力對待人民的思維

方式和行為方式；這種時代的錯誤使人覺得他是可悲的，但他的所想所說，讓我們想到，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趕上斯大林在世，他豈不會毫不遲疑地參與肅反擴大化的行動，以革命的名義，以「保衛斯大林」的名義去殺人嗎？

從人的靈魂的層面看，這類以暴力對待歧見的慣性，真是一種根深柢固的危險。

斯大林的歷史功過是須讓歷史來裁判的。這與他的兩個孫子都無關。我們局外人談論斯大林的問題，更沒有鞭屍之意。倒是列寧的語意啟發我們，那些屬於舊時代的東西，看似死去了，但還散發着屍臭，毒害着社會。世紀之初就有過「骸骨的迷戀」一說，作為比喻，它的喻義是普遍而深刻的。

1998年4月17日

悼安娜·拉林娜

安娜·拉林娜 (Anna Larina) 2月24日在莫斯科去世了，享年84歲。新華社當天發了消息。在她的名字前面冠以「俄羅斯早期革命領導人之一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的遺孀」的頭銜。

這個頭銜是醒目的，而且加在她頭上是再確切也沒有了。正像我們讀舊俄文學和歷史作品，把涅克拉索夫 (Nikolay Nekrasov) 長詩《俄羅斯女人》(*Russian Women*) 所寫的伏爾龔斯卡婭 (Volkonskaya) 等人籠統叫作「十二月

黨人的妻子」¹一樣，並不因此使她們僅僅成為丈夫的附庸，而她們恰恰是在為自己的丈夫，同時為丈夫的也是自己的信念做出的犧牲中，完成了獨立的人格。

安娜·拉林娜就是 20 世紀一個這樣的女人，「俄羅斯女人」。

布哈林的名字我是早知道了，從斯大林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電影《列寧在 1918》，那裏的布哈林是一個叛徒的角色，黑幫的形象。布哈林的本來面目，在我們這裏怕是到 1979 至 1980 之際才略見端倪。於是我們讀到了布哈林的遺囑，於是我們知道了布哈林被殺時他年輕的妻子拉林娜其人。

布哈林為什麼 1938 年會承認審判所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可怕的罪名？現在看來他知道無法倖免，他想保全年輕的妻子和剛剛出世不久的兒子，可能同時想到讓妻子背下他寫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他便把堅持歷史真相和表白自己忠誠的希望，孤注一擲地寄託在拉林娜身上。那是 1937 年或 1938 年。

1 1825 年 12 月，一批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貴族及軍人發起起義革命，意圖推翻沙皇專制政權，成員被稱為十二月黨人。《俄羅斯女人》一詩有描述伏爾龔斯卡婭（Volkonskaya）等十二月黨人妻子，拋棄貴族權力，跟隨丈夫被發配至荒涼的西伯利亞的境況。

拉林娜果真不負重托，她把布哈林的遺囑背熟後，銷毀了書面原件。而在 1938 年布哈林被處決，她也度過近二十年監禁和流放的歲月，連親生的兒子都被隔離，不知音訊。拉林娜長期嚴守着只有亡夫和她兩個人共有的秘密，很晚才公佈了布哈林通過她的記憶所保留的這份遺囑，並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等到了冤案的澄清。事經整整半個世紀，在所謂歷史的長河中也許只是一瞬，但在拉林娜，這意味着從 25 歲到 75 歲由青春而暮年漫長的苦役與煎熬！誰能不為她那驚人的信念與意志所折服？

新華社稱，布哈林平反後，拉林娜曾發表了她的回憶錄。這應該說是一個時代的刻骨銘心的目擊者、親歷者極其可貴的歷史證詞。

安娜·拉林娜的這部回憶錄，至今還沒有讀到中譯本。我想，把它介紹給中國讀者，不僅會有助於人們借鑒歷史教訓，就是對於青少年，也可聊補非智力因素的教育之不足，或許不下於當年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²一類的書吧。

1996 年 2 月 29 日

2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為一部紀傳體小說，是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以自己一對子女為原型所著，講述了 20 世紀 20 年代出生於蘇聯普通勞動人民家庭的卓婭和舒拉如何逐步成長，最後在蘇德戰爭中為蘇聯作出犧牲。

讀布哈林遺囑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1938–1988）在他被捕的前夕，寫了《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由他的妻子、當時還很年輕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背下來。直到若干年後，歷經比傳奇更加驚心慘目的現實的煉獄，這封信才得以公開。比起在公審的特殊條件下所作的最後陳述來，這封信可以更確切地認定為布哈林的遺囑。

同志們，要知道，在你們舉着向共產主義勝利邁進的旗幟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以他的鮮血和生命，呼籲「未來一代」，要解決那些「窒息着黨的生命」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這是他，18歲就入了黨，終生「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的布哈林，在意識到的「生命的最後時刻」發出的呼籲啊！

現在，半個多世紀以後，撥開歷史上「有組織的謾言」的烏雲，我們發現在蘇聯本來存在着一個完全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可能的選擇。

斯大林模式，是在1929年布哈林遭到決定性失敗，新經濟政策精神徹底結束以後的七八年中，經由斯大林以「非常措施」的過火行動強行剝奪農民的農業集體化，以踐踏法制的專橫殘暴實施的一系列大清洗，而宣告最後完成的。

在這之前，布哈林從他所認識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出發，譴責過蘇聯生活中已經出現的「軍事封建剝削」，他把這些現象概括為「一句話，人民為官吏，而不是官吏為人民」，他擔心這種現象毀掉國家，毀掉黨。

後來的事變證明布哈林的擔心絕不是多餘的。在斯大林模式下，權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向個人獨裁的轉化（最後表現為黨的、政府的、軍隊的最高權力由斯大林一人大權獨攬），使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蛻變為黨的少數領袖直至一個領袖的專政，黨和龐大的國家機器從而淪為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中

的專政工具。這一專政以無產階級的名義，把它的鎮壓職能施之於農民，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乃至其領導集團的內部。

布哈林堅持正統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認為「對待敵人嚴酷是有道理的」，例如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領導的契卡¹「捍衛國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但他懷疑他當時面對的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性質：

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面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面對着一部兇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

如果說布哈林在審訊的供詞中出於保護年輕妻子和幼小兒子的考慮而不得不使用了曲筆的話，這封由他的妻子默記在心中的信，應該是他直言不諱的心聲。他說，「我沒有幹過什麼反對斯大林的事」。他把對他的指控和迫害，似乎一直只認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迎合斯大林因爭奪地位和名譽而產生的病態的狐疑心理」，並且註明「我這麼說並不為過」；這是從列寧評價斯大林時僅僅認為「不能肯定他能不

1 契卡（Cheka）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是前蘇俄的一個情報組織，於 1917 年 12 月 20 日創立，創立目的是「用非常手段跟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

能夠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和僅僅認為屬於「太粗暴」的作風問題（卻又說是「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又復經過十幾年充滿激烈的黨內鬥爭的歲月以後，布哈林稍稍前進的一小步。這也許表明布哈林不僅善良而且天真吧？或者，這不恰恰是列寧在稱他為「黨的最傑出和最寶貴的理論家」、「全黨所喜歡的人物」時批評過他的，不善於掌握辯證法的最致命的表現嗎？

在《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中，布哈林還極其誠懇地說：「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問題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過錯誤，那就讓後人對我作出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寧）一樣嚴厲的評判吧。我們是第一次沿着一條尚未開闢出來的道路走向一個單一的目標的。」「《真理報》也曾開闢過一個討論版，讓人人都來進行辯論，探求道路和方法，爭論一番，得出決定，然後一起前進。」布哈林正是這樣看待他同斯大林的爭論，認為這是邁向建設社會主義共同目標的方法上的不同，他在做的是為了「一起前進」的同志式的批評和爭辯。在決定布哈林政治命運的1929年4月中央全會上，他的發言的重點也仍然是圍繞新經濟政策的一些關鍵問題闡明自己的主張。他信守着同年1月他寫的《列寧的政治遺囑》文中的話：「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並沒有從政治中取消。」可悲的、書生氣十足的布哈林的良心，大概完全沒想到等着他的是徹底非同志式的待遇，指斥

他「反黨」的政治局秘密決議竟會被中央全會所通過，全會還接受了斯大林關於布哈林早在 1918 年就密謀策劃「逮捕列寧並舉行反蘇維埃政變」的暗示，這就為 1938 年公審定了調子。這是我們成語所說的「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哪裏有書本上所說的黨內解決政策和路線的分歧的正常程序和準則的影子呢？而到了 1937 至 1938 年的時候，在蘇聯社會和聯共黨內權力結構的條件下，誰掌握實際政治權力，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誰就壟斷了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至對歷史的解釋權；布哈林也就從「非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布爾什維克」、「反黨」、「富農代理人」等等，升格為「叛徒」、「間諜」、「暗害者」、「賣國賊餘孽」、「匪幫」和「人類蝨賊」：這不是布哈林個人的悲劇，這是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悲劇，這也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

布哈林的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在於他置身當時當地和有關當事人之間，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的悲劇則在於，在各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不同程度上甚至不止一次地重複了這一類型的悲劇之後，時至今日還必須探討這樣的悲劇今後是否可以完全避免的課題，而這樣的探討又並不是經常受到鼓勵的。

布哈林無疑是列寧的摯友和學生。布哈林對列寧的如下這一論斷也從來沒有表示過異議：「群眾是劃分為階級

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這通常被視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關係的列寧主義原則。

列寧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立的。那次大會因對黨章問題的爭論發生分裂，隨後在選舉中央領導機關時，以列寧為代表的火星派獲得多數選票，反對列寧而擁護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的一派獲得少數選票，從此而有了布爾什維克²和孟什維克³（多數派和少數派）之稱。列寧在世期間，雖然也不斷出現過重大政見上的分歧和鬥爭，但領導集團保持了相對穩定；除了十月革命前的布拉格會議採取了開除孟什維克出黨的組織措施以外，以列寧為首的領導集團沒有重大改組，即使在黨執政以後，也沒有對黨內持不同意見的領導成員動用極端的手段。但這一明智的平衡未必是通過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法規來保證，毋寧說更多是依靠列寧在黨內和領導集團內的政治權威來實現的。

2 詳見本書〈讀斯大林的一封信〉一文的註1（頁58）。

3 「孟什維克」為俄語「少數派」的音譯，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一個派別，領袖人物是馬爾托夫，主張把一切願意入黨的人全部吸收進來，並認為黨員並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組織化，只需「經常親自協助黨」即可。該派別與布爾什維克派相對。

列寧逝世以後，黨內「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由於出現了權力真空，而傾斜，而動盪，越來越不那麼穩定了。

這種不穩定和它所產生的黨內傾軋的後果，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斯大林個人濫用權力。正是當時黨內生活的一般狀況、黨內鬥爭（路線鬥爭必然涉及領導權問題，因此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在客觀上無法截然分開）的習以為常的傳統，給像斯大林這樣作風和品質的人提供了濫用權力的土壤和氣候。

十月革命的一舉成功，使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絕對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從奪取政權的秘密工作轉向鞏固政權的國內戰爭，總之處於非常時期，黨的決策過程也帶上非常時期的軍事色彩，不僅充滿了火藥味，而且表現為一種機關政治、黨內政治。黨的領導成員和一般黨員，都認為所有有關國家和人民的大事，重大的路線和方針，只應該首先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之前，無需甚至不應向全黨更不用說黨外人民群眾公開，認為這是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權的必要紀律，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就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的分歧和爭論傾聽全黨的意見，就黨內在重大方針、政策上的不同認識傾聽黨外群眾的呼聲，認為如果這樣做就會使黨墮落為「爭論不休的俱樂部」，使黨失去

區別於社會組織和一般群眾的先進性，又使黨渙散，失去戰鬥力。黨的政治利益和組織原則，似乎只要求全黨執行領導機關的決議，全民「跟着黨走」。這是黨內政治生活完全被指令性的等級服從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們在人類歷史上大量看到的，法律只是守法者的法律一樣，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也只是遵紀者的紀律。黨內鬥爭秘密化的紀律，對布哈林形成組織上的約束，應該說這也是他這個全心全意把維護黨當作維護工人階級整體利益者自覺自願接受的。然而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輕易地把黨內矛盾和鬥爭公開，例如在幾乎剝奪了布哈林的答辯權的情況下，從 1929 年 8 月下旬起，利用輿論工具在黨外發動了長達四個月的大規模的政治誹謗。

全體人民的命運和前途取決於黨，全黨思想和行動則統一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而黨的領導機關作出這樣的或那樣的決議，是由什麼所決定，以什麼為依據呢？1929 年 4 月 16 日舉行的四月全會，是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到會者 300 人以上，而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會上只有十三人。從表面上看，這一次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打敗了布哈林；實際上，是與會者特別是政治局集團的素質決定了力量對比的懸殊——其中絕大部分人屬於所謂實際政治家，即行政官僚和軍事化的「非常措施」的信奉者，可能再加上斯大林在六年總書記任內提拔重用的幹部，

他們的一致認同，大大加強了斯大林的有利地位。布哈林成為會上的「少數派」，如後來有人所說，「不是用論據而是用黨證把布哈林擊敗的」，是布爾什維克的黨證擊敗了布爾什維克黨除斯大林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全然不同的選擇！在當時，緊接着召開的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上，馬克思主義學者達維德·梁贊諾夫 (David Riazanov) 就曾評論這一事件說：「政治局現在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者了。」布哈林對真理的追求讓位於斯大林對真理的佔有，歸根結底，當時領導機關成員的思想、理論、政治素質和領導機關內的力量對比，一邊倒地使斯大林佔有了權力，從而也佔有了真理。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而慣會玩弄陰謀詭計的角色；布哈林卻完全相反，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家，但對實際政治中的權術尤其對陰謀詭計則一竅不通。很有點像論者所說的王安石「有申韓之心而無申韓之術」。這就註定他在面對着「蜕化成為官僚主義的組織」的肅反機構「能夠把任何一個中央委員、任何一個黨員幹掉，把他們指為叛徒、恐怖分子、異端分子和間諜」時「感到無能為力」，束手就縛。唯一能做的只是呼籲「下一代黨的領導人」宣佈他是無罪的，寄希望於年輕的新一代黨領導人的正直。

布哈林早在 20 年代就從所謂「餘糧徵集制」等政策及其實踐中看出對農民進行的「軍事封建剝削」的實質，敏感

地指出這是「沙皇俄國老傳統」的復活。直到他作為遺囑的信中，着重提出了「一部兇惡的國家機器」，也就是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異化問題：「這部機器大概借助於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捏造着有組織的謠言，厚顏無恥地在採取行動。」這都是中肯的，正確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布哈林似乎來不及聯繫國內和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去重新審視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思想，他似乎較少或根本沒有涉及過黨的異化問題。那些「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唯其長期「穩定」，而又缺少監督，以致整個地或部分地，或者至少是其中個別的人，蛻變成凌駕於黨和人民之上的、主宰普通黨員和群眾命運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他們原有的威信、影響、經驗則轉化為「太歲頭上不能動土」的為所欲為的獨裁權力，這種從「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的現象，在布哈林生命的後期，已經不是預見到的危險，而是睜眼可見的既成的事實，布哈林對此是否有投鼠忌器的顧慮呢？我們是無權來苛求於像他這樣的前人的。

斯大林的暴行，他的逐步升級的專斷跋扈、大權獨攬，對蘇聯人民、對國際共運以至對全人類造成的危害和損失，是不可原諒的。蘇聯的黨員和群眾不能代他負責。然而從歷史的高度來回顧這一切時，人們有責任對建黨思想進行再認

識。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學說是在執政以前，在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形成的；在取得政權並鞏固了執政黨的地位之後，在由戰爭轉向和平建設的條件下，是不是應該根據新情況和新問題，就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作出新的概括，新的回答，新的修正和補充呢？如果在執政初期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領導主體改革的迫切性，那末在飽經滄桑不得不面對全面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刻，這個任務實在是刻不容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的。作為全國政治領導力量的執政黨，黨內民主化的程度是什麼樣，社會上各階層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化的程度就是什麼樣；一個在黨內關係上——領導成員特別是不同政見的領導成員之間、領導機關和普通黨員之間——缺少健康正常的民主生活的黨，不可能領導群眾建成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沒有同民主化程度相應的黨內開放，沒有普通黨員和黨的下級組織對領導機關的有效監督，沒有對重大形勢、任務和方針、政策問題的開誠佈公的討論，儘管也許黨組織不致成為「爭論的俱樂部」，但在封閉、僵化的表層下卻掩蓋着對抗的危險：黨的領導集團或領袖可能甚至必定成為掌握黨權的統治集團或統治者，黨組織淪為少數人對多數人（包括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時的黨內對手）的法庭，這是布哈林及其同時代人的命運所告誡我們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黨內和黨外的民主是互相影響、互相檢驗的。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黨派都沒有反對人民的權利，而人民群眾卻有在不同黨派中間採取或擁護、或批評、或反對、或中立的選擇的權利；即使在不存在多黨制而由共產黨獨立充當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外一般人民群眾中間也只存在社會行為上是否違法的問題，而不應該存在政治態度上、思想意識上是否「反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邏輯上本來不成其為問題，但是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開始，幾十年間，在一系列國家內，不知有千百萬公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黨外的公民中尋找「反黨」分子加以打擊的黨，必然在黨內尋找更多的「反黨」分子當作打擊對象，這不是推論，而是概莫能外的經驗了。

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特別是以列寧為代表的國家學說和建黨理論，黨是無產階級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從而也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因此在執行黨對國家的領導權，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方面，黨成了全權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作為從「被統治者」轉變為「統治者」，實行「階級統治」的唯一實體，而黨「通常是由……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集團來主持的」，黨的領導集團也就成了國家的實際統治者的集團；在缺少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兩重體制保障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則從整體說來成為抽象的存在，名義上的「統治者」，在一定時期

千百萬公民淪為黨（由「領袖……集團」主持）所領導的國家的實實在在的「被統治者」。在布哈林案件前後的蘇聯大清洗中，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分子、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即其政治代表人物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的怪圈。

斯大林體制是封建性很強的官僚體制。在斯大林體制下，黨的領導機關及其大權獨攬的領袖，通過高度集中的黨的權力的壟斷性的國家權力，包括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精神權力和物質權力，對整個社會生活實行全面干預，不可避免地要採取極端政策、強制措施和高壓手段，結果形成滲透全部官僚體制的兩大特點，一是專制化，自上而下逐級的長官意志和自下而上逐級的絕對服從相結合；二是寄生化，在各級領導層中，「合法」的特權和非法的特權相結合：這樣就滋生出一大批利用手中權力實行壓迫和剝削的官僚，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處在這權力金字塔的最底層，竟不得不經常震懾於鎮壓的威力，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在蘇聯，倖存的老一代人記憶猶新；在近年興起的「歷史熱」中曝光和澄清的許多真相，促使更多的人包括青年一代像正視現實、正視未來一樣正視歷史。

歷史的前進是不可阻擋的，同時歷史的發展又是不能割斷的。歷史的舊賬如不加清理總結，今天就不知道肯定什麼，否定什麼；就不能校正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歷史所派生

的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就不能辨別過去和現在的真理和謬誤；就不能恢復馬克思主義本來蘊含的人道精神和理性精神，恢復社會主義實踐應有的聲譽，在改革中不斷前進。

重讀布哈林遺囑，重溫布哈林案件的歷史，深感其中的嚴重教訓，對我們也有振聾發聵、催人思考的意義。一個共產黨員對此如果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不僅愧對千百萬死者，也愧對共產黨人的良知和黨性。

1989年2月15日

【附記】

這篇札記寫於1989年初。當時認為蘇聯共產黨應該汲取以無數忠實真誠的黨員和正直無辜的公民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教訓，重新審視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自身的改革。誰知此文未及發表，而狂飆起於天末，斯黨斯邦，忽焉瓦解，一時有斜陽煙柳之歎。翻檢篋底，重讀一遍，轍跡猶新，前車不遠，來自歷史者歸於歷史，姑作為歷史的紀念吧。

1993年4月15日

卡廷紀念碑

1943年納粹德國宣佈在蘇聯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卡廷森林發現大批波蘭軍官的屍體。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則指控對波蘭軍官的屠殺是德軍所為。納粹無惡不作，單是猶太人就殺了六百萬；而蘇聯是反法西斯的盟國，斯大林又是和羅斯福、邱吉爾並列的三巨頭之一，世界輿論自然更傾向於相信蘇聯。只是具體證據不足，這成了紐倫堡審判後還需繼續調查的一項「納粹罪行」。時過境遷，幾十年間只有波蘭的死難者家屬還沒有淡忘這個歷史之「謎」。其間波蘭政府似向蘇聯辦過交涉，但只要知道一點蘇波——上溯到俄波關

係的歷史，知道在 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竟可以因波蘭演出 19 世紀大詩人密茨凱維支 (Adam Mickiewicz) 的詩劇《先人祭》(*Dziady*) 而提出抗議，也就可以斷定那交涉是不會有結果的了。

於是，好像一切真應了斯大林說的一句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然而，事實是頑強的，歷史不會遷就任何人歪曲和篡改它的意願。1990 年，蘇聯發表聲明，承認卡廷慘案中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被殺是蘇聯警察幹的。歷史沒有永遠解不開的「謎」。

報載，今年 2 月波蘭和俄羅斯兩國政府簽署了有關協定，俄國將承擔為卡廷慘案受害者修建墓地及紀念碑的大部分費用。

我想，一切都會按協定進行吧，只是想不出將來紀念碑上鐫刻些什麼？

紀念碑是為了紀念。

死者的家屬紀念他們的親人。波蘭人民紀念他們的同胞。因為他們在作為戰俘期間被非人道地殺害，而且是不明不白的殺害，殺害後還被推諉罪責的人掩蓋真相近半個世紀之久。

我以為，除非立一座無字碑，否則，碑文單是表示家屬和同胞對死者的哀悼和懷念是遠遠不夠的，既不足以慰死者於地下，也不足以銘記屬於全人類的深刻歷史教訓。

應該在碑文中鄭重地寫上：這一次二戰中發生的大屠殺，不是什麼人的率爾決定或下級官兵的盲動行為，而是經由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議實施的。然後，針對德國的宣佈和世人的指責，蘇聯政府聲明斷然否認，可稱理直氣壯，義正辭嚴。戰後，經過對斯大林在國內肅反擴大化等問題的揭發批判，無論是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或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也譯布里茲涅夫）或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或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主政的時候，在卡廷慘案問題上都沒有鬆口，沒有吐露真情，沒有替他們承襲的蘇聯黨和政府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製造慘案和掩蓋慘案真相，責任有大小，各有各的賬，但都應該筆之於書，因為這不僅涉及蘇聯史，蘇共史，蘇波關係史，蘇德關係史以至二戰史，並且是整個國際共運史和整個人類文明史都應該永志不忘的。

把卡廷慘案的前因後果如實地寫在紀念碑上，使當代人和後代人從而思考前此後此的類似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為什麼會發生，怎樣使之從此不再發生。這就是這個紀念碑之為紀念碑的意義。

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那恐怕指的是用筆和鉛寫印的書本，如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但歷史已經證明，真相終將大白，歷史的每一個當事人，都以自己的作為或遭遇書寫了自己的歷史，無論勝利者或失敗者，屠殺者或受害者，在歷史面前人人平等。

紀念碑是後人樹立的，只有反映了歷史本來面目的紀念碑，才是真正的對歷史的紀念。

1994年7月17日

以蘇為鏡

我年輕時受的教育，是「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中間屢因中蘇關係的變化而茫然莫明究竟，但從來沒想到這樣一個大國，一個大黨，一夕之間，忽而瓦解。

這在我心裏，始終是一個謎。七八年過去，偶然從一些相關報道的字裏行間，彷彿得到一點啟發。比如說在群眾「上街」的熱潮裏，捷爾任斯基的塑像是第一個被推倒的——捷爾任斯基何許人也？他是列寧的戰友，十月革命後第一任肅反委員會即「契卡」主席，因他死得早，不是被斯大林鎮

壓的，所以整個五六十年代，也曾是中國青年的偶像之一，有關他的傳記性文學作品，就印行過《燃燒》、《穿黃狼皮大衣的人》，今天六十多歲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記得。他的塑像一直挺立在莫斯科前契卡也是後來的克格勃即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門前。其竟被推倒也，恐怕並不是針對他個人，90年代初的蘇聯人跟他不會有什麼個人恩怨，但他所創建的這個部門執行過例如「肅反擴大化」一類濫殺無辜的命令，「以革命的名義」樹敵過多，為蘇聯共產黨結怨甚深，捷爾任斯基遂也就成了遭恨的象徵。

金雁在《新餓鄉紀程》中，說人民拋棄了蘇共，是因為蘇共拋棄了人民，拋棄云云，不失為溫和的說法。蘇聯人民長時期所遭受的經濟剝奪和政治迫害，是只有與人民為敵者才能施加的。

蘇聯和蘇聯共產黨，怎麼會從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變成了實際上是蘇聯人民的對立面呢？

最近從《作家文摘》上看到黃葦町著《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部分章節，鉤出了一個大致的歷史輪廓。

黃文指出，蘇共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如前所述，蘇共十分缺乏黨內民主。又長期以黨代政，形成了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幹部任命制。應該說，這

三制使領導人以言立法，以言廢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帶來腐敗」，「在作為執政黨的蘇共內部，特別是蘇聯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層中存在相當普遍的腐敗現象。」

黃文說，導致蘇聯劇變的原因有很多，「有一個在當時被我們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特權和財富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經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佔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能夠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制度，而要通過國家政治制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並能名正言順地傳諸子孫。」

黃文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搞垮蘇共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他認為，劇變以後的進程也表明，「最大的贏家不是黑市倒爺（編按：不合法地以低價買進貨品，再以遠高於原價的價格賣出的人），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政府的各級成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

看來，從蘇聯「亡黨亡國」中得到最大好處的這些新顯貴們，不少原是前朝遺老，早先黨和政府官員中的「老同志」；當他們還披着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以至馬克思

列寧主義外衣的時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祿之徒，他們堅持的其實只有一條原則，就是所謂「現在該輪到我們撈一把了」。一俟國內發生政治危機，他們樂得如黃文所說的「一呼百應，順水推舟」，在政權易幟之後，繼續做他的官，發他的財。

四十多年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把「和平演變」的賭注押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第 n 代身上。我們都不止一次地學習討論，以提高警惕，尋找抵禦之法。當時相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認定要搞垮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也必是「思想領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襲和腐蝕入手，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似乎也就成為復辟資本主義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盡然。有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東西，那就是金錢。尤其對於沒有強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體的物質利益就能左右他們的思想行為。毋須來自敵對勢力的腐蝕，先就腐敗以至腐爛，自我顛覆了。可以說，江山變色，由腐敗始。

套一句我們傳統的話兒，所謂「亡黨亡國」的最大危險，「乃在蕭牆之內」！

我沒有看到全書，不能對全書作出評價。然而書中涉及蘇聯解體緣於官僚特權階層大搞腐敗、與人民為敵這一分析和論述，至少接觸到部分的真實，可讀。過去在文革中罵

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歸咎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純屬瞎說。今天，在蘇聯和蘇共都已瓦解之後，探討一下十月革命的故鄉何以會一朝「紅旗落地」，前蘇聯的人民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選擇，應該不僅是歷史學家所關注的課題。

1998年12月25日

說起《祖國進行曲》

在《世紀之問》一書中，讀到李輝和藍英年兩先生的對話〈鏡子中的歷史〉，提到《祖國進行曲》。李輝說：

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許多蘇聯歌曲，其中有一首號稱「第二國歌」的《祖國進行曲》，歌詞大意是：「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們有無數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們親切的稱呼是同志。」過去不知道這首歌的背景，現在知道了，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藍英年說：

現在俄國的電影，一演到勞改營的場面，就放這支曲子。

我年輕時候很喜愛這支歌，那是同對蘇聯的嚮往之情分不開的，而蘇聯，在我們的心目中，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中國革命者在30年代把革命根據地叫「蘇（維埃）區」，甚至喊出過「擁護蘇聯」「保衛蘇聯」的口號，我是能夠理解的。

翻查薛范先生編的《蘇聯歌曲珍品集（1917-1991）》（中國電影出版社），它的中文歌詞是姜椿芳譯，呂驥配歌：

〔齊唱〕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以下每節後唱，直到曲終）

〔獨唱〕打從莫斯科走到遙遠的邊疆，打從南俄走到北冰洋。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就是（原譯「好像」）自己祖國的主人；各處生活都很寬廣自由，像那伏爾加直瀉奔流。這兒青年都有遠大前程，這兒老人到處受尊敬。

我們田野你再不能辨認，我們城市你再記不清。我們驕傲的稱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不分人種黑白棕黃紅。這個稱呼無論誰都熟悉，憑着它就彼此更親密。

書中對這支歌曲的背景作了詳盡的介紹：這是音樂故事片《大馬戲團》的主題歌。影片敘述一個美國馬戲團女演員，由於生了黑孩子而遭到迫害，最後在蘇聯受到尊重並獲得施展才能的機會。從 1934 年開拍，1936 年基本完成，但總覺最後缺少一首有分量的歌。作曲家伊·杜納耶夫斯基（Isaak Dunayevsky）花了半年時間，共寫了 36 稿，他後來回憶說：

《祖國進行曲》是先寫出曲譜，而後由列別傑夫一庫馬契（Vasily Lebedev-Kumach）填上詞的……我坐在鋼琴前，左右是亞歷山大羅夫（Grigori Aleksandrov，影片導演）和列別傑夫一庫馬契。旋律出現後，大家同聲高唱，歡慶成功。列別傑夫一庫馬契被音樂所觸發，立即寫出副歌的歌詞，開頭一句是「我們祖國美好」；我對他說，音樂的寬廣氣息要求的不是美好，而是「遼闊」。大家就這樣定稿了。

於是在影片結尾，美國女演員抱着自己的黑孩子同蘇聯人一起高唱着這首歌走過五一節的紅場：

我們驕傲的稱呼是同志……不分人種黑白棕黃紅。

1936 年 5 月 25 日，影片首映的當天晚上，電台就播放了這首歌曲，很快便傳遍蘇聯全國。同年 12 月 31 日，蘇共中央「鑒於發展電影藝術中的貢獻以及一系列成為廣大人民

群眾財富的蘇聯歌曲」，授予這一對作曲作詞的搭檔以勞動紅旗勳章。後來，《大馬戲團》片的電影音樂和歌曲又於1941年獲斯大林獎金一等獎。我們知道，在很長的時間裏，克里姆林宮的鐘聲定時播放的，也是這首歌第一句的旋律。

可見這首歌作為蘇維埃國家頌歌的地位，無論是以進行曲風演唱，或放慢成為抒情的頌歌，那旋律所展現的寬廣曲境，顯示了泱泱大國之風和樂觀堅定的情緒；歌詞與曲調也達到和諧統一、相得益彰的程度。

我們見過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頌歌，曲調平庸乏味，歌詞蒼白湊數，一聽就知道是所謂「完成任務」的，而作者對這「任務」並無感情。《祖國進行曲》則不然，其中有作曲家和詩人的激情。從正面看，我們可以想見，此曲作成於1936年，作為社會主義建成標誌的《斯大林憲法》就在本年公佈，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計畫勝利完成，而莫斯科審判和大規模的鎮壓要到1937年才開始，人們在這時因國力的增強而產生某種歡樂和自豪，以及「自由呼吸」之感，在歌曲中得到了反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說革命初期的混亂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殘酷的「反托（所謂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反黨聯盟）鬥爭」也已是上一個十年的事，然而，30年代初強行農業集體化造成大遷徙、大饑饉，在富饒的糧倉烏克蘭等地也餓死許多人的事，歌曲作者知道

不知道？這是今天的俄羅斯讀者和中國讀者都會提出的問題，但這是別人難以代為回答的了。總之，從歷史真實的高度來要求，這首頌歌儘管有相當的藝術性，也不能掩蓋它在總體上屬於粉飾以至偽造歷史的序列。

這就是今天我們這些曾經喜愛這首歌的中國讀者，在更多地了解了蘇聯解密的歷史以後，不能不面對的尷尬局面。有一位老雜文家甚至說，那句「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是只有當年的「克格勃」才能這樣唱的。可慨也已。

詩人列別傑夫—庫馬契（1898–1949，也譯庫馬赤），中國沒有出版過他的詩集，我看到的多是歌詞。在這本「歌曲珍品集」裏，就還收了他好幾首。1934年寫的《快樂的人們》（同名影片插曲），1936年寫的《快樂的風》（影片《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插曲），以至1938年寫的《青年歌》、《伏爾加之歌》（影片《伏爾加——伏爾加》插曲），都是與作曲家、列寧格勒音樂宮音樂指導杜納耶夫斯基合作的。這幾首歌曲也都跟《祖國進行曲》的風格一樣，歡樂昂揚，是為青年人寫，讓青年人唱的，《快樂的風》中格言式的警句「要爭取才能得着，只有尋求才能找到」（另譯：「誰有願望——誰就能達到；誰去尋找——一定能找到！」），在傳唱中給人以鼓舞。

在戰前的 1939 年，他還為影片《水兵們》寫過插曲《海鷗》；而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拉軍隊入侵蘇聯後，列別傑夫—庫馬契立即寫下了悲憤的詩篇：「起來，巨大的國家，作決死的鬥爭……」24 日在《消息報》和《紅星報》同時發表，當天就由蘇軍紅旗歌舞團負責人老亞歷山大羅夫譜曲，成為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第一首歌。我在丘琴先生譯的《蘇聯詩選》中還讀到一首庫馬契寫於 1943 年的《只要我們的心不老》，不知可曾譜曲否？

由此我想到蘇聯詩人伊薩科夫斯基（Mikhail Isakovsky, 1900–1973），他的詩有大量譜曲傳唱，有不少是直接為電影作的。如《紅莓花兒開》、《你從前這樣》，就都是為影片《庫班哥薩克》（中譯《幸福的生活》）作的，作曲家也正是那位杜納耶夫斯基。這部影片攝成於 1949 年，據赫魯曉夫 1956 年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說，此片和《攻克柏林》一樣，同為斯大林晚年看而不厭的影片。《攻克柏林》中有斯大林飛臨於柏林攻克之後，享盡片中群眾的歡呼，其實歷史上他並沒有這一次柏林之行，也算是「革命浪漫主義」吧。《庫班哥薩克》也是「革命浪漫主義」，當時蘇聯農業危機四伏，但片中卻是一派大好形勢，到處喜慶豐收。這兩部影片成了粉飾現實、欺騙人民的典型。然而片中的歌曲照樣流傳，也許因為「紅莓花兒開在野外小河旁，有位可愛的人兒使我日夜想……」，只是一個少女含羞的傾訴，

「你從前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哥薩克你勇敢的鷹……」則唱出了夾帶幾分感傷的癡情，而這都與農業上的報喜不報憂沒有直接的關係。伊薩科夫斯基出身農民，對農村有很深的感情，也許正是因此，他熟知農民的疾苦，他在自己農村題材的詩裏，寫風景，寫愛情，而不去湊趣歌頌集體農莊。在這部影片裏還有兩首歌，一是《豐收之歌》，一是《歌唱幸福》。後者當時就沒有唱開，至今湮沒無聞，顯然沒有藝術生命力；前者我還記得，那歌詞一開頭是：庫班河上風光好，什麼什麼起浪濤，「快收割，快裝上車，讓我們快快收割完畢」，全無文采，但靠跳動的節奏還能撐起來，多少表現了農民在收割時或有的興奮，算不算得上局部的真實？不記得這兩首歌詞是否也是伊薩科夫斯基寫的了，同廣泛流傳的兩首相比，總有值得總結的教訓。倘也出於伊薩科夫斯基之手，就更使人感到悲哀。

在蘇聯，是直到 50 年代，文學界以奧維奇金（Valentin Ovechkin）、田德里亞科夫（Vladimir Tendryakov）為先驅，才開始正視農業落後和農民生活貧困的真實。赫魯曉夫公開提出農業問題後，農村凋敝才逐漸不再成為文學寫作的禁區。在這以前，那麼多農村題材的文藝作品，多是圖解政策，不管那政策給農民帶來多少苦難，還一例唱讚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如此，巴巴耶夫斯基（Semyon Babayevsky）的《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也是如此。

潘菲洛夫還以整同行作家出名。在那謊言籠罩着一切的年代，要求文學參與製造謊言，寫小說的人裏，似乎只有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在《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裏，敢於面對歷史的真實。為什麼他能逃脫「歪曲生活」的文網、「反蘇維埃」的罪名呢？據藍英年的文章說，《靜靜的頓河》裏寫到了紅軍陰暗面，這本是大忌，但恰恰因為頓河地區是托洛茨基所轄的戰區，而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政敵，暴露他所部的陰暗面，乃可以免受追究了。

但是不是有什麼別的更深層的原因，待考。總之，我佩服蕭洛霍夫的膽識。在30年代大饑饉的時候，他且正受到當地某些黨的幹部的圍攻陷害，而他竟一再寫信給斯大林，反映群眾生活和基層政權的真實情況。對於可能出現的不利後果，我想他不會不掂量的。這就是蕭洛霍夫的良知所在。他關注的已不是一個作家通常看成命根子的自家作品的命運，也不是作為作家在黨政領導心目中的地位和由此帶來的實惠，而是人民的痛苦；這證明他不止是落戶故鄉，身在農村，而且是心繫農民，他不是凌駕於群眾之上的「農民貴族」，他不會背叛人民，投靠權勢。從蕭洛霍夫，我又想到「咱們的老趙」——趙樹理同志。過去只知道他在1958年後寫過《鍛煉鍛煉》、《賴大嫂》等短篇，接着在1961年又參加了在大連舉行的農村題材小說的座談會，這就以會上的發言和會外的作品，構成了圍繞這一座談會命名的「中間人

物論」事件，此案後來與其他事件或案件一起，形成文革當中的「文藝黑線」文字獄。去年從《讀書》雜誌上看到陳徒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在那前後，趙樹理還曾寫信給中共中央，對農村中各種「左」的表現作了如實的反映，因而受到重點批判，這是與蕭洛霍夫頗有類似之處的，而這也是文革中遭受打擊的口實之一，最後竟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不幸被活活整死，則又是他不同於蕭洛霍夫之處了。

想想這些向人民負責、向歷史負責因而冒死陳詞的先例，那些只以假大空或高大全甚至「瞞和騙」求售的東西，應該佔據什麼應有的位置，還不明明白白嗎？

1999年6月27日

不安的靈魂歸宿何處？

——讀高莽《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

高莽的這本書，同藍英年的《尋墓者說》，都主要寫了俄蘇文藝界的一些「舊人舊事」。不同之處，藍英年是虛寫其「墓」，高莽則大多是曾親去墓前憑弔祭掃，在文邊配了這些墓前紀念碑、雕塑像的照片。

高莽把他的書題名《靈魂的歸宿》，然而我以為，他寫到的許多死於非命或受盡苦難的不安的靈魂，生不安枕，死不瞑目，「應有未招魂」，怕未必能算在公墓一角就找到了歸宿。

女詩人安娜·阿赫馬托娃（Anna Akhmatova），年輕時丈夫就遭鎮壓，後來本人又被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點

名批判，坎坷終身。她的土壤上覆蓋着石片，墳前有一堵石塊壘成的牆，據說象徵着監獄，墳頭上樹着黑色鐵鑄的巨大十字架。高莽說他面對這苦難鑄成的十字架陷入沉思：

她來到世間，接受了苦難，又背負着苦難而去。她是母親中最可憐的母親，她是妻子中最可憐的妻子。

高莽說：

那個時代對她太殘酷了！

「那個時代對她太殘酷了！」這句話也適用於這本書裏寫到的大部分墓主。

書中涉及的 22 位文學家，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高莽還寫到了 15 位藝術家，5 位漢學家，8 位其他各界人士。

如在 20 至 30 年代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齊名的大導演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 1874–1940）。他提倡現代藝術，追求創新，深得國內外一部分舞台藝術家欽佩，但為蘇聯當局所不容。下面是高莽為他和他的妻子、話劇演員賴赫（Zinaida Reich, 1894–1939）開的一份時間表：

1937 年 12 月 17 日，聯共（布）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出〈異己的戲劇〉一文，辱罵梅耶荷德的藝術探索。二十天以後，1938 年 1 月 7 日，蘇聯政府藝術事業委員會通過決議：查封以梅耶荷德為名的國家

劇院。那一天，賴赫在舞台上第七百二十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瑪格麗塔。她在梅耶荷德劇院工作十三年，創造了十幾個使人銘記在心的角色。

1938年6月20日，梅耶荷德出差到列寧格勒，突然被捕。同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賴赫在搜查證明上簽了字，同時附了一句：搜查人員「蠻橫無理」。

二十四天以後，1939年7月14日凌晨1時，賴赫在家中遭人殺害，身上留下十七處傷口，寓中沒有遺失任何東西。當局通知賴赫的子女：四十八小時之內騰出寓所。搬進去的是貝利亞的司機和其手下的一名女郎。1940年2月2日，根據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會主席貝利亞的批示，梅耶荷德被處決。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是貝利亞們的樂園。而像梅耶荷德夫婦這樣的遭遇，「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竟是千百萬正直敬業有思想有個性有創造性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命運。專制主義的極權統治是一切思想者、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天敵，是人類進步的天敵。

高莽寫到的漢學家中最年輕的一位，維克托·彼得羅夫（1929-1987），對中國十分友好，他研究魯迅、瞿秋白、巴金、老舍、郁達夫……著述等身，受同行們尊重，受同

學們愛戴，但一直是大學裏沒有任何職稱的老師。原來，50年代初，他在大學讀書時便愛上了艾青的詩，他的學位論文選題為《論艾青》。為此，他對艾青的詩歌創作及生平事蹟做了全面研究。誰料在準備論文答辯時，校方忽然通知他，艾青在中國被宣佈為一個「反黨小集團」成員，因此要求他改換題目。彼得羅夫經過一番思考，決意不改。他向校方表示：「我可以不要學位，但我不能背叛學術良心。」——這就是為什麼在事隔二十多年後，高莽與他重逢，聽說他身體不好，關心地問他病情，他沒細說，卻殷殷打聽中國老一輩作家在文革後的情況，特別是艾青。

可惜彼得羅夫已經在1987年，59歲時過早地逝世，然而他不肯違背自己良心，不惜犧牲「功名」的士節，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高莽書裏還介紹了風格不俗、很有特色的赫魯曉夫墓。那墓碑由黑白兩色花崗石交叉組合，兩者中間托着完全寫實主義的赫魯曉夫頭像。這一墓碑的設計者是著名的現代派雕刻家涅伊茲韋斯內（Ernst Neizvestny）。在這位雕刻家和赫魯曉夫之間還有一段「官司」。1962年，赫魯曉夫率領黨政領導全班人馬參觀莫斯科美協成立三十周年的畫展，看到一些非現實主義的作品（其主要作者是涅伊茲韋斯內），就以粗野的話訓斥他，而他也毫不示弱，跟這個大人物頂撞。赫魯曉夫罵他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錢，拉出來的是狗屎；涅伊茲韋

斯內反駁赫魯曉夫，說他根本不懂藝術，是外行，是美學領域的文盲。

赫魯曉夫下台以後，想和文藝界緩和關係，邀請挨過他批評的文藝界人士到家中作客。他三次邀請涅伊茲韋斯內，涅伊茲韋斯內都沒有去。

赫魯曉夫去世後，赫魯曉夫的兒子找到涅伊茲韋斯內，請他為父親設計墓碑。雕刻家表示同意，但提出條件：按他自己的想法做，別人不得干涉。他後來才知道，請他設計墓碑是赫魯曉夫的意願。按照赫魯曉夫的遺囑，請涅伊茲韋斯內設計的墓碑，最後成為一件吸引廣泛注意的作品。墓碑的構圖費人疑猜，誘人思考，而雕刻家與赫魯曉夫的關係，也給人以深長的啟發。

2000年7月25日

歷史的感歎

赫魯曉夫是 1971 年 9 月 11 日去世的。8 月下旬，他會見了詩人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

據赫魯曉夫的兒子回憶，葉夫圖申科講起了不久前周遊全國的見聞。最使他感到吃驚的，是當代青年對斯大林時代的鎮壓規模全然不知。他說，他在貝加爾湖會見工人、知識分子，並談起了斯大林的鎮壓。對於當時有多少人遇難的問題，有人回答是兩千來人，有人糾正說不止這個數，是兩萬來人。可見，他們連當時的大致情況都不了解！

赫魯曉夫 1956 年 2 月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報告，揭露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後果，列舉斯大林幾次大鎮壓中違反法律濫殺濫捕的若干案例。會後平反了相當部分冤假錯案。這就是人們說的「解凍」。然而因國際國內以及黨內鬥爭形勢的變化，還有赫魯曉夫本人所受意識形態體系的局限，在「解凍」的幾年中也時有春寒襲來。單是在蘇聯文藝界，像赫魯曉夫和葉夫圖申科談起的雙方都難以忘懷的 60 年代，當時赫魯曉夫講過許多措辭尖銳而並不公正的話，使得他同真誠支持他事業的文學家、畫家、電影藝術家分離開來。他對葉夫圖申科說，他「為自己當初對藝術界年輕人所說的那些尖刻話而深感內疚」。

從 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罷黜了赫魯曉夫以後，直到 80 年代初，蘇聯進入了長達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許多方面停滯了，甚至倒退了，言論、出版控制加緊，儘量堵塞對斯大林時代歷史真相認知的途徑，讓青年一代懵懂無知才好。

葉夫圖申科在 70 年代初的感歎正是為此。

然而，過了不到 20 年，蘇維埃政權和蘇共黨一夜之間解體，以自身的宣告破產，使歷史的舊賬一筆勾銷。這就更加令人感歎。

勃列日涅夫不想讓青年一代了解歷史，了解斯大林鎮壓的全面情況，不能僅僅認為是思想僵化，自己僵化也教人

僵化，或者為僵化而僵化；而是由於他要打斯大林的旗子，只有打斯大林的旗子才能為自己的一套做法找到辯護的依據，要打斯大林的旗子，就得美化他，對他的暴行遮遮掩掩。這就是他為了繼承斯大林的政治遺產必得遵循的途徑，必得採取的姿態，必得付出的代價。

在某種意義上勃列日涅夫是個庸人，他既代表了反對赫魯曉夫「打破堅冰」路線的保守勢力，他就不得不反赫魯曉夫之道而行之。在他執政期間，把赫魯曉夫曾經為蘇維埃政權和蘇共黨贏得的一線轉機堵死了，扼殺了，不可挽回地輸光了，而為幾年以後的徹底瓦解埋下伏線。

1989 至 1991 事變以後，為已經消失的前蘇聯和蘇共黨唱輓歌的人裏面，有幾個是 70 年代初對斯大林鎮壓不甚了了的青年？

可見，一個黨一個政權，向青年一代掩蓋自己歷史上的陰暗面，並不能避免自己的危亡。

70 年代初詩人葉夫圖申科見到的那些「當代青年」，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他們當時對斯大林鎮壓的實況了解不多，但後來的二三十年間未必不會增進了解；官方封鎖真相，卻還有民間渠道，官方只是限於教科書和新聞出版，民間渠道卻是口碑千萬，無法一一審查，甚至難免在如實的基礎上加以誇張。這恐怕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始料不及的。

70 年代的青年之後，更年輕的一代在蘇聯易幟前後正是最活躍的社會力量。他們也許仍然是對斯大林暴政知之不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蘇聯體制的顛覆者。他們的出發點，應該已不是上幾代人從斯大林時代積累下來的宿怨，而是對現體制的反彈，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嚮往。

可見那種以為只要掩蓋了斯大林大鎮壓的真相，不讓人們知道暴行的規模，使大家安於一片光明的歷史敘述，就可以維護蘇聯的長治久安的想法，其實只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自慰猶可，要長久地欺人則是徒勞的。

何況，使葉夫圖申科吃驚的，是當時那一代青年「對斯大林時代的鎮壓規模全然無知」，這當然令人遺憾，就如中國人不知道整個抗日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或南京大屠殺受難者的人數等等；但從一個普通人的感情來說，一個案例就足以決定愛憎的態度和是非的立場。這一點，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宣傳教育影響下的中國人，是有深刻經驗的：在內戰時期人民解放軍的戰前動員中，一出秧歌劇《白毛女》，一個黃世仁欺壓民女的惡行，就激發起萬千戰士「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昂揚鬥志，是並不需要了解全國惡霸地主以至整個國民黨政權欺壓民女以至迫害百姓的「規模」的。

假如勃列日涅夫之流能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時那樣，把歷史真相逐步告訴人民，與人民一起面對歷史，總結經驗，對症下藥地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也許事情的進程會是另一樣，至少勃列日涅夫不會落下拖歷史後腿的千古罵名吧。

但歷史不承認「假如」。這也是歷史之所以常不免讓人感歎了。

2000年11月15日

三月五日斷想

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時在1953年，距今四十八年，幾近半個世紀。

現在連斯大林是不是死在這一天，都成疑案。據回憶，這個偉大人物到晚年更加多疑，周期性地進行清洗，眾星拱月般隨侍左右的政治局委員們，差不多都預感到又一輪逮捕刑訊和屠殺快要開始了。聽斯大林寢室外的警衛報告，斯大林沒有按時呼叫他們，室內了無動靜（因規定他們不傳喚不得進入室內，有點像曹操，臥榻不許接近）；這些「近臣」們竟然默契地故意拖延時間，不去「定省」，拖延了多少時

間其說不一，總之破門而入時，斯大林不在床上而倒臥在地板上，如訃告所說，偉大的心靈已經停止了跳動。

接着，發公報、下半旗、排隊弔唁、開會追悼、組織專家設法保存遺體……機器開動，按部就班，全世界各國首腦政要，唁電如雪片飛來，全世界共產黨人及他們影響下的無產者和進步人士同聲一哭，誰也不曾懷疑斯大林是死於3月5日，還是4日、3日？

這樣一個偉大人物，誰來接替他？誰能夠接替得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中國的《人民日報》，並排發表了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貝利亞三人在追悼大會上的講話。幾個月以前，蘇共剛剛召開了十九大，斯大林致開幕詞，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主報告，我們也人手一冊學習過的，因此馬林科夫我知道；莫洛托夫是老外長了，早就聞名；只有貝利亞，儘管他在蘇聯國內赫赫有名，主管克格勃，權傾朝野，但對不住，我是頭一回聽說。不過總算讓人放心，蘇聯不會群龍無首了。

隨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葬禮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回國後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這篇只在《文藝報》而沒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文章題為〈燦爛的星座〉。他告訴我們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強調集體領導，集體領導的成

員組成了「燦爛的星座」。這個形象的比喻，很富感染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這樣稱譽一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這篇署名散文沒有發表在作者主持的中央機關報上，使之不具有權威的性質。黨報有黨報的口徑，所以柳亞子的詩詞一經刊佈，傳誦一時：「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

集體領導，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新名詞，卻是一件新事物。蘇聯是因為像斯大林這樣蓋世無雙的偉大領袖出缺，才用一個形同星座的領導集體來填補的。然而，不幸，即使是燦爛的星座，在天體運行中也會出現分化。

第一個是貝利亞出局，距他登場不過一百天光景，說從來是英國特務云云，到年底據聞就處決了。

四年以後，1957年7月，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Nikolai Bulganin）又作為一個反黨集團出局，不過這回沒有殺，莫洛托夫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當大使，另兩位前後任的部長會議主席則發配到邊疆州。

赫魯曉夫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來兼任部長會議主席，儼然又是眾星拱月的格局，遠在北京的鄧拓該也喟歎燦爛的星座之不存了。

這樣，直到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趁赫魯曉夫到黑海邊休假之機，「捏估」（編按：指暗中商量計議）好了，請赫魯曉夫回來開會，讓他自己辭職，這也是學的赫魯曉夫

對付那個「反黨集團」的做法——突然襲擊。後來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特別不滿的，也是對所謂赫魯曉夫式人物格外加以提防的，就是這個「突然襲擊」：一是赫氏 1956 年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那時斯大林屍骨已寒，更無知覺，談不到突然襲擊，襲擊的是蘇共黨各級領導和毫無精神準備的黨員和人民，以及獲悉這一秘密報告的各國黨的領導和黨員；二是 1957 年 7 月赫氏打掉莫洛托夫等人，是動用軍用飛機把各地中央委員匆匆拉來開會，形成多數，合法地罷黜的。

不過，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也學了赫魯曉夫對政敵採取不殺之例，比斯大林那時文明多了。赫魯曉夫只被驅出了政治舞台，處於軟禁之中，以迄作為「養老金領取人」去世，塔斯社（編按：前蘇聯國家通訊社）是以這個頭銜稱呼之，《人民日報》轉發新華社電訊則標題曰「赫魯曉夫死了」，這個標題被中國新聞業務刊物和新聞寫作教材當作範例稱引多年。

進入 60 年代以後，毛澤東強調提出了選擇接班人問題，並且強調不要「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接班。但他把赫魯曉夫式的「突然襲擊」，更多地看作個人品質問題即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問題，而多少忽略了宮廷政變的土壤就在於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君不見《資治通鑒》記載了成百宗父子兄弟相弑相殘的血案，都是為了爭奪皇位或皇位繼承權麼？「二十四史」之被稱為「相斫書」，那相斫的斧鉞首先

揮舞在蕭牆之內、宮廷深處。而毛澤東以為只要繼承者是自己信得過的忠心耿耿的人，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心懷不滿可能在身後作秘密報告的人，就可以「放心」了。為此，他目光四射地瞄定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身上，必欲肉體消除之而後快，回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老路上去；青出於藍之處，是不僅依靠「專門機關」，更要發動億萬群眾，他擔心「專門機關」也不在自己手裏，乃不惜「砸爛公檢法」焉。

勃列日涅夫蟬聯十八年，直到「正常死亡」，可謂幸甚；而他的後任安德羅波夫接班沒多久就因為遽然逝世，把班交給了比他年紀大的病號契爾年科了。現在有人對他的猝死是否屬於「正常死亡」提出了質疑，我們局外人隔着時空間距，也覺得確有可疑之處。因為在他當政時，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¹和蘇聯的國防部長在1984年12月一個月裏先後逝世，其中三人死於「心肌缺氧」，而我們知道「心肌缺氧」並非傳染病。難道他們相約躲到天堂上去討論華約國家的安全問題，需要請安德羅波夫蒞會主持嗎？

這些隱秘，怕只有等各國有關檔案解禁以後，才有揭破的前提。安德羅波夫從勃列日涅夫手裏「和平接班」，這是

1 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至1992年間歐洲一個國家，1993年解體後成為今天兩個獨立國家——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

我們看到的一面；由於幕後都是暗箱操作，不知道勃列日涅夫生前跟他的同僚是怎麼「捏估」的，其間是不是「和平」，或者各種不同意見暫時妥協，致使安德羅波夫得票佔了微弱多數；但安德羅波夫上台以後，隨着他雷厲風行地對貪污案件採取強有力查處的措施，國內政壇特別是黨內高層中各派勢力的平衡難免發生變化，他能否免於「非正常死亡」，也就成了問題。

後來是年紀大於安德羅波夫的病號契爾年科繼位，給人以顛預之感，來不及看到他的政績，倒是「壽終正寢」了，至少在客觀上成為一個過渡性人物。

戈爾巴喬夫以後的事就不說了。近事不好說，遠事好說，除了因為有了一定的距離，比較容易看清之外，還因為時過境遷，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背景更清晰地顯示出來；當然，也會有一些資料被相關的人帶到另一個世界去。然而，即使像斯大林那樣趕盡殺絕，把列寧時期的老近衛軍幾乎消滅乾淨，那被《聯共（布）黨史》弄得是非顛倒混亂不堪的幾十年歷史，終於也還是逐步澄清了。

我想，歷史本身有一種力量，就是要以本來面目面對後世的人們。想要篡改歷史的人，就像要一手遮天，總是心勞日拙的。弄清蘇共每一屆領導人權力繼承的內幕，不過其中一個小題目罷了。

2001年3月5日

重過莫斯科

此身雖在堪驚

從 1957 年春天初訪莫斯科，到 2003 年秋天重來，間隔了四十六個年頭。在天文時間裏，這簡直算不了什麼，在個人，卻是「朝如青絲暮成雪」。許多歷史上傑出的人物，一生也沒活這麼長，契訶夫 (Anton Chekhov) 才 44 歲就病死了，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只在人間逗留了三十八年！

而在人類歷史上，這四十六年經歷了太多叫人不勝滄桑的大變動。我們是 1956 年蘇共二十大後第一個出訪蘇聯

的中國記者團，又正當 1917——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赫魯曉夫在接見時，讓我們捎個口信：他們準備以盛大的慶典迎接毛澤東同志的到來。我在此行中寫的組詩，就題為《第四十個春天》。詩集排好了版，沒有問世。因為就在毛澤東率團去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的同時，我正式成了反右派鬥爭的對象。這個政治運動，不僅像是斯大林時期所謂「肅反擴大化」的重演，而且使人聯想到十月革命勝利初期，清除立憲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以及對廣大知識分子的鬥爭。我和我的幾十萬同案者們的命運，就這樣跟十月革命聯繫起來。

其後，在冷戰一方的社會主義陣營裏，陸續發生了一幕幕觸目驚心的事變。號稱「牢不可破的友誼」而結盟的中蘇兩個大國，由互相指責的所謂論戰而終於分裂。在我們這裏，三年大饑荒，死人無算，十年大動亂，更是冤獄遍於國中；在蘇聯那裏，一度說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然而衛星上天、軍備競賽和打擊持異議者，都不能消解幾十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和民間積怨，最後出現謎一樣的突變，曾以列寧斯大林為旗幟的政黨、政權一朝瓦解。

俄國人也許從戈爾巴喬夫提倡公開化，特別是近年公開蘇共檔案以來，對幾十年的歷史有了較多較深入的了解。我們中國的普通人，若說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未免有些牽強，因為大家離真正的廬山遠得很，廬山遠在萬千里外的雲霧之中，我們對歷史深層的所知，正合着香港人愛說的「一頭霧水」。

照例到光線微弱的列寧墓裏去看望逝世近八十年的列寧。魚貫而行的不少是俄國老太太，神情凝重，只是注目為禮。倒是有些 60 歲左右的中國遊客，多半是上世紀 60 年代的大學生，繞過列寧遺體時，鞠躬如也，就像在八寶山的告別儀式上似的。

在列寧墓外，跟他做伴的，盡是蘇維埃政權時代的頭面人物。斯大林的遺體在 1961 年 10 月蘇共二十二次黨代會後從列寧墓遷出，焚化了埋在後面赭紅的克里姆林宮宮牆牆根。有一些蘇聯元帥和蘇共總書記，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依次排列着；文秀（編按：作者妻子）數過來，發現沒有赫魯曉夫，一問，才知道，這裏都是在總書記任上去世的，契爾年科雖只當了年把，死在任上時身份仍是總書記，而赫魯曉夫雖當了十一二年的總書記，可沒死就下了台，死時的塔斯社消息已只稱之為「養老金領取者」了，故不在塑像之列。然而我們接着發現，排尾的一個是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並沒當過總書記，置身於此，類乎破格，但他是幾朝元老，據說頗有操縱一切的權力和手腕，他又是意識形態的主宰，多年來力圖控制蘇聯人的精神世界。原來立像的

標準是靈活的，出於某種需要，全在掌握之間。我和文秀相視而笑，不再追問。

不過，在這個顯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參觀的死者，都不得不跟他們的夫人分開。我就在新聖母公墓裏，發現了蘇斯洛夫的夫人蘇斯洛娃的墓，不遠還有赫魯曉夫的墓、布爾加寧的墓，以及赫魯曉夫為首的政治局委員裏惟一的婦女，一度風頭甚健的文化部長福爾采娃（Yekaterina Furtseva）的墓。這個公墓似有一個好處，只講先來後到，不以身份為序，因此參差錯落，也顧不得死者們生前的恩恩怨怨了。

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觀光的人，差不多都被人領到這個公墓看看，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茲雪夫神父公墓那樣。這些墓園也的確比我們國內的公墓好看，因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設計，有的堪稱藝術匠心之作。北京現在除了八寶山之外，也又開闢了些新的公墓，闊人和他們的家人子女，開始關注身後的陰宅了，日積月累，將會形成一些新的旅遊景點吧。

高莽著的《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一書圖文並茂，其中芭蕾舞大師烏蘭諾娃（Galina Ulanova）的墓前還是一幅照片，這回已經代之以她《天鵝湖》舞姿的立體雕像。公墓的另一處，又見一座全身雕像，當代職業婦女的裝束，原來是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Raisa Gorbacheva）。在這裏，她是新來的。

走出墓園，已近黃昏，驟雨微晴，有一線斜陽透過雲層，一陣風來，梧桐葉落，不禁想起「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句子。不過這裏一切清掃得乾乾淨淨，規規整整，沒有詞裏那般的蕭颯。

回想四十六年前，那「第四十個春天」，雖說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經過波蘭、匈牙利接連的動盪，我們恍惚感覺到國際共運的某種危機，社會主義陣營不再是一片玫瑰色，但我所受的政治薰陶，仍然使我懷着朝聖般的心情。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批判和革命傳統，加上十月革命以來中國革命者「到莫斯科去」的浪漫行跡，深入我們的心，使我們對「新俄」幾乎天然地懷着好感，加上蘇聯畫報、電影歌曲對視覺和聽覺的衝擊，說起蘇聯，陽光與鮮花更像是無可更易的主調。我在當時團裏算是年紀小的，比我大十歲二十歲的人其實也都差不多。我們那次訪問的政治色彩很濃，我們的任務本來就是要報道十月革命四十年的成就，藉以修補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綻的蘇聯和社會主義形象。我們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是輝煌、偉大、歡樂、幸福，縱的與十月革命前「生活像泥河一樣流」的日子相比，橫的與西方世界的兩極對立和「垂死沒落」、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貧窮痛苦相比；這是既定的宣傳要點，也是採訪時的指導思想。

這回迥然不同了，我們夫婦只是私人遊歷，她是初來，我雖說是重遊，卻並不為了懷舊。經過幾十年的政治變遷，那些團結一致或你死我活的政壇人物一個個出局了，去世了，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依然在俄羅斯這片遼闊廣大的土地上生活着，這才是真實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太陽升起的真實生活。

我在四十六年前初來時，接待過我們的，我們採訪過、接觸過、邂逅過的朋友，滿街上的行人，大劇院裏的觀眾，其中中年以上的想必都垂垂老矣，當年四十多歲的人，如今還有多少健在的？反正我們記者團的成員，除了我和新疆的富文（他當時 44 歲，今已晉九），別人都不在了，有兩位，劉克林和丁九，還是在文革中自盡的。

站在紅場一角，不是憑弔一個政權，而是面對着一去不復返的時間，面對着道是無情卻有情的歷史，想起我認識的和陌生的，那麼眾多的人已經不在，而我倖存，忽然覺得「此身雖在堪驚」！我得以苟活到今天，是怎樣的際遇，怎樣的偶然。

誰能自由呼吸

歷史上，生活中，一切假設都是蒼白無力的。但我從小接受替別人着想的道德教諭，學會「設身處地」，後來愛好了文學，這就轉化成一種身份和境遇的假設。

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 1957 訪問蘇聯，我倒沒有想像自己在四十年前的 1917 躬逢其盛，那時候連瞿秋白還沒有到「赤都」來，張西曼¹似也還只在遠東海參崴一帶，傳說親眼見過列寧的柯慶施²則還不知道在哪裏；但我確實想過，我若在 1927 年來到莫斯科，我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我的叔父年輕時，1926 年在上海，即將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學習，不幸被軍閥孫傳芳逮捕，從此改變了一生的道路。如果他那時成行，到了莫斯科，在爾後的年份裏，他會跟着米夫、王明大抓「托派」、大反「江浙同鄉會」等等，還是抵制反對，而被加上托派的罪名，遭到流放、監禁或遣返回國？簡直全都不敢想像。

說到 1937 年，自然不會假設自己在莫斯科，而是想像我逃離淪陷敵手的北平，然後或從津浦路南下，或到平西平北投身抗日武裝。到了 1947 年，真的參加革命的時候，是為「最低綱領」即為打倒蔣介石，建立一個由「聯合政府」執政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心目中卻想望着「最高綱領」從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蘇聯乃是叫人神往的樣本。那時候總是悄悄地哼着姜椿芳譯詞的《祖國進行曲》：

1 張西曼（1895–1949），男，湖南長沙人，中國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左翼人士，被視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者。

2 柯慶施（1902–1965），男，安徽歙縣人，50 至 60 年代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一。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記得艾青有一首詩，說他行走在中國西部高原的公路上，「像那些阿美利加人/行走在加利福尼亞的大道上」一樣，為此受到批評。說來慚愧，我哼着這首蘇聯電影插曲，就如哼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似的，彷彿我也把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作了自己的祖國，並且以這是惟一可以「自由呼吸」的國度而「自豪」。這是40年代一個傾心於共產黨的少年的心理。說來跟30年代把革命根據地叫做「蘇（維埃）區」，以至刷出「擁護蘇聯」、「保衛蘇聯」的標語，如出一轍。這種心理機制，由於《共產黨宣言》論斷「工人無祖國」，以及有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宣傳教育，而更加強了。如果為自己辯護的話，可以說，這是因為生活在蔣介石國民黨治下，實在感到窒息，難免嚮往着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罷了。

何滿子後來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說：其實在那片國土上，當時能夠自由呼吸的，大概只有「克格勃」。

克格勃的全稱，應該是蘇聯的國家政治保安局或國家安全委員會吧。安全機構是各國都有的，並無足怪。克格勃

卻因它把觸角伸向「鐵幕」之外的各個角落，而為世人所熟知；它在「鐵幕」之內的作為，是直到斯大林死後才逐漸透露出來的。它現在已經成為包括它的前身「契卡」（十月革命後的肅反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格別烏」（蘇軍參謀部情報總局）在內的一個代詞。在漫長的斯大林時代，在蘇聯國土上有這樣一支聽命於斯大林的別動隊，不但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蘇維埃之上，而且凌駕於蘇聯共產黨之上，單是 1936 到 1939 這三四年間，就有一半以上的蘇共黨員，一百二十多萬人曾被逮捕，只有五萬人獲得釋放，就不必說千千萬萬非黨的蘇聯公民了。

回望斯大林時代，在第一線上衝鋒陷陣，以革命的名義進行搜捕，乃至動用告密、偽證、刑訊等非法手段，鎮壓異己、濫殺無辜的組織者和執行者，就是這支別動隊。它罪無可逭地成為人民群眾怨恨之所集。因此，當民怨爆發的時候，首先就把克格勃辦公樓前矗立了幾十年的捷爾任斯基塑像，套上繩索拉倒了：這個十月革命前後列寧的親密戰友，被當成了專制極權血腥統治的象徵。

不過，十幾年後，這回我在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上，看到迎面而來的一艘貨船，沿用着「捷爾任斯基號」的老船名。而且，據說他那被拉倒的石像已經另外擇地重立起來。我不相信這是像有人說的，因為普京出身於克格勃，對這位契卡

老領導、高高瘦瘦穿馬靴的波蘭人格外關照；而多半是由於在老一代俄羅斯人的記憶中，把他在革命狂飆時期的肅反行動，跟建立星羅棋佈的「古拉格群島」區別開來，捷爾任斯基去世較早，沒有參與過後來的事。而且，不但是捷爾任斯基，還有早夭的斯維爾德洛夫（Yakov Sverdlov），若是一直活到 30 至 40 年代，能不能逃脫主要針對老近衛軍的屠戮都很難說。

斯大林時期的恐怖行動，應該說從 20 年代反「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聯盟」等一系列對「反對派」的鬥爭已肇其端，到 1937-1938 年的莫斯科大審判形成一次高潮，那兩年裏，以「反革命活動」罪逮捕了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1,996 名代表中的半數以上（1,108 名），逮捕和處決了這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的 139 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 98 名，達到百分之七十。三次莫斯科大審判以受審者百分之百的當場服罪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實際上所謂「清洗異己分子」沒有就此煞車，更大規模地斬盡殺絕的行動指向了遠不是什麼反對派，而只是斯大林自己疑神疑鬼的，下面投機者告密的，更不用說多少表現出對其政策、做法有些異議的人物，幾乎是所有他昔日的追隨者、合作者。

即使是在他唆使下為製造恐怖出盡全力的人，例如在貝利亞之前，曾於 30 年代任內務人民委員的亞戈達

(Genrikh Yagoda)、葉若夫 (Nikolai Yezhov)，也先後被斯大林除掉了。由此可見，何滿子先生只說對了一半；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就連「克格勃」也不能「自由呼吸」。

聽說美國中央情報局門前有一座南森·黑爾 (Nathan Hale) 的雕像，他是二百多年前獨立戰爭中受華盛頓派遣，打入英軍收集情報，身份暴露被處死的青年英烈，一向稱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間諜，受到人們的尊崇。我想，由於美國的政權穩定，總是按程序如期接替，從來沒有翻天覆地顛覆歷史的民變，加上南森·黑爾所標誌的傳統，是對外而非對內，為人們常情常理所能接受，因此，這座石像才得以屹立至今，安然無恙吧。

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在反法西斯的隱秘戰線上功勳卓著的佐爾格 (Richard Sorge)，雖是德國人，卻屬於蘇聯特工系統，由西歐轉戰東方，最先從日本軍方獲取了希特拉將進攻蘇聯的情報。儘管不幸犧牲，而他的大智大勇彪炳史冊，贏得我們的尊敬。對中共特科的潘漢年，我亦作如是觀。他們不是為金錢受僱於人，而是為理想而鬥爭，為理想而不惜赴死，尤其在二戰中，不僅為本民族，也是為全人類做出貢獻。

撇開意識形態的差別，凡是稱職的國際諜報人員，其智商和意志都必有過人之處。移之於其他的領域，也會另有所成。然而，在今天俄羅斯的高級公職當中，據說原克格勃

人員佔到四分之一的比例，這將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產生什麼影響呢？

斯大林的陰影

赫魯曉夫曾經建議在莫斯科樹一座紀念碑，來紀念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受害者。這似是在 1961 年冬又一次為這些受害者平反的浪潮中說的。此後不到三年，他被同僚們逼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平反的工作大大放慢以至停頓；像布哈林這樣的代表人物，是直到冤死整整半個世紀後的 1988 年，他的妻子拉林娜才從「黨的新一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那裏收到了平反通知書。

這樣，儘管我們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看到了各個時期多種多樣的宮殿、教堂、雕像和紀念碑，惟獨沒有看到斯大林時代受害者的紀念碑。

但在過去不曾注意到的建築上，卻看到了斯大林的陰影。

走出紅場東頭重建不久的伊維爾門（復活門），不遠有一座上世紀 30 年代建成的莫斯科賓館，乍一看也平常，經人指點，看出與平常的同類建築不同之處：當時蘇聯的大型建築都講求對稱，這個飯店偏不對稱；原來，曾把外觀設計圖紙送給斯大林審查過——他管得真夠寬的，不但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一張圖紙上並列畫着兩座樓的圖樣，不料，

斯大林在兩圖之間簽了個名，他究竟屬意哪一個呢？誰也拿不准，誰也不敢去問，結果，只好把兩個圖樣彙合到一塊兒施工，出了這麼個折中的產物。幸好斯大林日理萬機，沒再過問，深居簡出，也沒看到，最後終於淡忘了吧。從這兒也可想見當時的工程師怕官員，官員怕斯大林的秘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個個都誠惶誠恐，免得惹禍上身。上有不測之威，下必有「全軀保妻子之臣」。

但要真的自保也頗不易，豈止不易，甚至很難。在莫斯科河邊我們還看到一座大樓，跟前面那個賓館一樣，都是遊覽指南或風光明信片上見不着的。離有名的紅十月巧克力廠不遠，為紀念俄羅斯海軍建軍三百周年，新豎了彼得大帝屹立軍艦上招手的紀念雕塑，很別致的；兩者之間，有一座老樓，主樓六層，兩翼各有十一層（這回是對稱的），並在最上面加蓋瞭望樓式的帶頂露台，單是正面就有近三百面窗戶，足見規模之大，整個看來，不說是莊肅巍峨，也算得敦實厚重。這就是有名的「濱河街公寓」，住的盡是黨政軍的高官。儘管他們全都各有別墅，這裏無疑是「黨和國家」為他們安置的第一住宅，妻兒老小，聚居於是。所以如此集中，當然是為加強領導幹部的安全保衛，同時，也便在封閉式管理的同時加強了對他們的監視。

這樣說並不過分。事實很快就證明，在30年代中後期，這高級住宅裏成百的家庭，恐怕無不惴惴不安，朝不保夕，

擔心隨時會有什麼不幸發生。這不用第六感覺，因為不斷有人在家裏被捕，押送出門，有去無回了。

1935年蘇聯冊封的第一批元帥一共五人，有三位就此遭到肉體消滅。

首當其衝的，是1937年6月11日午夜槍決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ikhail Tukhachevsky）。說起來他跟毛澤東同年，當時只有44歲，出身於革命前的軍事世家，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曾任方面軍司令，有勇有謀，能征慣戰，1925年32歲時就曾任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後來又歷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副國防人民委員。其間，位置在他之上的「騎兵派」老將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對這個貴族出身，戰功卓著，卻又鋒芒畢露的年輕將領懷有敵意，多次向斯大林進言，說此人不可重用；後來圍繞着國防現代化問題的爭論，他們之間的矛盾也白熱化了，圖哈切夫斯基研究新形勢下的戰略戰術、軍隊建設和裝備現代化，發表了許多理論著作，但是在具體實施上總是遇到伏羅希洛夫為首的「騎兵派」的頂牛，因為伏羅希洛夫斷言「坦克大軍是遙遠的未來的事，目前用不着組建」，一來二去，勢同水火。圖哈切夫斯基跟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和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商量後，直接向政府提出：伏羅希洛夫不稱職，應予撤換。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伏羅希洛夫對他的指責，從前些年說是「托洛茨基提拔」的愛將，升級為「違法恐怖活動和叛國陰

謀」了。這是圖哈切夫斯基被害的國內背景，即他與「騎兵派」之間的鬥爭。

此外，還有一個致命的國際背景。過去流傳的多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秘密報告」的說法：希特拉授意德國間諜機關偽造了圖哈切夫斯基勾結德國將軍的假情報，然後故意讓它落入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Edvard Beneš）手中，貝奈斯出於好意向斯大林通報，而斯大林把假情報信以為真，下令處決了圖哈切夫斯基等高級將領。

據蘇聯歷史研究者徐克琬先生告訴我們：蘇聯解體後，原內務部檔案曝光，發現這跟捷克總統沒有關係。所謂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政變和充當間諜的情報，乃是「出口轉內銷」。簡單地說，是蘇聯內務部特工部門，為了打進國外流亡組織「全俄軍人大同盟」，並且迷惑外國間諜機關，早從20年代起，就精心策劃了一場「秘密遊戲」，編造說蘇聯國內有一個秘密組織——俄羅斯中央保皇聯合會，由在紅軍中服役的許多舊軍官組成，包括總參謀長圖哈切夫斯基在內，都敵視蘇維埃政權，並有能力領導全俄反蘇勢力推翻它。為什麼指名道姓利用圖哈切夫斯基的名義呢？因為他祖先世代是沙俄近衛騎兵團軍官，他本人在革命前的軍隊中還獲得過沙皇頒發的勳章；以他為「誘餌」，可以增加假情報的迷惑力，使國外的白俄勢力容易相信。其實，內務部的這一「創意」，也曲折反映了蘇聯黨內軍內對於來自舊軍隊的軍官的不信任感。

這個「秘密遊戲」自然只有內務部門極少數人知情。他們拋出的假情報，經過白俄流亡組織轉告所在國的情報部門，又為一些新聞媒體獲悉。一時，所謂圖哈切夫斯基勾結德國，圖謀政變之說，在柏林等地甚囂塵上。蘇聯情報部門、駐德使館和記者，紛紛把這些情況報告國內。現已解密的斯大林私人收藏檔案中，涉及圖哈切夫斯基的，除了前此被捕人員屈打成招的供詞以外，還有內務部有關「總參分子案」的綜合彙報，以及大量駐外人員上報的外國報刊資料。這些成為斯大林下決心逮捕圖哈切夫斯基的重要依據；不過，據說直到下逮捕令的前一周，斯大林對圖哈切夫斯基當間諜的情報也並不完全相信，促使他最後下決心以「托派軍事陰謀集團」起訴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還是「反托」鬥爭和黨內軍內鬥爭的需要。

隨之大開殺戒。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妻子和兄弟，跟他一起被捕，也都被槍斃（他的母親和三個姐妹關進了集中營，母親和一個妹妹死在裏面）。殺戒一開，人人自危，懷疑一切，告密成風。在軍隊裏，凡是曾經與托洛茨基有過接觸、與圖哈切夫斯基關係較好和對伏羅希洛夫不滿的人，全都在劫難逃。這次大清洗，使三萬五千多名軍官成為犧牲。其中包括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 85 名委員中的 75 名，5 名元帥中的 3 名，15 名集團軍司令中的 13 名；還有 85 名軍長中的 57 名，196 名師長中的 110 名，406 名旅長

中的 220 名。所有 11 名副國防人民委員，海軍、空軍總司令及參謀長，各軍區司令及其繼任者全被處死。上校以下軍官被殺的多達三萬人。捎帶說一句，這麼多被處決的人當中，經最高當局授意的不到十分之一，什九屬於自下而上的加碼，有的是刑訊逼供亂咬出來，有的是由於告密，原因多種，挾嫌的有之，嫉妒的有之，眼紅別人老婆漂亮的亦有之；誰說蘇聯搞大清洗只靠專門機關，它也有群眾基礎。

結果，希特拉喜出望外，興高采烈地說：「蘇軍不堪一擊了，他們沒有統帥了。」於是加速了全面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畫的進程。到 1941 年夏天德軍入侵時，蘇軍指揮官近四分之三任職不到一年，面對德國大規模機械化兵團的閃電戰，幾乎不知所措，被動挨打，大片國土被佔，大批部隊受損。時任西北方面軍司令的伏羅希洛夫在列寧格勒一線，不去發揮自己擁有的火炮優勢組織有效的防禦，一味熱衷於組建只有獵槍、長矛和匕首的工人大隊，以致這座名城險些淪陷。歷史證明當時圖哈切夫斯基要求撤換伏羅希洛夫的意見是有遠見的。而在 1957 年初蘇聯總檢察院決定撤銷當年特別軍事法庭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一案的判決，蘇共中央決定恢復此案中圖哈切夫斯基等八人的政治名譽時，伏羅希洛夫還大發雷霆，堅決反對。

就在那年 4 月，正是我們訪蘇期間，伏羅希洛夫一行在中國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毛澤東陪同這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乘車過街，途為之塞。老詩人田漢顯然是出自真誠地寫了長篇古風，歌頌「伏老不伏老，澤東真澤東」。這也不奇怪，當時誰能知道這個貌似忠厚的老頭手上沾着自己同志和部下的鮮血呢？我記得一首頌揚「我們的伏羅希洛夫」的長歌：

聯隊光榮地騎着馬過草原，
白天黑夜跨過山和谷，
我們的原野遍地開滿鮮花，
騎兵在歌唱我們的國家……

這是一首合唱曲，我不止一次聽過也唱過。假如我們身在 30 年代的蘇聯，也會在詩人和作曲家的帶領下，跟着「第一騎兵集團軍」的統帥伏羅希洛夫，去反對圖哈切夫斯基的「現代化」嗎？

這座莫斯科河邊的濱河街公寓，多年來被人們看作一所凶宅。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讓一些「新貴」看中，一經豪華裝修，身價立時見漲。喬遷來此的，顯然都早成了「徹底的唯物論者」，不但掌中有權有錢有產有物，還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自信能避免厄運上身吧。

新貴和「老貴」

斯大林的陰影，對今天中年以下的俄羅斯人來說，似乎已經不成其為陰影。他們面對的是新的生活，新的矛盾。經過盧比揚卡監獄所在的廣場，不會像過來人似的心有餘悸，他們笑談，聽說克格勃機關大樓地下還有十幾層秘密建築：是真事，還是傳言？

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天，巡禮市容的時候，就聽到人親切地說起莫斯科市市長盧日科夫（Yury Luzhkov），他是在莫斯科上學、結婚、走上仕途的，人們對他知根知底，如說他小時候，有一次因在禁止游泳的莫斯科河裏游泳，結果就那麼赤身裸體地抓到載重一噸半的警車上「遊街」。當然，更主要的是他在市長任內做出的實績，口碑不錯，連選連任。俄羅斯人現在有了對政府負責官員以至國家領導人的選擇權，不同於什麼都以百分之百全票通過的「薩達姆模式」了；莫斯科市民不會濫投自己神聖的一票。

在各階層的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員和新貴之間，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在不同收入的人們之間，依照憲法的原則協調社會關係，這是今天俄羅斯領導層所面對的課題。

關於「新貴」（據說在俄語中原是「新俄羅斯人」），到底指的哪些人，他們的經濟狀況、政治地位以至怎樣形成一個社會群落的來歷，不是我們蜻蜓點水的遊客能弄清的。不

知道俄羅斯有沒有全面的調查研究報告，請我們的譯者們介紹過來？

據譯者國仁先生介紹，現在俄羅斯的新貴中流行一種時尚，就是擁有一套蘇聯時期高官政要的舊居。這樣看，所謂新貴，不像我們中國語文裏有「富」、「貴」之分，因而單指彈冠相慶的新官，而似乎更近於我們所說的「大款」；即使其中有些是蘇聯時期的黨政官員，但顯然不是位居要津者。而他們熱衷的除了顯示自己擁有的財富以外，潛意識裏怕也還要跟「老貴」們攀比或較量一下，殆亦石崇砸珊瑚樹之流亞乎？

正如我們這裏房地產開發走紅一樣，那邊地平線上也冒出了大量的房產公司。一家本尼蘭房產公司交易過一套庫圖佐夫大街上的公寓，就因為它是前蘇共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的舊居，房價就從 40 萬美元一直叫到了數百萬美元。而最近，一套蘇聯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的舊居已賣到了 150 萬美元的天價。這套 260 平米的住宅位於克里姆林宮和國防部之間的羅曼諾夫街區，也就是人們俗稱的「元帥區」。這位元帥，自然是在蘇聯只剩下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Semyon Budyonny）兩名元帥後登上帥位的了。冷戰時期過來人都知道羅科索夫斯基的鼎鼎大名，他 1949 年被斯大林派到波蘭當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元帥還是個多情種子，當年看上了作家、詩人西

蒙諾夫的當演員的妻子，那時西蒙諾夫年輕位卑，戰爭開始後，隨軍上了前線，還寫下一往情深的詩句：

等待着我把，我會回來的……
當別人都已經不再等待的時候，
是你的等待，拯救了我的生命。

這首詩，也像歌曲《喀秋莎》那樣，傳遍前方和後方。受到鼓舞的衛國戰士們，也許就在詩歌轉告他們的，他們深信不疑的愛人的等待中永遠閉上了眼睛。

可那位同樣還屬少壯的羅科索夫斯基，也是癡情的，他竟能在每天下班後固定的時間，開車到西蒙諾夫家的樓下，凝望着那個固定的窗口。這也太無顧忌了，終於被無所不知的斯大林批評一頓，外派出去。這是研究蘇俄文學的藍英年先生告訴我們的。

在感情遊戲中受傷最重的往往是女主角。西蒙諾夫的妻子瓦蓮京娜·謝羅娃結束了自己的婚姻後，又結束了自己的藝術生涯，過早地離開人世。詩人和元帥也都逝去。元帥的故居換了新主人。

健在的政要如葉利欽，他 1985 年調往莫斯科前擔任州長時，在葉卡捷琳堡的烏拉爾社區住過一套五居室住宅，本來早已轉手，今年 6 月又由一家名為「艾斯托莫思羅科普」

的房產經紀公司在網上求售。按市價每平米大概應在 1,000 美元上下，但因為跟葉利欽的名字聯繫起來，雖標榜「特價轉讓」，房價仍可能大大飆升。因為新的富豪們渴望擁有蘇共或克格勃高官的舊居作「紀念品」，這就成為賣點。不過，這樣的「紀念品」，到底要紀念什麼呢？

葉利欽在他總統生涯畫句號前，還沒有得到對他的親屬不予追究的保證時，就在 1997 年以 484 號總統令規定：所有俄羅斯國家公務員，都有義務接受大眾傳媒的質詢，向人民公佈個人收入和財產狀況。

且看政府成員們 2002 年個人財產的資料吧（小數點後一般保留一位數，餘從略；又，人民幣 1 元約合 4 盧布，1 美元約合 30 盧布）。

總理米哈伊爾·凱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97.9 萬盧布（工資和俄銀行存款利息）；另稱私人賬戶上有 240 萬盧布（其中大約有他賣掉私宅所得的 224 萬盧布），3.3 萬美元；2002 年時只剩有一個 18 平米的車庫（因他在任總理一年前就將私人的一輛「尼桑—馬克沁」小轎車賣掉了）；不過，進入 2003 年度，他有了一套 90 平米的別墅和位於卡盧加州的六百多平米土地；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阿列克謝·庫德林（Alexei Kudrin）：109.8 萬盧布；另有兩信用卡，一存 4 萬盧布，一存外匯折

合 6.3 萬盧布；無有價證券，無私人住宅，無郊外房產（住市內公房，面積近 200 平米）；

副總理加林娜·卡列洛娃（現負責社會事務，以下為原任社會發展部第一副部長時年薪）：20.6 萬盧布；無私人住宅；另有作為副教授開課的副業收入 5.5 萬盧布；另有一輛新式九型日古利「拉達」小轎車；

原副總理伊利亞·克列巴諾夫（降為工業和科技部部長，工資高了一倍）：42 萬盧布；銀行存款利息 44.9 萬盧布；在聖彼得堡有一套面積 219.9 平米的住宅，在莫斯科州有一套面積 210 平米、佔地 5,800 平米的郊區房產；另據其本人申報，出售一家企業股份得三百多萬盧布，出售一座別墅得 14 萬盧布；

副總理維克多·赫里斯堅科（負責國家能源事務，久居白宮）：38.5 萬盧布；因經常到國內各地考察的出差補助共 32 萬盧布；在莫斯科無私人住宅，但在車里雅賓斯克州有一所 57 平米的住房和 2,300 平米的園地；

副總理兼農業部長阿列克謝·戈爾傑耶夫：39.4 萬盧布；有一套 150 平米的住宅；另有科研活動收入 1.9 萬盧布；有一輛新式九型日古利「拉達」小轎車；

新任副總理的伯里斯·阿廖申（接替克列巴諾夫）：18.42 萬盧布（月薪 1.53 萬盧布）；另有從事師範教育的收入 2.18 萬盧布；無私人住宅；

新任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部長格爾曼·格列夫：年薪 35.69 萬盧布；在莫斯科市無私人住宅；在莫斯科州有一套別墅，在列寧格勒州有一個花園；另有一輛德產「大眾」牌小轎車；

新任能源部部長伊戈爾·優素福：年薪 22.68 盧布（他兩年前的年薪是 18.86 盧布，由此可見官員薪金的漲幅）；在莫斯科有一套面積 171 平米的四室住宅，還有一套面積 645 平米的位於莫斯科廣場附近的住宅；另有一個空車庫。

據研究者趙景林說，從俄羅斯高官的財經情況申報看，在特別多變的 2002 年，大多數國家執政者的不動產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但個人收入在大幅度增加。我的所見也淺，只看出凡有公車可坐的，多半就不備私車了。

但在莫斯科，卻有一位市民，連連慶幸自己在蘇聯解體前夕買了一輛小轎車，起到了保值的作用。這位今天的普通市民，就是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吉里連科。據高秋福先生介紹，吉里連科昔日的月薪是 1,000 盧布，按當時的官方比價，約合 1,300 美元。蘇聯解體前夕，吉里連科有一萬多盧布的積蓄，他花 10,700 盧布買了輛國產轎車，至今還在使用。一萬盧布在今天，只合三百多美元，不要說轎車，連個大部件也買不來。「當時如果不是買下這輛車，那一萬多盧布，只是一堆廢紙了，」他不無自豪地說，「這完全歸功於我的夫人。當時，政府給我配備有專車，我不想自己買車。

可是，夫人認為，物價不斷上漲，存錢不保險，還是置辦點東西好。聽了她的，買了車。這真應了俄羅斯的古話：最聰明的辦法是讓女人掌權。」

這位夫人預見到貨幣貶值，卻無從預測到黨和政權忽焉瓦解。90年代的俄羅斯聯邦政府發放退休金，只承認政府內的職務，不承認任何政黨——包括蘇共執政時期的蘇共黨內職務。昔日蘇聯政府的高官仍然可以享受比較優厚的退休金，也算是一種贖買吧。吉里連科作為蘇共中央書記的職級，顯然在政府部長之上。但他一直幹的是黨務，沒在政府內任職，就只能按一般職工的標準領取養老金了。現在吉里連科夫婦倆每人每月的養老金是500盧布（折合25美元左右），在莫斯科生活貧困線（人均每月800盧布）以下。不過吉里連科在企業家協會「打工」，每月可以有1,500盧布的收入，用他的話說，「勉強餬口」。

今天的俄羅斯，退休的老人，「打工」以補養老金之不足的，到處都是。教師和律師的本職工資都比較低，但有第二職業甚至第三、第四、第五職業的收入貼補。這裏說到吉里連科，只是因為他過去身屬高層，今天與平民為伍，生活狀況反差懸殊就是了。

也曾聽說，現在俄羅斯政界和商界的活躍分子，除了年輕人外，上點歲數的，多半還是蘇聯時期各級有從政經驗

的人。他們或繼續走仕途，或幡然下海經商，「懂國情」，有「關係」，這是區別於原先的「局外人」的優勢。

吃和住

而莫斯科的普通居民，今天一般的生活怎麼樣呢？

假如在 1957 年的採訪中提出這個問題，馬上會有人拿來大堆的數字，並且領我們去看這樣那樣周密安排的樣板。

但有一個流傳了很久的政治笑話，說蘇聯時期的一個導遊對遊客介紹說：「相信到了 2000 年，莫斯科一半居民將擁有自己的飛機。」遊客問：「他們要私人飛機幹什麼？」導遊答：「這還不簡單，比如你聽說列寧格勒哪天有大量麵包賣，就開飛機搶先去排隊嘛。」

莫斯科人排隊秩序好，不加塞兒（編按：指插隊），既是社會公德水平高，也得歸功於訓練有素。早在二戰之前，捷克《紅色權利報》記者尤利烏斯·伏契克就寫文章為蘇聯的排隊現象辯護。購物需要排隊，無論如何是物資匱乏的表現，硬要從這裏看出前途光明的無限生機，怎麼也是一種矯情。這大概可算伏契克的敗筆。後來他英勇犧牲在納粹集中營裏，留下鐵骨錚錚的《絞刑架下的報告》，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豐富而崇高的精神境界，不愧為反法西斯的英雄，幾十

年來為我所敬仰。這裏重提他一篇舊文，只想說明上個世紀以「紅色 30 年代」為標誌的一個現象：不少渴望社會進步的知識分子惑於某些假象，天真地甚至盲目地說了一些關於蘇聯的過頭的好話。

不過，這一回就我目測，莫斯科終於不必為買飲食和日用品而大排長隊了。

誠然，民以食為天，能不能吃飽是首要的問題。1998 年一夜之間，又一次盧布貶值，加上銀行倒閉，無數家庭突然變成一無所有。學中文的古麗亞正從天津南開大學進修回來，一時非常後悔沒留在中國工作。她媽媽在遠東那個我們習稱為赤塔的城市，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這時勸她說，窩裏還有自留地收的土豆，夠娘兒倆吃的，鄰居又送來一些黃瓜，就這樣度過了一個難關。現在她的戶口還在老家，人回到母校莫斯科大學東方學院旅遊專業教課。她對普京這幾年的政績，評價頗高，對現任總統寄託着信任和期望，看得出是由衷的，不是套話。

就在我離開莫斯科的 9 月 4 日，消息傳來，俄羅斯自 1997 年以來，物價第一次停止上漲；差不多同時，莫斯科市政府決定把最低工資從 1,500 盧布提高到 1,800 盧布（從業人員佔莫斯科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小型商業戶也在內）。據說在俄羅斯有十分之一的居民，人均月收入低於 2,000 盧

布；而在莫斯科，人均月收入低於 2,000 盧布的人，根本感受不到生活的改善——因為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的漲速。現在把工資提高和物價不漲兩條消息放在一起，才是叫人快慰的。

在莫斯科有一個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其首席專家伊戈爾·波利亞科夫說，收入的增長暫時還不能讓所有人滿意，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的，基本上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 2,000 盧布以上的那部分人。而在低收入人群的消費中，今年第一季度銷售的乳酪和香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 左右，這是好現象。

又聽說，從今年 2 月和 4 月起，全俄退休金的基礎部分和保險部分，分別上調了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二；這一來，跟去年比，退休金的數額上漲了 146 盧布。

前面提到過的那位俄聯邦副總理加林娜·卡列洛娃說，俄羅斯上半年的平均工資達到 5,600 盧布；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動了工資的增長，「這一趨勢表明俄羅斯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她舉出一串數字，這裏只引用兩個：在莫斯科市食不果腹的人減少了一半，在其他地區減少了近百分之三十四。在這裏沒看到絕對數字，但我以為她把正面負面的情況都講了，不是一味鼓吹「輝煌成就」、「大好形勢」，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可信。

在莫斯科，據說市民人均的實際收入（不是工資，而包括本職之外的收入，不少人另打一兩份工）達到 400 美元；告訴我們這個數字的非官方朋友說，自然，這是在「首善之區」，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略低於莫斯科，全國遠不是都能達到這個水平，還有很低的。我以為這也是實事求是的介紹。

我上次來莫斯科，除了排隊以外，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住」的問題相當緊張。曾經安排我們參觀一位老工人的新居，全家都上班上學了，只留下老工人自己接待來訪，室內倒也窗明几淨，家具全新，但一家老小，怎麼沒有一張床呢？原來或睡沙發，或索性睡在地板上。這是赫魯曉夫時期蓋的一批公房，當時也還是可解燃眉之急的，今天看來的確落後了。

在莫斯科，以至聖彼得堡，都像中國一樣，正在大興土木蓋新房。

據林瑩、劉國宏兩位說，最近的一次社會調查結果表明，近兩年俄羅斯的富人數目增加了一倍半，外地也並不遜於首都。這樣說的實證之一是，兩年前，能夠輕而易舉買下住房、別墅的莫斯科人不足百分之一，如今這樣的人已經達到百分之三了。

但另一個數字告訴我們，工資只夠吃穿的人，在俄羅斯大約佔 38.3%。他們自然是顧不上買房置業的。許多老公

房，類似我們的「筒子樓」，儘管分單元，衛生間卻是公用的，由於聚居的人口密度大，自有諸多不便。住戶們渴望這個問題的解決，看來「房源」不成問題了，怎麼去找「財源」呢？這 38.3% 的人怎麼能逐漸向那 3% 的人靠近，恐怕還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

當我聽着、想着這些的時候，總覺得事情的態勢，人們的情緒，跟我們國內很有幾分相似。也許都是處於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而大刀闊斧破舊立新不惜犧牲建立起來的計畫經濟，為時太長了，深入到整個社會機制和人們靈魂的肌理中去了，要改變它，真正建立規範有序的好市場經濟，就像要把一鍋夾生飯重新煮熟一樣，既要有時間，又得講火候。搞不好，是不是就會從積重難返流於「拉（丁）美（洲）化」呢。

然而，不管是憑我良好的願望，還是憑我短暫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感覺，我確定地看到，俄羅斯，這個像我們中國一樣曾經苦難深重的民族，正堅忍地在新的路上一步一步走着。它有堪稱雄厚的綜合國力基礎，又有基於教育普及的國民文化素質，說不定在哪一天，會以我們想像不到的飛躍出現在世人眼前。

至於莫斯科人的精神生活，那就不是我在浮光掠影短暫的旅行中所能窺見的了。

紅場上的祝福

要告別俄羅斯的時候，我又一次行在紅場上。望着綴了紅星的克里姆林宮塔頂，我忽然發現它又像王冠，又像僧帽。

紅場之「紅」（Красная），在俄文裏和「美麗」是同一個字，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解釋「美是生活」，就舉了農婦臉上健康的紅顏色作例子。遠在沙皇統治的時代，這片廣場就叫紅場了，那當然不是像後來那樣，因革命所繫的血與火都是紅的，便把「紅」當作革命的顏色。紅場的本義，與克里姆林宮塔頂的紅星不同。

中國詩人艾青，1950年來到這裏，寫了《寶石的紅星》，是把它當作革命的象徵：「讓紅星照耀得更遠更遠，照耀到每個黑暗的地方——」，亦即詩前所引莫洛托夫說的，「遠射到我們的國境之外……」

克里姆林宮建築群的建成，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而它頂上的每一顆紅星，夜夜在高空閃耀着紅色的光芒，其直徑達三米半，卻是在開始大清洗的1937年才吊裝上去的。剛剛迎來了以斯大林命名的憲法，轉過年來遭到逮捕和殺害的人們，看到過這閃閃的紅星麼？如果看到過，他們受刑後在黑暗的牢房裏會想到它嗎，如果想到，又會怎樣理解它的意義？

可惜無從問訊了。

環視這個世界有名的紅場，給我的感覺，用中國古老的套話說，是風景依稀似昔年，不但克里姆林宮城郭依舊，對面簡稱「古姆」的大百貨商場百年老樓也還是老樣子，紅場周遭沒有增添任何高樓大廈現代建築物，就如聖彼得堡恪守舊規，所有建築都不超過冬宮 33 米的高度，留出了大家熟悉的背襯藍天的風景線。我在這裏找回了 1957 年初來的感覺，只是紅場上信步覓食的鴿子似乎少了。

我又望見了克里姆林宮那個列寧辦公室的窗戶。那年我參觀時，室內是按原樣佈置的，寫字台、電話、地圖都是舊物，不像諾夫格羅德（下新城，當時改名高爾基城）的高爾基童年故居——他的外祖父家，是在拍影片《我的童年》時比照原狀放大重「搭」的。那時還參觀過列寧避居拉茲里夫湖邊的草棚，他寫《國家與革命》的地方，一切都跟同一題材的一幅油畫一樣，誰抄誰很難說，自然也是「佈景」，但我們一樣畢恭畢敬地瞻仰。我們就像那時和其後許多蘇聯人一樣，對斯大林失望了，把原來分給了斯大林的那一半尊重和熱愛收回，重又獻給了列寧。典型的心理是設想如果有列寧在，後來的所有悲劇都不會發生了，典型的一句痛徹心肺而有餘不盡的話是：「如果列寧還活着！……」

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48 年呼籲和平的長詩《讓那伐木者醒來》，寫斯大林辦公室窗口的

燈光徹夜不息，我也曾為之深深感動過。那個辦公室肯定會亮着燈的，因為斯大林有夜間工作的習慣，但他會不會不加窗幔，讓外面的人看到那燈光人影，大是問題，因為斯大林戒備多疑，他的辦公室在哪兒，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份詭秘，確實勝過列寧多多了。學者高放教授說，俄羅斯從 1497 年中央集權的農奴制建立，五百年來，其社會發展經歷了農奴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四個階段，始終貫徹軍事擴張性和封建專制性這樣兩位一體的主線。

這一回，在俄羅斯遊覽了許多有三幾百年歷史的宮殿和教堂，比上回翻了幾番。那時候的接待，突出政治，除了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之外，多讓我們看一些革命歷史的遺存，如在克里姆林宮主要是看「第二十七號哨位」守護的列寧辦公室，在冬宮則主要是看艾爾米達什博物館裏的藏畫，但不限於當代，也總算是文物和古跡了。當時，像沙皇夏宮這些景點在戰爭中嚴重破壞，還來不及修復；而各地教堂早已從上個世紀 30 年代大清洗後就都破敗或移作它用，那時從大城市到窮鄉僻壤，以東正教為主的教會，遭遇了十月革命後又一次的也是毀滅性的衝擊。這回我到北緯 62 度的基日島上，看到了完全木結構的教堂，還有教士住的木樓，一打聽，那裏的最後一位教士，也是在 1937 年殺死的。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我在國內

外走訪所謂古跡時發現，歷代統治者內部爭權奪位，劍拔弩張，「君不君，臣不臣」，以至弑父殺子，你死我活，乃是這個歷史——文明史的核心。在俄羅斯自伊凡雷帝（Ivan IV Vasilyevich）起，宮廷相斫，同樣是史不絕書。從京城莫斯科到伏爾加河邊小鎮烏格里奇，都有所謂「喋血教堂」，銘刻着一代代皇家喋血舊事。一代代沙皇，也有窩囊的，止於昏庸荒淫，倒是為害小些，而凡在史書上轟轟烈烈的，無不專橫強梁，陰險殘暴。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巡視伏爾加河，在烏格里奇發現有 10 米高的城牆，命令立刻拆掉：不許有第二座「克里姆林」！比起她殺夫廢子的作為來，這點霸道就是小菜一碟了。

彼得大帝（Peter Alexeyevich），在俄羅斯人心目中，自是一代英主，「青銅騎士」。他拓土開疆，雄謀遠略，使俄國走上現代化道路，至今為俄羅斯人尊崇稱頌。但我以為，他對外也正是高放所指沙皇政權的軍事擴張性的代表人物。

在冬宮裏，耳目所及，裝了一腦袋攻城掠地和宮闈秘辛，卻都有籍可考，不是隨便的戲說。但也正像國內電視裏連篇累牘的皇帝戲一樣，讓人不耐了。這時候，驀地看到一幅中國織錦畫，不由得眼前一亮。據說沙皇俄國在三百年前就豔羨中國的青花瓷，向中國討教製瓷的技術。中國的官方文書不客氣地拒絕了，或許是出於保護專利的考慮？但十分微妙的是，大清國皇帝卻贈送給俄國沙皇一幅織錦，仔細看

去，竟是製作瓷器的一整套工藝流程的散點長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果此事出於哪一臣工，豈不有裏通外國之嫌？怎麼皇帝就可以私相授受呢？在冬宮裏一走而過，來不及深究。這件饋贈不知道《清實錄》有無記載。中國的臣民向來只是服從皇家的管束，卻管不到皇家頭上的。

中俄兩國都有民族主義的傳統。不過也有所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是以為做外國人的奴隸，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俄國的民族主義，可就是要叫別國人做自己的奴隸了。列寧不止一次批判過大俄羅斯主義。但是，他關於廢除沙俄與中國不平等條約的許諾迄未兌現；名為列寧繼承者的斯大林，在多民族的國度，始於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而畢其一生，他在蘇聯國內怎樣處理民族問題且不說他了，在國際上，卻總是打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號，大行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之實，即在共產黨的黨際關係上，也是以第三國際的名義號令其他各黨，哪裏是兄弟黨，從來就是要當老子黨。

不過，斯大林時代，畢竟成為歷史了。

在結束了紅色帝國的時候，人們把目光轉向久遠的過去。

1918年的5月，在烏拉爾山下的葉卡捷琳堡，一陣亂槍，把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就已退位的沙皇——羅曼諾夫王朝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和他的全家處決了。

在強調與傳統觀念（包括人道主義）徹底決裂的年代，這一切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但在七十多年後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們開始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反思，於是有了尋找和發掘沙皇一家遺骨的事，甚至有了就地正式下葬，抑或移柩聖彼得堡之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聖彼得堡的喀山教堂裏，已經立這位末代沙皇為「賢人」（再高一級便是東正教裏的「聖人」了），據說理由是他「熱愛自己的家庭」，這無可厚非，在追懷逝者的同時，也勉可當作一種勸善之舉吧，作為宗教行為，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但當我聽說這位末代沙皇也有他的豔史時，越俎代庖替教會設想如何自圓其說，不免「浮想聯翩」，以為此舉不失為鄭重其事的幽默了。

故意的搞笑，不能給人以幽默感。幽默的主體只是按照自己的行為邏輯辦事。我們在聖彼得堡夏宮林蔭道上，遇見五七個人組成的小樂隊，以銅管樂迎賓。見着我們一撥人，知道是北京來的，立即吹奏中國國歌。我們很高興地投幣為禮。走過沒有50米，忽聽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旋律，回頭一看，原來是又一群來自台灣的遊客進園了。我和文秀小時上學都唱過這首原是國民黨黨歌的《中華民國國歌》，此時此地聽到它，不免驚詫於小樂隊的反應之靈敏，變化之快捷，頗感幽默。再一想這是「有償服務」，不足為奇。「市場化」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政治化」？但這樣的事情，在莫斯科紅場沒有發生，這畢竟還是個政治色彩濃

重的地方。在紅場列寧墓的上方，克里姆林宮主樓一面藍白紅的俄羅斯國旗之下，普京辦公室敞亮的窗戶可以俯瞰整個紅場，連同對面的「古姆」商場老樓。

普京繼葉利欽任總統三年了吧，他所表現出的活力不僅是從年齡和健康的優勢而來，現在信任度是較高的；而且聽說俄羅斯共產黨（自然已不是蘇聯時期的共產黨）黨員中，有不少「跳槽」歸附到了普京的統一黨的旗下，該是從普京身上看到了希望吧，其中多少人是為了某種政治理想，尋找施展抱負的機會，還有多少人只是為了想聊附驥尾以求飛黃騰達？局外人說不好，我這裏不過是以中國人之心（! ?）度俄國人之腹罷了。

年輕人表達對普京的好感，有的簡單說：因為他喜歡打球、游泳。這很像在一些自由主義國家就總統候選人進行民意調查時得到的率真的答案，倒也解釋了普京的活力的一個方面，卻頗有點「非政治化」的味道了。然而，在跟一些人特別是年長者的接觸中，我隱隱感到，普京和他的選民心氣相通的地方，除了以務實的態度改善經濟以外，就是他在國際事務中力求恢復大國影響，在獨聯體內致力於同幾個大國（白俄羅斯，哈薩克以至烏克蘭）結成更密切的關係，這符合俄羅斯人傳統的雄心勃勃的國家意識和潛意識。

元人小令有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其興也，不說了；其「亡」也，就是蘇共和蘇聯政權之結束，如何評

價，且交給歷史；而這個大變動造成了社會轉型的大陣痛，卻是分明地落到俄羅斯和獨聯體其他各國絕大多數人的身上。幸好，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陣痛已經或正在過去。

我站在紅場一角，祝福此行所遇的人們，祝福生活在廣袤俄羅斯大地上的幾代人。他們屬於一個跟我們一樣多災多難的民族，他們為了生活得好曾同樣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理應得到世世代代期望的自由而快樂的生活。

從「宏大敘事」回過頭來，再囉嗦幾句不那麼「宏大」的話。莫斯科的一位導遊姑娘，誠懇地說，她有工資，有小費，這就夠了，因此她沒必要像中國有些導遊那樣，把大家拉到這個店那個店，從中收取回扣；她甚至指給我們，哪家商店的東西貴，同樣的商品在別家店裏賣得便宜，我們親自證實了。逛街逛商店時我想，剛剛進入市場經濟，背負着因襲重擔的人們還有很多不適應之處，但我感到俄羅斯人一般還沒學會偷工減料，沒學會假冒偽劣，我希望我們貴國的行商走販以至旅遊者們，不要拿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把他們帶壞了，污染了，我不知道這想法是不是太幼稚太天真？

2003年10月15日

政治色彩

去年 12 月 23 日莫斯科消息：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那時候他還沒代行總統職權）在政府例會上說，俄拖欠的兒童補貼數額已經超過 300 萬盧布，有些聯邦主體拖欠達十二個月。這已成為有關機構的當務之急。普京說，千萬不要認為政府對這一問題漠不關心，這個問題「已不僅帶有社會色彩，而是具有了政治色彩」。

普京講政治。他從政治角度來看拖欠兒童補貼的問題，如果不抓緊解決，他擔心公眾會認為政府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那就會大大影響政府的公信：難道不是政治問題嗎？

我不知道俄羅斯的兒童補貼是怎麼回事，但無疑是關係兒童福利的政府撥款。這使我連類想起我們這裏的教師工資和農民負擔。教師工資打白條，農民減負不兌現，我想，跟他們那裏的拖欠兒童補貼有相似之處。我們的有關方面，可曾把這樣的事提高到政治高度來認識，「當作一件政治任務來抓」？長久以來，是不是僅僅看作一個工作作風、工作效率問題——頂多是「缺少群眾觀點」呢？

腐敗問題明明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但是在 80 年代初叫作「不正之風」，後來不得不指稱「以權謀私」，直到現在，也還是頂多當作經濟犯罪來看待。

淡化腐敗問題的政治色彩，只能掩蓋問題的實質，延緩問題的解決，但並不能消弭其負面的政治影響。

為什麼會是這樣？

長此以往，後果又將是怎樣？

2000 年 3 月 7 日

「國際恥辱」

西伯利亞有個貝加爾湖，大家知道就是漢使蘇武「牧羊北海邊」的那個北海。五六年前已經列為世界純天然寶貴遺產之一。俄羅斯政府出台了保護法令，開始實施旨在保護的五年計畫。

但是，因為海豹皮值錢，偷獵嚴重。貝加爾湖的海豹皮毛製品不止出現在俄羅斯中心地區，還銷到烏克蘭、中國和意大利。貝加爾湖海豹的捕殺限額是每年三千頭，實際上非法獵捕達到一萬頭。每年冰雪融化季節，海豹群艱難地爬向湖中群島的岩石，許多海豹身上都有斧子砍的傷痕和獵槍的彈痕，它們是死裏逃生的。

當地居民認為，保護區的工作人員，有些就是監守自盜的偷獵者。有人辯護說，監管員的工資低，只能靠偷獵維持生活。但正直的居民說：「我們不信，心地純潔的人能今天打死海豹，而明天又保護它。」

海豹的劫數還不光是偷獵。1987 年到 1998 年間，有一萬隻左右的海豹屍體被風暴拋到貝加爾湖岸邊。人們懷疑是兩個化纖企業排放污水造成的。1997 年這一年就有 1,500 隻海豹屍體被沖到岸邊，化驗結果海豹體內的氯有機物含量，幾乎相當於布匹中的含量。

因為俄羅斯政府沒有完成事先的承諾，貝加爾湖自然保護老問題上加新問題，落到瀕危境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保護自然聯合會不得不前來檢查。普京總統就此聲明他將全力監督解決這一問題。有關報道說，俄羅斯這才避免遭受國際恥辱。

「國際恥辱」一詞用得好！對外開放，進入國際社會，國際形象問題就更顯得突出。在爭取國際聲譽的同時，如何避免國際恥辱？

我們中國在人類自然遺產和歷史文化遺址保護、珍稀動植物保護這一國際關注的領域，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2002 年 11 月 22 日

石溝的名單

美國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也譯斯皮爾伯格）拍了一部《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也譯《辛德勒名單》），講的是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商人舒特拉挽救了 1,100 名猶太人的性命。

我由此想起，中國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死了成千萬的人，他們不該有一個名單麼？

1951年春夏，我在中央電台工作，我們幾個青年團員發起一個民歌小組；有一次民歌晚會上，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其中有一首《忘不了》，三十年後記憶猶新。那首敘事

歌曲，敘的是1942年5月7日之事，當天日本侵略者對河北省完縣野場進行掃蕩，在石溝屠殺了118個中國人。

因為在歌曲裏提到一個寧死不屈的小英雄王璞，跟方冰作詞並作曲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中王二小相似，我以為《忘不了》也是方冰作詞，1984年寫信向他索取歌詞全文，他在3月19日晚覆信給我，說《忘不了》不是他寫的詞，是譜曲者劫夫自己寫的，他從劫夫夫人那裏把歌詞抄了寄來：

忘不了五月七日那一天，完縣野場石溝的大慘案，
我們的同胞流盡鮮紅的血，也留下美名萬古傳。

忘不了敵人擺下了天羅網，包圍了隱蔽石溝的老鄉，
四下裏架上了機關槍，妄想威脅他們全投降。

忘不了張竹子和王璞，當時鼓動大家寧死不投降，
模範的母親和民族小英雄，真是邊區人民的好榜樣。

忘不了敵人向他們逼口供，他們一致回答說不知道，
血可以流秘密不可露，偉大的民族氣節衝雲霄。

忘不了敵人機槍狂掃射，掃向老人婦女和兒童，我
們的一百一十八個老鄉，一致高聲大罵壯烈犧牲。

忘不了殘忍悲壯的場面，鮮血流在地面屍骨堆成山，
死後的母親還奶着嬰兒，重傷的孩子把親娘喚。

忘不了血債如山仇深似海，我們一致宣誓團結復仇，
堅決和敵人幹到底，不把敵人消滅不甘休。

離開曲調光讀歌詞，似乎過於平實，而配上曲子唱起來，則是悲歌慷慨，盪氣迴腸的。那天唱過這首歌以後，鄭佳同志講了她在慘案發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去現場調查的經歷和見聞，當時她在晉察冀邊區政府工作。她說的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她描述當時死寂荒涼、屍身枕藉的淒慘恐怖氣氛，至今想起來還教人不寒而慄。

《忘不了》不知是否收入了《劫夫歌曲選》，那悲壯的控訴的旋律連同野場石溝大慘案，卻真是歷久難忘了。

被害者的名單比被救者的名單更重要。

「石溝的名單」上有 118 名受害者。除了石溝以外，還有成百萬成千萬的中國人應該列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直接遭受殺害者的名單上啊！

人們，中國的同胞們，忘了，還是「忘不了」？

1994 年 11 月 1 日

百年創痛

清末詩人丘逢甲 1896 年《春愁》一詩中有句云：「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去年今日」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完全按照日本提出的條件簽訂了《馬關條約》，把中國領土遼東半島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等。當時中國人口約四萬萬，為此同聲一哭的何止是台灣省的四百萬人？

從那時起，整整一百年過去了。僅台灣省就被日本佔領了整整五十年，直到 1945 年二戰結束的時候才告光復。日本經過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輕易取得了割地賠款以

後，虎視眈眈步步緊逼：1900年（庚子）參加八國聯軍侵華；1904年，為爭奪在華權益竟在中國領土上與俄國開戰，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1916年強迫中國政府簽署「二十一條」亡國條約；1926年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1928年強佔濟南，屠殺五千居民，並將中國北伐軍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野蠻殘害；1931年「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三省以後加緊了侵略步伐，淞滬挑釁，熱察蠶食，又染指冀東，覬覦平津，終於在1937年在盧溝橋和上海發動「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全面侵華戰爭，在中國國土上犯下了罄竹難書的血腥罪行，這是反和平的罪行，這是反人類的罪行！

在《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周年的今天，所有記得百年歷史的中國人同聲一哭，為日據時期飽受日本佔領者欺壓迫害達五十年的台灣人民，為從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上半葉在大陸上飽受日本軍國主義欺凌、蹂躪的死難者和倖存者，為我們父母之邦、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命運！而災難之源，很大一部分就是日本於1885年起施行十年擴軍計畫、1893年起成立戰時大本營等一系列針對中國的侵略預謀。日本的幾代軍國主義分子將計畫付諸行動，至今猶有「新右翼主義」抬頭。

有報道說：二戰中，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對戰俘進行的細菌和其他生物實驗中，至少殺死了三千人。

而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 731 部隊的活動作過公開的道歉。對於六年前在東京新宿區前 731 部隊總部亦即舊日陸軍軍醫學院遺址發現的，至少二十六人的頭骨和其他骸骨——人們認為很可能是當時侵華日軍 731 部隊進行人體實驗後的骸骨——日本有關當局竟決定儘快撥款火化處理。日本有居民團體起訴要求停止火化，1994 年 12 月 5 日東京地區法院駁回了這項民事訴訟。這就是說，一批可能作為日本軍隊二戰期間在中國、朝鮮和蘇聯囚犯身上進行細菌武器試驗證據的遺骨，很快將被焚燒，形同滅跡了。

像這樣的動向，連同多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來自日本的一些消息，包括前法務大臣永野茂門以侵略者經歷作證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還有環境廳長官櫻井新發表否認日本對華戰爭是侵略的言論，難道不值得我們在「同一哭」之後，認真地加以深思麼？

少年即在家鄉湖南參加抗日軍隊的台灣詩人向明，有一首詩題為《一枚子彈》，寫一位老張曾在台兒莊負傷：「日本皇軍手植進老張體內的/那枚黃銅子彈/就在心室的左邊」，「每當滿街的鈴木、豐田囂張而過/他就狠狠的把它按捺住/生怕那塊已經結疤的恨/會引爆成/一顆憤怒的炸彈。」從一百年前開始，日本皇軍射向中國人的這樣的「黃銅子彈」，不止「老張」心室左邊的這一顆。毋寧說，深埋在百年中國心室旁邊的、幾乎致命的「日本子彈」，至今也還沒有挖出

來，一到節令交替、氣候變化，颶風下雨、驟陰驟寒，必然引發歷史的隱痛，這種揪心的痛楚，放射到今天大陸近十二億中國人身上，也放射到台灣島兩千多萬中國人身上，除非是已經麻木的人。

「同一哭」，不能銷愁，也不能止痛。百年前甲午的戰敗，馬關的屈辱，既是由於中國的貧弱，更是由於清廷的腐敗，給了日本以可乘之機。此中教訓一直鑒照到今天。不過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1995年11月15日

【附記】

本文前面提到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從中國獲得共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償費」。頃閱日本三洋電機總裁井植薰的回憶，他說「這一數字約合當時的3億6千萬日元。也就是說，相當於日本1895年全年稅收的4.8倍。日本就是靠了這筆賠款，才得以在國內實行了貨幣金本位制，並且借此擴充了軍備，建造了煉鋼廠。這筆賠款直接推動了日本國內的產業革命」（〈我和三洋——成功源於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轉引自《書摘》今年第一期）。

對虎彈琴

對牛彈琴，結果不過是沒有結果而已。把牛換了虎，結果會是什麼樣？

十三年前，日本文部省在教科書裏把「侵略中國」改成「進入中國」，掩蓋侵華戰爭的侵略本質。十三年後的今天，新任日本文部相的島村宜伸，索性對侵略作了全新的詮釋：「侵略或非侵略，這是個思想方法問題。」「戰爭不就是彼此進行侵略嗎？優勝劣敗，打勝了的一方成為侵略對方，不是嗎？」

一位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女士說，在日本，45歲以下的人，一般都認為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想想日本文部是掌

管全國教育的，日本青少年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也就不奇怪了。

據說日本的年輕人裏，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還相信着武士道精神，還相信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不少人認為，「由於日本冒險發動這場（解放白人統治的殖民地的）戰爭，亞洲國家才有今天的獨立」：日本不但是戰爭的受害者，還是亞洲國家的解放者、大救星！

靖國神社年年有人參拜，「昭和殉難者」時時有人祭祀，真可謂血食不絕，後繼有人。日本有「遺族會」、「不辜負英靈會」、「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是由已死官兵和戰犯們的遺屬組成的，這些團體為反對國會通過「不戰」決議，徵集簽名，到今年5月已達500萬人。想想日本總人口是多少，500萬人佔了多大的比例？

從1950年起，日本給予遺族的撫恤費高達38萬億日元，相當於向受害國給付賠償費總數的57倍。

按照日本教科書關於二戰歷史的陳述，某些官員的言傳身教，社會上各種歪曲歷史真相以至顛倒戰爭性質的論調的薰陶、誘導、教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少年成長起來，未必願意如我們一廂情願那樣跟我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去年「八·一五」參拜靖國神社的內閣成員七人中，就有六個年齡在51至57歲之間，都是戰後開始上小學的一代，

其中有兩個人就是公然表示「不打算一概而論說它是侵略戰爭」的。

在右翼勢力的壓力下，在對二戰缺乏正確反省態度的日本決策層的影響下，長此以往，我擔心，當善良的中國人還念叨什麼「以德報怨」，憧憬着與東鄰「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時候，說不定有朝一日，忽從「一衣帶水」那邊，以「昭和殉難者」後代或什麼別的名義，悍然向中國提出索賠的要求，因為為了屠殺中國成千萬的軍民，日本確曾付出了百萬官兵的代價！

你以為這樣的言行悖乎常理，近似危言聳聽，但你只要稍稍把日本為侵華罪行開脫的謬論串起來看看，那正是百年多來對華關係中歷歷在目的強盜面目流氓手段的邏輯發展。

難道要到那一天，我們才幡然醒覺，有比對牛彈琴更危險的，例如對虎彈琴？

任何友好都是雙向的，一廂情願在私人交往中也會落空，何況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更何況曾有跨世紀的侵略與被侵略的歷史，而侵略一方的政府至今沒有表現出悔禍之心！

1995年「八·一三」紀念日

「殺手無罪」論

五十年來，至少是我，沒有認真回顧過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其遺留問題的處理。頗有點前事已忘的樣子。忙着我們自家的事，自顧不暇了。

近讀《北京青年報》，才知道大批日本戰犯未受應有懲罰：

早在 1946 年 11 月，日本天皇裕仁就經同盟國允許，對所有被控犯有戰爭罪行的日軍士兵實行了大赦。所謂同盟國允許，當然首先和主要是出於美國的戰略需要，而在日皇裕仁，大約是為了「保護積極分子」吧。

1951年，盟軍遠東最高司令部司令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批准釋放所有被判十年以下徒刑的日本戰犯。而到1956年4月前，連所有被判無期徒刑的甲級戰犯都已經假釋出獄了。

於是，殺害了中國和亞洲成千萬人和眾多英美戰俘僑民的日本軍國主義，最後「殺人償命」的僅有被判死刑的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他們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既代表了在別國國土上濫殺無辜、無惡不作的大小殺手，也代表了實際上的第一號戰犯、第一號殺手天皇裕仁。

現在還有一種說法，那些佩戴各級軍銜的，殺紅了眼的殺手們，他們只是「執行者」，不是決策者，他們負不了什麼責任云云。

最高的決策者是裕仁吧，他若沒有東條英機（還有先已死掉的近衛文麿等）以下的各級殺手，縱有三頭六臂，能夠殺得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和其他各國軍民嗎？能夠殺得那麼各各獨出心裁、淋漓盡致嗎？

然而裕仁尚且逍遙法外，眾殺手更勿論矣。有這個天皇在，他倒沒有忘懷故舊，不斷替關着的戰犯謀求釋放，他給已死的官兵的遺屬共發了38萬億日元的撫恤金（相當於日本向受害國給付賠償費總數的57倍），並且把東條英機等十四個甲級戰犯的靈牌供進靖國神社，享受祭奠。

這就是「『殺手無罪』論」的根源。不但無罪，而且有功：這就不但安慰了已死殺手們的亡魂，而且鼓勵了活着的，以及未來的打手和殺手們。

1995年9月5日

飲食也有「武化」

戒葷吃素，是慈悲為懷了，但還是吃的「素雞」、「素鴨」，有一點過屠門而大嚼的意思，但這不一定是持齋者的本心，也許是豆腐坊師傅以自己之「腹」去度素食者之「心」，因為他們自己未必甘心吃素的。

現在有一種素食的理論，說大大小小的動物被屠宰的過程，由於恐懼和掙扎，會分泌一種有害的物質，留存在動物體內，這大概有化驗的根據，對於講究養生的人，是有說服力的。而過去人們的素食，往往是由於忌殺生的心理，近年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增強，忌殺生才不限於佛門之見。

小孩子愛小動物，既不懂佛門的禁忌，也不知綠黨的綱領，但手裏拿着「動物餅乾」，捨不得往嘴裏放，是因為那小動物的造型惹人憐愛，他們通過童話故事已經跟它們有了一份感情，見其「形」不忍食其「肉」了——當然最後還是吞而食之，就如對牛羊豬雞鴨魚全都照吃一樣。

現在日本的糕點「人形燒」進入中國市場了。一塊塊豆沙餡的點心，做成一個個人臉的形狀，就算小孩子食量不大，一頓也得囫圇吞下兩三個人頭人臉。如果小孩子從小吃慣了這玩藝兒，我頗擔心長大了會把人跟可以宰殺進食的動物混同起來。

不知道這種日本糕點的沿革。在中國，過去有過「人肉筵席」的時代，流傳下一些殘酷的掌故軼聞。岳飛詞「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雖是軍中豪語，卻證明在戰爭中對敵方的俘虜「食肉剝皮」曾經是習以為常的慣例。時至今日，不但為國際法所不許，也是人們道德觀念所不能容的了。諸葛亮五月渡瀘，先也曾以「蠻人」的「首級」祭旗，後來改用麥面蒸成「蠻首」的形狀，據說已是出於諸葛的「仁心」；又說這就是「饅首」或「饅頭」的由來。不過人們從今天的饅首或饅頭上早就看不到血淋淋的頭顱的痕跡，年輕人也不知道這些，更無從想像了。假如今天有哪一家熟食鋪把白麵饅頭用模型蒸成人頭模樣，五官俱全，鬚眉

畢現，面帶表情，與顧客面面相覷，我不知道大家會有什麼反應：是歡迎，還是噁心？——誰說這只是個包裝問題？

飲食之為文化，就是在滿足食欲的同時，不僅有視覺、嗅覺、味覺的色香味諸品，而且賦有精神上心理上的審美內涵，至少不會鼓勵人的暴力傾向，使人以為可以從施暴、肆虐中得到快感，那就不是不文化，而近於「殘民以逞」的「武化」了。

此文不是提倡素食，但不吃各類列名保護的珍稀動物，不用說，是跟飲食的選擇一樣，應該認真對待的。

飲食文化與「飲食武化」，不可不辨；前者是吃「文化飲食」，後者吃的卻是「武化飲食」了，吃得吃不得？

1996年2月

從「俳句事件」說起

——夜讀抄

在同日本的俳人即俳句作者朋友們交流的會上，我感覺我是在與松尾芭蕉¹的日本對話，心情愜意而寧靜。我試作的漢俳有一句「遙燈如柿柿如燈」，還是1990年秋天游太行山時的詩意，寫出付郵以後，發現五十年前一位日本俳人也寫過柿子，卻是柿林裏殘存的一個，淒涼得多了。那是《法西斯體制研究》書中提到的「俳句事件」：「俳句事件」發生在1941年；反「子規」派俳人栗林一路石寫了一首俳

1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戶時代前期的俳諧師，被認為把俳句形式推向頂峰。

句，「蕭颯秋風起，枯葉飄零離枝去，唯殘一紅柿。」特高警察²認為，這是歌頌無論如何鎮壓都消滅不了的共產黨，從東京開始，北到秋田，南到鹿兒島，對全國各地反「子規」派俳人結社進行了大鎮壓。

這本書關於日本法西斯體制的論述，除了體制演變、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外，並有國民統制與精神統制的專章。這本書幫助我弄清了為什麼在日本至今總是晃動着法西斯的陰魂魔影。

「舉國一致」的口號和「強制的同質化」的實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家體制就在以軍部為主導的法西斯勢力推動下，開始法西斯化的進程；1936年東京「二·二六」事件即法西斯青年軍官兵變後的廣田內閣，開始了法西斯統治；從1940年7月近衛文麿再次組閣並於10月建立大政翼贊會到東條極權體制（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的形成，日本法西斯體制全面確立。

日本思想文化領域實行的法西斯式控制，力圖把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趣愛好都納入官方劃定的框框，

2 特高警察，即特別高等警察，1911年於日本設立的秘密警察組織，專責調查政治團體，取締危險思想與監控社會運動。

實現所謂「強制的同質化」。這個思想文化統治的加強是與整個體制的法西斯化同步的。

1932年文部省設立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理論體系，以「闡明日本國體和國民精神的原理」，批判外來思想，對抗馬克思主義。日本近代興起的日本主義是一種國粹主義、國家主義思潮，核心是「國體論」，以尊重日本特有傳統和國民性相標榜，宣揚國家至上，忠君愛國，本來就包含神國思想、大和民族優越論、崇尚武力、對外擴張等內容或傾向；經過右翼和法西斯分子的鼓吹，他們津津樂道的日本精神、皇道精神和各種法西斯主義貨色，更是一塌括子都冠以「日本的」而塞進日本主義。日本主義遂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別稱。以國體論為核心的日本主義是日本軍政權勢集團推行內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

早在明治年代，就有《新聞紙法》和《出版法》，對報刊、圖書出版採取審查、限制以至查禁的方針。1934年修改出版法，新規定「冒瀆皇室尊嚴」、「妨害安寧秩序」、「煽動」犯罪的書刊禁止出版，作者將受到追究。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報刊必須在出版後送審，廣播稿必須事前經遞信省審查。報刊和廣播電台實際上都只能採用政府控制下的同盟通訊社發佈的新聞。

頻繁的禁令和龐大的機構

為了加強文化統制，日本政府頒佈實施一系列新的統制法令，比較重要的有：1939年4月頒佈《電影法》，以納粹德國1934年的《電影審查法》為範本，規定事前送審故事片劇本，強制放映新聞片等。同月頒佈《宗教團體法》，規定對「妨礙安寧秩序或違背臣民義務」者，實行限制、禁止等處分。1940年12月頒佈《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禁止報紙和廣播電台採用外電新聞，不許報道天氣預報；對「散佈流言蜚語，惑亂人心」者，處以一年徒刑以下的刑罰；出版物違禁，不僅禁止發行該出版物，還可以禁止發行同一作者或同一出版社的出版物。1941年1月頒佈《新聞紙揭載限制令》，禁止事項更多也更具體。同時還頒佈法令對書報用紙進行限制、配給，固然與紙張緊缺有關，當局也借此壓制他們不喜歡的報社、出版社。

從事文化統制的機構更是不斷強化。1940年12月，作為各官廳情報、報道、宣傳事務聯絡協調機構的內閣情報部，改組擴大為內閣情報局。在情報局總裁之下，設五部十五科，分掌企劃、調查；新聞、出版；對外宣傳；審查、取締；文藝娛樂。除繼承情報部的原有職權外，還負責新聞、出版、電影、戲劇之類的指導、審查和取締，包括推薦電影、戲劇、歌曲，組織巡迴演出等。情報局直屬內閣總理大臣。

情報局總裁與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企劃院總裁並列為內閣四長官。它是一個軍部與法西斯官僚的結合體，成為法西斯文化統制的總部。全部人員達六百名之多。

日本還建立了一批官辦文化團體，統一和取代分散的民間文化團體，作為官方文化統制的輔助機構。1940年12月，由內閣情報部部長任籌備委員長，成立日本出版文化協會（後改組為日本出版會）。會長等人員均由官方選定，協會決定的事項須經主管官廳認可。1941年5月，又成立日本新聞聯盟（後改組為日本新聞會），協助官方對報紙的編輯、用紙配給、記者登記、培訓等事項進行全面統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6月，在情報局領導下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其章程規定「本會的目的在於，結集全日本文學者的全部力量，確立發揚皇國傳統與理想的日本文學，協助宣揚皇道文化」；下設各個分會，共有會員二千五百餘人。同年12月，成立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吸收除文藝評論家以外的所有評論家，會員共九百一十餘人；這個會宣稱它的使命在於不讓日本受外來文化的毒害，「確立日本的世界觀，闡明並完成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原理和設想，積極挺身於皇國內外的思想戰」。文學報國會和言論報國會都由情報局指定著名的國家主義評論家德富蘇峰為會長。

在情報局統制下，各種文化事業、活動只能按官方旨意辦事，不能越雷池一步。情報局向各報社、雜誌社通報禁

止報道、刊登的事項和不許撰稿的黑名單。每期雜誌的編輯計畫和撰稿人須事先申報取得批准。報紙的標題、內容、照片、廣告都要接受審查。審查越來越挑剔，禁發稿件成了家常便飯。出版圖書要預先申報計畫，附上原稿或有關資料。出版社甚至必須提交購買圖書的「讀者卡」，有關方面據此調查讀者的思想傾向，有的讀者受到查問，有的軍人受到處分。一些著名學者因言論、學術問題而被逐出大學校園，甚或受到審判。思想迫害、學術治罪的事件不斷發生。

思想迫害和學術治罪

凡此，日本的文化統制，還有教育改組，都是推行「強制的同質化」的實踐，是建立法西斯「國防國家」總國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統治之下，意識形態領域不遺餘力地灌輸有關天皇神話、國體精神、忠君愛國和軍國主義思想。革命思想被視為大逆不道，受到高壓取締。不過，在不反對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許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傳，允許學術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後，不斷擴大取締的範圍，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到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直到和平反戰的思想情緒，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讀本》曾被大審院作為好書推薦，他的刑法學說其實是很保守的。不過，瀧川不贊同刑罰萬能的理論，主張重視犯罪的社會、經濟原因，由此出發認為革命家並非無恥之徒，犯內亂罪者不應按道德卑劣者處理；他還提出男女通姦只處罰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談《復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講中肯定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僅僅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擊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內務省查禁，隨後被文部省「停職」。此事引起一些大學師生抗議。結果文部省堅持強硬態度，除瀧川外，還讓不肯屈服的京大法學部三分之二人員（教授、副教授、講師等十四人）辭職。

1937、1938年又相繼發生矢內原事件和河合榮治郎事件。兩人都是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國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義與和平乃國家之理想」，允許不同主張的存在是真正實現「舉國一致」，達到國家理想的必要條件，被責為「不穩言論」，被迫辭職。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也反對法西斯主義，他所著《法西斯主義批判》一書，以擾亂社會安定秩序為由在1938年被禁，次年被免職，並被訴違反出版法，1941年被認定有罪，經長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年病逝。

前面說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發生的。這類文字獄甚至波及中小學教育界。從20年代末中小學裏

的「生活作文」，是讓學生根據自己的體驗自由選題作文，但內務省認為，這會促使兒童觀察貧困生活，「誘致階級意識」，於是在 1940-1941 年間，在東北地區和北海道一帶，對「生活作文運動」進行鎮壓，接連幾次逮捕，有一次被捕 109 人，還有一次被捕五十多人。在「教育改組」的題目下還作了大量文章，從略。

愚民政策和知識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

在言論報國會的會議上，內閣情報局次官奧村喜和男指出，當務之急是「拋棄『美國心』、『英國心』」，「回歸於『大和心』」；改變了明治維新時期《五條誓文》中「求知識於世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鑒歐美近代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文化的方針，盲目鼓吹日本傳統文化的無比優越性，在對德意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大開綠燈的同時，對英美文化採取斷然排斥的態度。英美被看作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發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現代社會弊端的根源。1943 年，內務省、情報局禁止演奏約一千首英美樂曲，後來甚至禁止使用美國型的樂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樂的打擊樂器，並且決定從日常生活中驅除英語，改換商品名稱。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統制與國民統制（它有形成嚴密組織形式的國民統制網路）相配合，利用對外戰爭煽起排外

狂熱，實現「舉國一致」，這在戰爭順利進展時容易做到，但在內外交困情況下仍能控制多數國民，主要是政府操縱了所有輿論工具、國民組織和文化團體，資訊渠道單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輸，剝奪了國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學者所寫，「直到天皇宣告『結束戰爭』之前，多數國民沒有喪失對敵的鬥志，下定決心玉碎或在本土一死戰」；這種現代愚民政策對青少年毒害最大，戰爭末期許多青少年加入「神風隊」，枉為肉彈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證。由此也可以懂得為什麼日本總要在教科書裏下功夫篡改歷史了。

這本書不但以詳實的史料論證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動因、前提、體制構想和這一過程中各種社會政治勢力的作用，並且論證了社會傳統和國民心理與法西斯思想統制的關係，不及備述。在最後部分說到「思想文化統制離不開知識分子，對於強制同質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為之效力」時，引用矢內原忠雄對當年日本知識分子所作的四類劃分：第一，與軍部法西斯政治和戰爭積極合作，為法西斯統制、天皇神格論、大東亞共榮圈提供理念的少數超國家主義者；第二，雖然不喜歡法西斯政治和進行戰爭，但又害怕日本戰敗滅亡，而不得已協助戰爭的人們；第三，雖不贊成軍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戰爭政策，但認為任其為所欲為對國民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盡力保護國民的自

由，緩和軍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與戰爭合作的人們；第四，積極或消極地不協助戰爭的少數人。本書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種人，並舉其主要代表京都學派加以分析，茲從略。

《法西斯體制研究》，朱庭光主編，李巨廉、陳祥超、孫仁宗副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4 月出版。第一編講德國，第二編講意大利，第三編講日本；上文摘引較多的是有關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統制」一節，為呂永和、孫仁宗撰稿。

1996 年 9 月 1 日

遙遠的祝福

讓我說一句套話：記憶猶新。記憶猶在 80 年代初盤桓。

從土茲拉出發，到莫斯塔爾去，我們的車在狄那里克—阿爾卑斯山公路上前進，滿眼是綠。有雲無雲，時陰時晴，我們總在濃濃的、亮亮的綠中穿行。「雲過路，霧過路，雨過路，只有綠留住」，我望着窗外，「走一路，綠一路，哪是春深處？」春深處，該就在綠綠的山深處、水深處、歌唱着友誼的心深處吧？

我相信，同車的朋友們全和我一樣，只想着「山水＋友誼」，沒有人會想到戰爭，儘管這是一片飽經戰禍的土地。

離莫斯塔爾不遠，道邊的古堡就是歷史的見證。巨大磚石砌成的古堡，裏面至今還顯得陰森，不過貼牆排列的刀槍劍戟已僅是背景和道具，燈燭照着吧台和餐桌，民歌悠揚，小憩的遊客頂多發一下思古之幽情，也未必會有人陷入歷史重演的憂思。飲一杯咖啡，又上路了。

因莫斯塔爾處處客滿，我們遂在夕照中繼續前行。

想像月神追逐日神，從愛琴海追到亞德里亞海。古老的石頭城杜布洛夫尼克就在亞德里亞海邊。與其說這是石頭寫的歷史，我更願意說它是一首石頭寫的詩。挺規整的一首格律詩。真正澄淨的、蔚藍的天，罩着風定微波的、深深的海，沒人想起問一句，這裏曾否在某個年月折戟沉沙；濃蔭如傘的月桂和無花果樹，亦有年矣，沒有人想起猜度大樹年輪可存有兵燹的記憶。且不說巴爾幹從來被稱為火藥庫，晚近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翻過已久，彈痕磨平了，建築修葺一新。殿堂門楣上鐫刻的守護神彷彿真的守護着長遠的和平。

十年以後，我從薄薄的報紙上聽到重重的炮聲。杜布洛夫尼克，你名為石頭城，但怎麼抵擋得住現代的炮火的轟擊？陽光仍舊嗎？雲水依稀嗎？可那樓，那橋，那壁立的牆，那雕花的窗，那尖的、圓的、矩形的屋頂，每一個屋頂下的人們無恙嗎？……我不敢想；也許真正無恙的，只有那經過多少腳步踢踏、風雨侵蝕反而更加光滑的石頭路面吧？

多少道旁人家，從飛機上俯看是耀眼的紅頂白牆，透過車窗看，簇擁在野薔薇或別的花木中，一旦進入射程，陷入火網，一切不可想像，也不忍想像。

當時土茲拉的「弗亞·別里奇之家」，有 113 個無家的孩子，組成了若干個小小家庭，如有父有母一樣溫暖。現在這個「家庭」還存在嗎？在土茲拉，在波黑以至克羅地亞的杜布洛夫尼克一帶，又添了多少無家的孩子，還有多少家庭，連同他們的孩子，一起從世界上消失了？

當時的莫斯塔爾，當時的薩拉熱窩……

薩拉熱窩！我逡巡在老城不寬的街道上，拜謁過比老城還老的清真寺和東正教堂；看 17 世紀驛站的遺址，聽十二響的鐘聲遲至黃昏才緩緩地，卻驚心醒肺地飄來。巷子裏一家家工匠打磨銅器的叮噠聲，有節奏地躡入了洋溢於晚風和斜陽中的醇厚的奶油香味。這時候步行街上走着的盡是下班的、放學的、逛商場的、急急地或慢慢地回家的人……

我讀報，知道這是久違的風景了。鱗次櫛比的樓群，有幾多化作了斷壁殘垣；平坦的街道變得坑坑窪窪：這裏一個彈坑，那裏一灘血。饑餓，寒冷，病痛，傷亡，分離，驚恐，悲哀，取代了人間生活不可缺少的和平氣氛。這就是戰爭，非理性的，暴力的極致。遠隔千山萬水的我們，愛莫能助，愛莫能助啊！

最近又讀報，知道在薩拉熱窩、土茲拉、莫斯塔爾……在波黑出現了和平的契機。那裏將重新瀰漫着和平的氣氛，驅散悲哀、驚恐、饑寒病痛和生離死別的威脅麼？

各個宗教的信徒都以祈禱寄託自己的希望。我不是宗教徒，明明知道我的祝福是無力的，我仍然要把我的祝福獻給那一片遙遠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桑下三宿，未免有情，何況我住了不止三天呢！

1994年3月28日

今日是何年

蘇東坡說過「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而今日的人間世，1995，乃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因而也是「各國人民紀念二戰死難者國際年」，是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因而也是「國際寬容年」。

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說：「寬容是我們渴望擁有一個昌盛與和平世界的先決條件。」「寬容」是今年聯合國紀念活動的一個主題。

最近，在世界各地紀念反法西斯勝利的節日裏，我們讀到這樣一些消息：

如匈牙利政府總理 5 月 7 日表示，他代表全民族向猶太人和其他的法西斯暴行受害者謝罪。因為在二戰期間，當時的匈牙利政府緊緊追隨納粹德國，幫助他們迫害過大批猶太人。

又如瑞士聯邦主席 5 月 7 日就二戰期間瑞士限制猶太人入境問題公開道歉。因為 1938 年瑞士聯邦政府在納粹德國的壓力下，向遭受納粹迫害、希望到瑞士避難的猶太人關上了國門。

如此等等。這些反省，雖然是在事過半個世紀之後，但畢竟表現了新一代政治家的明智，表現了人類的良知，表現了社會和觀念的進步。這也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說明，今天國際社會所提倡的寬容精神，首先是和解的精神。

和解，不僅適用於國際關係，同樣適用於國內關係。最近阿根廷軍方承認參與「骯髒的內戰」就是一例。

1976 年 3 月，阿根廷軍人發動政變後，軍政府立即宣佈解散議會，實行黨禁，在全國範圍進行嚴厲的鎮壓；據估計，從 1976 年至 1983 年 7 月，有近三萬阿根廷人遭到逮捕、拷打和殺害，許多反對軍政府的進步人士和群眾在受刑後屍沉大海。

今年 4 月底，阿根廷陸軍參謀長率先向新聞界承認，陸軍參與了 70 年代軍政府時期對於反軍政府的進步人士和團

體的血腥鎮壓；5月3日，海軍和空軍參謀長也發言正視了海軍和空軍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阿根廷國防部長奧斯卡·卡米里昂3日表示，武裝部隊對過去所犯錯誤的反省，軍人重申維護憲法秩序，使國家朝和解方向邁進了。

加利說，寬容是「通過對人類共性的認識，尊重多樣性」。可以說，寬容也是人類理性精神的體現。

自然，加利還說，寬容並不意味着接受「偽裝成民族主義」的野蠻行為，也不是要無視「披着宗教外衣」違反人權的現象。正是這樣，我們看到，就在阿根廷，這個戰後容納了許多納粹戰犯逃亡藏身的國度，5月4日經法院判決，同意把一名前德國納粹黨衛軍分子引渡給意大利；這個81歲的埃里希·普利克（Erich Priebke），1945年參與了對335名意大利人（其中有75名猶太人）的大屠殺。

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實行寬容的原則。而若沒有對新法西斯和一切反人類行為的必要制裁，那一切創造寬容、和解氣氛的努力都將受到破壞。這就是事物的辯證法吧，這也是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和「國際寬容年」提醒我們要認真思考、認真對待的課題吧。

1995年5月10日

推薦《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

嚴秀同志寫的《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是一篇好雜文，好的國際題材雜文。

天下之大，芥豆之微，無不可以入雜文。一衣帶水之東有人篡改歷史，粉飾侵略，居心叵測，應該予以駁斥和揭穿；天涯萬里外的他山之石，也不妨借來攻玉。國家不論大小，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地域無分遠近，也都有可以總結的教訓。

嚴秀說的是阿爾巴尼亞，涉及已故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霍查（Enver Hoxha）。直到 1972 年以前，霍查與中

國友好。當時中國致阿黨代會的賀電中，曾譽之為遙遠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並且引王勃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相期相許，現在三四十歲以上的中年大約還記得幼時唱過有關的歌曲。

世事變化萬端，國際關係敵我友的分化改組無時無之，背景複雜，資訊不足，自是雜文作者的難處。今天議論霍查舊事，一是遠距離，二是「冷處理」，似乎容易些。但若不是嚴秀近年一直關注和研究國際共運和「蘇東」問題，則雖面對有關阿國土上至今猶存五十萬個大地堡的外電，也不會引發如此的深思，發為如此切中肯綮的議論。

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後和波匈事件之後，中共中央先後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二文，在分析斯大林問題之後，指出搞得民主不像民主、專政不像專政，是致亂之由和致敗之由。

我以為嚴秀文章分析二百多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修五十萬個大地堡，平均每五個人分擔築一地堡的任務；而這些地堡對於防禦現代戰爭中的外敵入侵意義不大，其作用恐怕主要用來震懾群眾，也就是把專政和鎮壓施之於人民。曾幾何時，民變蜂起，那個政權終於維持不下去了。嚴秀此文不過兩千字，實際上是前述總結歷史經驗的繼續和深入。這個遠在萬里外的地堡故事，讓人不由不想起秦始皇嬴政收天下

兵器鑄金人，又徵千萬徭役築宮殿長城，終不免二世而亡的更古老的故事：「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遂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現在常寫國際題材雜文的，還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同志馮英子。他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罪惡，對日本朝野右翼勢力的叫囂，及時痛加抨擊，有理有據，正義凜然。

嚴秀的國際題材雜文，亦如他別的題材雜文一樣，都是既有激情，又持之有故，重在分析，不是簡單地說「不」或說「是」，所以娓娓道來，卻有很大的說服力。

讓我們向嚴秀、馮英子學習，包括學習他們國際題材雜文的寫作。

1997年9月3日

誰管誰

去年夏天，西安一個 7 歲的女孩、二年級小學生壯壯，在陝西歷史博物館見到了克林頓，並且有簡短的對話（《作家文摘》摘自《女友》1999 年第一期）：

克林頓看見了站在一個兩米高的臺子上的小姑娘，等她走下來，握住她的手說：「你是個勇敢的小女孩，站在那麼高的地方你不害怕嗎？」

壯壯說：「只有站在那兒才能看見你啊！」

「你很想看見我嗎？」克林頓被壯壯的話逗笑了。

「是的，因為，你是美國總統。」壯壯很乾脆地說。

「你知道美國總統是做什麼的嗎？」克林頓笑問。

「美國總統是管美國人的。」

「唔……」克林頓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很認真地對壯壯說：「應該說是美國人管美國總統。」

小壯壯自然會作如上的回答，克林頓也必然要作如上的辨正，國情不同嘛。

小壯壯當然還沒學過政治學，也不懂得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她是從她的經驗出發，認定大人是管小孩，老師是管學生……那末美國總統就是管美國人的吧？

克林頓知道，他是替美國人管事的，管理國家和眾人之事，然而，歸根結底，他這個總統，也還是歸美國人「管」着的，他得服「管」；故雖面對異國的小女孩，他也不敢胡說。不久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這一點。他的錯，就錯在他幹了一些不該幹的事，而他又想背着人，不讓人管。最後美國人還是「管」到他頭上，「管」得挺凶。

小壯壯暫時還鬧不清美國的事，那不怪她，她還小呢。比她大得多的人，像我吧，不是連我們中國的事，也未必就都鬧清楚了嗎？

怪只怪這個「管」字，既可以是管事，也可以是管人；同是管人，也有多義：在我們社會政治生活中常用的，就有管轄、管理、管制、管教……不一而足，壯壯是指的哪一「管」，她自己可能也還沒弄清吧。

再就要怪「總統」這個外來語，人家叫做「President」，按照詞典的注解，它指的是歷史上的州長，（殖民地）總督，又是長官，大臣，（議院的）議長，法院的院長、庭長，（美國大學）校長，（英國大學）院長，會長，社長，（會議）主席，（銀行等企業的）行長，總裁，董事長，總經理等；當然，還用來指某些國家元首即我們所譯的總統。原本只有一個「主持者」的涵義，不知哪位第一次用漢語譯介這個詞的翻譯家（上個世紀叫做「通事」），參考了我們一國定於一尊的傳統，找了一個「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可以使人認為萬人之上大權獨攬管天管地管到拉屎放屁的這麼一個總管統轄的「總統」尊稱，使這個詞在原文中本來還有的具體部門主持者的意思全都相形失色，退避三舍。而且早在我們中國辛亥革命後引進這個頭銜的時候，就還曾獨出心裁地加了個「大」字，曰「大總統」。那時候已經號稱「中華民國」而不是皇清、帝國了，但官與民，誰管誰，「應該」怎樣是一回事，「實際」怎樣又是一回事，一直是個糊塗公案。大官「管」小官，大小官一塊兒「管」老百姓，則是深入人心的了。

小壯壯認為克林頓這個美國總統不但代表着米旗蛋糕、米老鼠、好萊塢和冰淇淋，而且是能管（全體）美國人的大權威，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而她這樣作答，也許跟她的國內經驗完全不相干；一個7歲的小姑娘，能有多少堪稱經驗的東西呢！

1999年1月20日

何必改詞

在北京，一次《黃河大合唱》紀念性演出結束時，在報幕員的提議下，全場隨着台上齊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支歌我會唱，歌詞也能記誦：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着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陽，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

我在電視熒屏前哼唱，唱着唱着不對了，再唱第二遍時，仔細盯着字幕看，發現原歌詞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勝利」了。

是的，我們多年來唱的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不久前為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到處播放劫夫在 60 年代初作詞作曲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也就是反復輪唱：「向前進，向前進，朝着勝利的方向！」

《團結就是力量》，是 1946 年作於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一齣小歌劇的主題歌，那時候第三次國內戰爭剛剛開始，人民解放軍尚未轉入反攻，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還有三年光景，「勝利」和「新中國」的確都在前面，要向前進，才能走向勝利，走向新中國的。「向着勝利」，有什麼不好呢？

然而，「向着自由」，又有什麼不好，有什麼非改不可的理由？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在 1945 年黨的「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號召在戰後「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他說：「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當時黨的文藝工作者，在想到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的時候，認定她的屬性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歌詞中不可能並列五個定語，但在以團結奮鬥為主題的歌曲中，以「自由」同「法西斯蒂」和「不民主的制度」對舉，是不錯的。這是包括「自由」一語在內的歌詞的政治背景。

而在這以前的 30 年代，甚至早在 20 年代，多半是由赴蘇學習的共產黨人從蘇聯帶回來一首革命歌曲《同志們，

勇敢地前進！》（拉金作詞，別雷編曲）原詞有七段，大約為了普及，易於在群眾中特別是在工人中傳唱，流行的歌詞是由中國同志另填，壓縮為一段四句的（歌名亦改為《光明贊》）：

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
黑暗已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

是誰填的新詞，已無可考，但在當時直到 40 年代末流傳甚廣。艾青的長詩《向太陽》、公木《八路軍進行曲》（現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一開頭就是「我們的隊伍向太陽」，都寫於 30 年代末，我看都受到了此歌有形無形的影響。至於牧虹作詞、盧肅作曲的《團結就是力量》，「向着太陽，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正是前引歌詞的引申，不是「萬丈光芒在前頭」，而是作為革命主體的「我們」，團結得如鐵如鋼的革命力量自己「發出光芒」了。這就是此歌的藝術背景。

懂得了《團結就是力量》一曲的政治背景和藝術背景，就知道硬把「向着自由」改為「向着勝利」，姑且不問是否征得了原作者的同意，是否有侵權之嫌，就事論事，也是沒有道理的，是輕率而粗暴的。如果不是出於青年人的無知，而是出於主事者的武斷，就尤其值得一切有責任感和歷史感的文化工作者注意。

在革命戰爭的年代，革命需要是第一位的。革命的群眾歌曲的生命，在於適應群眾運動中團結鼓舞群眾的需要，因此有些歌曲的歌詞，在不同時期作了改動，如舒模作詞作曲的《你這個壞東西》，在不同時期就有不同的版本；喬谷等作曲的歌唱軍民關係的《朱大嫂送雞蛋》，到後來改詞成了諷刺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朱警察查戶口》。但不是任何以革命的名義所作的改動都是正確的和成功的。至於文革以後居然一度要把《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亂改一番，不說是居心叵測，也是匪夷所思吧。當時決策者的政治動機姑置不論，事實也證明，儘管當時組織了像光未然、李季這樣的名家去幹這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也終難改掉田漢在國難當頭的30年代寫定的歌詞，那裏凝結的是詩人的心血，也是千百萬苦難中國人心的呼聲，血的號叫！

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紀的90年代末，為什麼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國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兩個字，以為這樣就能改變人們的歷史記憶，就能抹煞當時革命者和愛國者們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嗎？

寫到這裏，我想這篇小文的標題未免太溫和了，應該改為：〈不許篡改！〉

1999年5月18日

關於《人權宣言》

——為《青年小百科》作

法國大革命中誕生的《人權宣言》，全稱《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它在理論上顛覆了神權和君權，開闢了一個人權的時代。

這個《人權宣言》（1789），共十七條，如果不能通篇背誦的話，至少應該記住第一條所說的：

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

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宣言宣佈主權在民，公民人人都有權直接或間接參加立法，決定賦稅，擔

任公職，並享有信教自由，言論、著作和出版自由，以及知情權，等等。

這些，可與美國《獨立宣言》（1776）參看。後者認為人人生來就賦有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

這兩個宣言在人類歷史上最初提出了普遍實現人權和公民權的綱領，在走向民主和法治的歷史長途中，是具有開創性的重大里程碑。

《人權宣言》的第一條，邏輯上包含有政治民主以至社會民主的意義，第三條標舉主權在民亦即民主制的基本原則，制止可能發生的非民主的權力之行使，更不要說濫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權宣言》至少以第五至第十一條的篇幅，闡述了「法律是公共意識（志）的表現」的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規定了法律和自由的關係和界限，立法和執法的原则，包括無罪推定等等。

從這裏我們體會到，人權、民主和法治乃是互相依存的。人權和公民權要靠民主和法治來保障，而對人權和公民權的重視和尊重，又是民主和法治的前提。正如這一宣言的前言部分所說，「不知人權、忽視人權和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

《人權宣言》具有 18 世紀法國思想的特徵，它提煉了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和百科全書學派、重農學派，以及英國洛克的進步思想；例如來自伏爾泰的思想就是個人必須受到保護，使之免受警察的專橫和司法機關的錯判，等等。根據這些思想制定的原則，一般說來是對人類最為基本的，也是普遍適用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權觀念不斷發展，人權內容也日益具體。

1945 年的《聯合國憲章》，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繼承了《人權宣言》的精神，系統地提出尊重和保護基本人權的具體內容，並把人權納入了國際法的範疇。在《人權宣言》誕生將近二百年時，聯合國大會全票通過後開放供各國簽署並於 1976 年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重申了公民個人所應享有的各種權利和基本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國籍、政治和社會等各種原因而受到影響；在具體內容上較之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又有所發展，如從法律上禁止任何鼓吹戰爭的宣傳，任何鼓吹民族、種族和宗教仇恨的主張等。

中國政府在 1997、1998 年先後簽署加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雖然還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生效，這兩個公約的內容，卻也是我們在學習《人權宣言》的同時，應該力求了解和熟悉的。

在新世紀，中國人要和全人類一起，實現人權、民主、法治的目標，推動全世界的和平和發展，這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成為我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實踐問題了。

1999年11月30日

回答和不回答

1999年12月11日晚，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聽了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音樂會，由美國男低音歌唱家凱文·梅諾（Kevin Maynor）演唱羅伯遜歌曲，加上電影和幻燈，反映羅伯遜的音樂、政治觀點和生活。

對於有「黑人歌王」之譽的保羅·羅伯遜（1898-1976），我素有好感，早在1949年夏聽說他將應邀訪華，我還寫過一首小詩表示歡迎。然而他沒有來，後來知道是受到杜魯門政府的阻撓。羅伯遜終其一生，沒有能來中國。這回聽到的羅伯遜歌曲，既有我所熟悉的《老人河》等，更有

其他一些勞動歌曲、藍調、靈歌和教堂聖歌，以及猶太民族歌曲。

不過我在這裏要說的不是音樂方面的收穫，而是說明書上譯介的一段答問。是 1950 年代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時期聯邦調查局一次聽證會的記錄。從羅伯遜的話裏，我得知了有一個《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指當事人在審訊中有權對某些問題保持沉默。

以下是其中的主要內容：

阿蘭先生（以下簡稱阿）：你現在是共產黨員嗎？

羅伯遜先生（以下簡稱羅）：噢，夠了，夠了，夠了，別再問了。

謝莫先生（以下簡稱謝）：請你回答好嗎，羅伯遜先生？

羅：共產黨是什麼？你說共產黨又是什麼意思？

謝：我希望您要求證人回答問題。

羅：你說的共產黨是什麼意思？據我所知，共產黨是與共和黨、民主黨一樣的合法的政黨。你指的是哪一個？是那個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黨派，由那些為了我們的人民，為了所有美國人和勞動者的尊嚴不惜犧牲生命的人組成的政黨？你指的是那個政黨嗎？

阿：你現在是不是一名共產黨員？

羅：你是不是想在我投票的時候，把我投的那張選票從投票箱裏拿出來看一下？

阿：主席先生，我請求您命令證人對此問題作出回答。

主席：您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羅：我擁護第五修正案。

謝：您說什麼？我沒聽清。

羅：我擁護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阿：你是要行使第五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嗎？

羅：對，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

阿：你是否已經明確，如果你如實告訴委員會你現在是不是一名……

羅：我沒什麼可說的，我要求行使第五修正案。我想要做什麼與你們無關，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好了別再問了。

主席：但委員會要求你回答這個問題。

羅：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所以我不打算回答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答案。

阿：我建議主席先生命令證人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他是否已向我們如實提供了一些可能會在刑事訴訟中對他本人不利的資訊。

主席：我們要求您回答這個問題，羅伯遜先生。

羅：先生們，我去過很多地方，斯堪第納維亞、英格蘭等等。無論在哪兒，共產黨員總是首先為反法西斯鬥爭而獻出生命。這並不是什麼刑事行為，第五修正案也與刑事犯罪無關。最高法院大法官瓦倫先生在多次講話中都已表明第五修正案與刑事犯罪無任何關係。我要行使第五修正案。

從這一記錄看，保羅·羅伯遜借助於上述第五修正案，拒絕了回答對他不利的提問。這使我想到了，在過去不短的歲月中，例如文革期間，我們曾經不得不面對指供、誘供式的各種提問；在眾口一詞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口號聲中，完全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即使不是處於天生的「被告」地位，而在所謂正常時期，也要面對諸多的表態要求，而沒有不表態的自由；就是說，相對於發言權的不發言權，也是不存在的。而整人者除了可以無中生有地構陷入罪之外，還可以從你現成的自述、表態、檢討當中取其所需要，「上綱上線」，雞蛋裏頭挑骨頭，讓你自己走進自己的「甕」裏去。

因這樣的切身經歷，我對於這一《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格外有興趣。據鄧小平說，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談到斯大林在肅反中的暴政時，曾經說，這樣的事情在英美等民主法治國家是不會發生的。此見甚為中肯。

記得國內似也出版過羅伯遜的傳記，其中當有有關章節；又，關於《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國內也應有相應的介紹：都會比音樂會的說明書所言更加確切，待找來一閱。

2000年3月7日

不僅是美國的事情

我在〈回答和不回答〉一文中，提到歌王保羅·羅伯遜在抵制 50 年代初期麥卡錫主義「非美活動」調查時，曾經以《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為武器。我在文末說待找美國《憲法》有關的材料看一看。

此文在《隨筆》刊出後，許良英老人就來電話說，他那裏有相關的中文資料。後來他在溽暑中複印了三件寄我：一是美國 1791 年《憲法修正案》（一稱《權利法案》）原文；二是它的中譯本《美國的歷史文獻》，趙一凡編，三聯書店，1989）；三是愛因斯坦給弗勞恩格拉斯的信（《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9）。

《美國的歷史文獻》第 48 頁有對《權利法案 1791》背景和性質的說明：

合眾國憲法的制定過程充滿着爭執和反復的平衡。作為革命理想和實際利益的矛盾產物，它以其開放兼顧、自相克制的特徵被專家們稱為「一堆妥協的結果」。

憲法草案完成之後，對它最大的意見是其中缺少權利法案部分。在此問題上，憲法起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與要求修改憲法草案的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等人爭執難下，很快導致了國內政治派別的形成，並影響到憲法的最終通過。

由於美國人民普遍重視「人民主權」，並希望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他們鬥爭得來的基本人權，當時的眾議院領袖詹姆斯·麥迪森相應地提出了修正案，首屆國會通過了其中的十二條，各州最終批准了十條，於 1791 年 12 月 15 日正式生效，成為憲法的頭一批修正案，即人權法案。

權利法案的基本意圖是扼制中央政權的強大趨勢，明確規定聯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情（各州的人權法案也有類似的限制性質），同時突出民眾與個人權益的不可侵犯。

羅伯遜一再提到的那一條憲法修正案全文如下：

第五條修正案

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應受判處死刑或會因重罪而被剝奪部分公權之審判；惟於戰爭或社會動亂時期中，正在服役的陸海軍或民兵中發生的案件，不在此列；人民不得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置於危及生命或肢體之處境；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不得不經過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人民私有產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徵為公用。

這個第五條實際上包括了好幾款，羅伯遜引用的只是其中一款，以拒絕就任何有可能使自己被判罪的問題作證。法律文本的特點是只能引用原文，不能用另外的言語複述。而我想，如果這一條付諸實行，則我們所熟悉的私設公堂、私刑拷打、指供誘供、逼供信、搶抄抓以至非法致人死命等等，就都不僅是一般的違法，而是違憲的行為了。

在十條修正案中，還有幾條讀來倍感親切：

第一條修正案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

第四條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產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拘捕的人，或必須扣押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第九條修正案

憲法中列舉的某些權利，不得被解釋為否認或輕視人民所擁有的其他權利。

還是回到第五條修正案的話題上來。

愛因斯坦 1953 年 5 月 16 日給威廉·弗勞恩格拉斯的信，當年 6 月 12 日刊於《紐約時報》時，曾根據受信人的要求，將有關「第五條修正案」這些字樣刪掉。原信全文收入了《愛因斯坦論和平》一書。

弗勞恩格拉斯是紐約布魯克林的一位教師，那時受到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訊（要審問他的政治信仰、所參加的秘密的和政治性的團體等），於是寫信給愛因斯坦，請教他該怎樣對待這件事。愛因斯坦寫這封信作答，他提出不能停留在以第五條修正案為武器，而應從保衛公民權利和《憲法》精神這一高度來拒絕作證。

愛因斯坦在信中說：

我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反動政客在公眾眼前幌着一種外來的危險，借此來引起他們懷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這夥人是得逞了，現在開始來禁止教學自由，對於一切不肯證明自己是順從的人，就剝奪他們的職位，也就是說要餓死他們。

為了反對這種罪惡，只居少數的知識分子應當怎麼辦呢？老實說，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方法去辦。每一個受到委員會（按：指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也就是說，他必須準備為他的祖國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個人幸福。

但這種拒絕作證的依據，不應當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種遁詞，即援引《第五條修正案》以免自己可能受到牽連；而所依據的應當是這樣的主張：無辜的公民屈服於這種審問是可恥的，而這種審問是違反《憲法》精神的。如果有足夠多的人下決心採取這種嚴肅的步驟，他們就會得到勝利。否則我國知識分子所應當得到的，決不會比那個為他們準備着的奴役好多少。

愛因斯坦這封高屋建瓴正氣凜然的回信公開發表，當即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成為美國正直知識分子反對麥卡錫主義法西斯迫害的戰鬥號角。那個在 50 年代初掀起恐蘇、恐共歇斯底里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氣急敗壞地罵愛因斯坦是「美國的敵人」，有個極右的退伍軍人組織罵愛因斯坦是「顛覆分子」。不過，一年多以後，麥卡錫就氣數盡了，1954 年 12 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譴責他「違反參議院傳統」。這是許良英老人來信中告訴我的，愛因斯坦的這封信，也是他 1963 年在故鄉浙江臨海張家渡翻譯的。其時，他已被打成右派回鄉勞動，他在勞動之餘翻譯的《愛因斯坦論文集》終在 1979 年得以出版。

許良英在信中還告訴我，《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已被 196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吸收，作為該公約第十四條之二（庚）款：「凡受刑事控告者」，「不得被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見《中國人權百科全書》，第 792 至 793 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我知道這個公約，中國政府已於 1998 年正式簽署，不過尚未經全國人大討論批准。

原來以為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是美國的事情。現在看來，已經不僅是美國的事情了。

2000 年 10 月 4 日

看艾琳，說賣座

一部影片，沒有時尚所趨的靚男倩女，沒有情海愛河的纏綿悱惻，也沒有警匪交戰，飛車跳樓，光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中年婦女，在為受到污染毒害的老百姓奔走打官司，這樣的片子能賣座嗎？

美國華納電影公司根據真人真事拍攝的影片《伊人當自強》（*Erin Brockovich*，內地譯名為《永不妥協》），情節就是這樣簡單。

而這部美國影片，獲得了全美春季票房賣座的冠軍！

艾琳·布洛克維奇，一個帶着三個孩子的失業單親媽媽，銀行裏只有 47 美元存款，來一個小小的律師事務所打

工，儘管同事們看不起這個沒學歷、沒專長的外行，她卻格外努力工作。她在整理案例資料時注意到一些驗血報告，便花幾個星期走訪專家，四出調查，發現供水公司生產的飲用水含有超量的六號氯，使成百的家庭因飲水中毒，生了癌症和別的怪病，有個少女不得不切除了乳房和尿道；不僅如此，十幾年來他們排放的工業污水，還一直污染着那個地區的地下水。

艾琳，經過一再的曲折，終於得到律師事務所同事的理解，和老律師一起，跟擁有 280 億美元總資產的供水公司打起官司。艾琳不但在污染的水道裏採集水樣，收集因污染死去的昆蟲屍體作物證，她還要走訪在痛苦和失望中灰了心的受害者，幫助他們恢復「討回公道」的勇氣。一個一個地動員，徵集到幾百個原告，她已經能夠把 643 名受害人的姓名、年齡、家人、電話號碼和發病細節一一記住，當庭作答。經過無數坎坷，通過法律程序，終於為全部受害人爭得總金額 3.36 億美元的賠償，而那個公司最初在談判中只提出賠償 25 萬美元！

在以艾琳為原型的這部影片裏，只有普通又普通一個中年打工婦女忘卻了生活艱辛，「一心撲在」用法律武器維護公眾權益的鬥爭上，既反映了供水公司只顧牟利而損害環境生態和人們健康，並企圖銷毀證據的違法犯罪行為，又反映了弱勢群體在遭受侵權時的無奈無告，當然，它更反映了像

女主角這樣以不畏困苦、不怕威脅的堅強性格終於取勝——想想，當她接到恐嚇電話，讓她「為三個孩子着想」，不要再搞調查的時候，這個單身母親，頂着多大的壓力呀！

這樣的矛盾和鬥爭，這樣的人物和故事，在中國賣座的影片中，類似的也有，像《秋菊打官司》。但是，不同的是，秋菊是為自己打官司，艾琳是為別人打官司，且整個過程涉及複雜的法律程序，顯得比較沉悶枯燥。如果中國今天拍了這樣的影片，能賣座嗎？

也許有人說，這是女主角領銜主演茱莉亞·羅拔絲（Julia Roberts），亦即主演了《摘星奇緣》（*Notting Hill*，內地譯名為《諾丁山》）的那位當紅女明星「人氣」好，如同當年主演《秋菊打官司》的鞏俐；然而在這部影片裏，沒有給她提供多少展示「最燦爛笑容」的機會，我們看到的，只是她以一個職業婦女加單身母親，竟將三個孩子託付別人，輾轉於廢料處理井、污水水道和成百個遭災受難的家庭之間。把這部片子的賣座解釋為追星，不一定能說到「點」上。

這樣的影片能夠在美國賣座，成為春季全美票房之冠，讓我對美國廣大電影觀眾刮目相看。我以為這標誌着一個社會群體的文化素質——包括他們對環境保護和司法公正的關心，他們懂得這都是需要不疲倦地鬥爭的。

一部片子能不能拍好，能不能賣座，取決於影片的全部創作和諸多外部條件，當中離不開觀眾這個重要方面。影

片和觀眾的關係，也是雙向選擇的。如果估計不能吸引相當的觀眾，哪個製片人肯投資拍攝？

我這樣說，沒有貶低中國觀眾質素的意思。如果這部影片在中國公映，不妨聽聽觀眾的反應，也可以從賣座不賣座來作一次驗證。

2000年5月20日

也談格瓦拉

古巴革命中僅次於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二號人物，曾經以其放棄執政地位出走後的神秘經歷，吸引過一代嚮往世界革命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裏跑到周邊國家如緬甸打遊擊的北京紅衛兵，身上多半就有格瓦拉（Che Guevara，港譯哲古華拉）的影響。

聽說最近在一個小劇場演出中國人自編的有關格瓦拉的話劇，圍繞這次演出也頗有些網上的議論，當然是對格瓦拉不勝神往，呼喚「魂兮歸來」的。我沒有看這個戲，也沒有上網，只是聽說，不宜插嘴。

讀了張辛欣一篇〈別了，格瓦拉〉的隨筆，知道美國有一本關於格瓦拉的傳記近作——《一個革命者的生涯》，「展示這個人理想主義的激情，也展示這個人的『冷酷的心』。作為古巴革命委員會四個最高領導之一，他對判處 55 人死刑有直接責任。他懲罰懶散工人的方法是，把人送到遙遠的集中營去。」我想今天那些心儀格瓦拉的人，一定也會為他的「冷酷」作辯：「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打仗哪能沒有傷亡？在對敵鬥爭中難免誤傷自己人，子彈不長眼睛嘛，活着是為革命做貢獻，死了更是為革命而光榮犧牲嘛！

記得在 50 至 60 年代，即蘇聯結束斯大林時期以後，意識形態宣傳獨尊列寧，在文藝領域也出版了不少關於列寧的戲劇電影和文學作品，像《列寧的故事》、《藍色的筆記本》等等，卻已不是正面表現列寧的革命活動和專政鐵腕，而是從一些側面抒寫列寧在日常生活中、在同普通人的交往中的人情味，儼然一個慈祥和善溢於言表的老祖父，再不是目光炯炯高度警覺隨時準備捕獲獵物的「山鷹」了。就為這個，當時中國對「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大批判中，文藝方面的內容之一，就是指責他們歪曲列寧形象。

今天看來，這也算不得什麼歪曲。人是多層面的複合體，像列寧這樣的「偉人」，性格更不可能像天真爛漫的兒

童那麼單純。在階級鬥爭中「橫眉冷對千夫指」，在革命營壘內部「俯首甘為孺子牛」，難道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嗎？

格瓦拉來過中國，曾經留下了一張照片：遠遠的、戴着貝雷帽的格瓦拉少校，手牽着一個中國小小孩，衝一個方向跑去。那小小孩到今天應該也有四十來歲了。但近年未見什麼地方重發這張照片，其實這無損於格瓦拉作為一個世界革命力行者的形象。不是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都願意拍攝「與孩子們在一起」以示「親民」的照片嗎？40年代莫斯科版的《斯大林傳略》，插頁就有斯大林在紅場上抱起獻花小女孩的照片，當時給人的印象，這個笑容可掬的蘇聯大元帥，並不像國際反蘇反共勢力宣傳的那樣，鐵石心腸，手上沾滿鮮血吧？

除了在你死我活的戰爭或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時期以外，一般心態正常的人，都樂於欣賞手執橄欖枝、而不是手持大棒的人，對於具有「革命的兩手」者，人們也樂於接受他「軟」的一手，而對那「硬」的一手，卻是敬而遠之，心存戒懼的。這就是為什麼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要加大筆墨寫有關保爾愛情的「軟性」一面。這一來，不但懷舊的老同志成了熱心觀眾，有些年輕人也能接受。問一個少女的觀後感，她由衷的反應是：「保爾真『酷』！」

不同於張辛欣的〈別了格瓦拉〉，今天表示欣賞格瓦拉的老少爺兒們，恐怕也未必會走上格瓦拉式的征途，或者

去參加什麼恐怖活動了；在嘖嘖稱讚之餘，有人當會重溫往年「身在茅屋，心懷天下」的舊夢，有人則會歎曰：「格瓦拉真『酷』！」

2000年5月23日

擬外國故事

朱學勤先生《書齋裏的革命》一書中說，他在波士頓的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看到德國新教牧師馬丁的一段話：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現在流行模仿國外筆墨，我也來效一下顰，如下：

有一個中國人，50年代初對高校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時候，他想「我不是教授講師，沒我的事」；批俞平伯，他想「我跟《紅樓夢》不沾邊，沒我的事」；反胡風，他想「我不是胡風分子，沒我的事」；內部肅反，他想「我歷史清楚，沒我的事」；反右派了，他跟着起勁，想「我只要跟着黨狠批右派，就沒我的事」；反右傾時，他想「我不是黨員，沒我的事」；大躍進時反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他想「只要隨大溜，順情說好話，沒我的事」；四清運動整社隊幹部，他想「我不是四不清幹部，沒我的事」……到1965年批《海瑞罷官》時，他還想「我連這齣戲都沒看過，沒我的事」，轉眼之間，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他發現自己陷在漩渦之中，往四外看去，已經沒有「沒事」的人了。

2001年2月5日

何必諱言「統治」

在流行的語言體系裏，「統治」一詞總是經常和「反動」聯繫起來，好像一說統治就是「反動統治」；因此在自我表述的時候往往諱言統治。似乎中國只有在半個世紀前是國民黨「統治」着，再往前一點是新老軍閥們「統治」着，而辛亥革命前的幾千年裏是歷代帝王「統治」着，這都不錯；然而，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以後，在中國大陸上「誰主沉浮」，誰是當仁不讓的「統治階級」、「統治者」，實現着自己的「統治」，則對不住，含糊其詞了。其實，這樣諱言統治的結果，是模糊了無產階級專

政作為一種階級統治的性質，是頗不利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原則的。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那裏，不但不諱言統治，而且光明正大地聲稱「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變為（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是無產階級經由革命成為「統治階級」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什麼是國家？「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裏說得毫不含糊。

大家知道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寫了《國家與革命》，這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和爾後共產黨執政的國度，不僅作為一種國家學說，而且具有了行動綱領的意義。列寧指出：

馬克思在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運用階級鬥爭學說，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承認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在談到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權力的時候，按照《共產黨宣言》的提法，「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

暴力」；那末，無產階級經過革命成為統治階級，就意味着組織成為國家即有組織的暴力（軍隊、警察、法庭、監獄），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的實質，也就是通稱的無產階級專政。

早在 1937 年寫作的《矛盾論》中，毛澤東在闡述「矛盾着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即所謂同一性時，就曾舉例說，「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為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卻轉化為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佔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要這樣做。」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後來的權威表述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毛澤東十分明確地繼承了馬列的國家學說，在他這裏，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成為統治階級以後，「經過共產黨」來實現的，擁有有組織的暴力的階級統治；這也是一點都不含糊的。後來的

宣傳中避免以「統治」和「統治階級」來指稱工人階級（據解釋是指執政以後的無產階級），而籠統代之以「領導」和「領導階級」，不知當時有沒有什麼內部通知，或只是範文率先示範，於是約定俗成。1949年6月，提出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專政」以暫代「無產階級專政」之說，可能礙於新政協籌委會剛剛開過，聲明要建立一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府，不好一下子揭櫫「無產階級專政」；而以「領導」代「統治」之說，或也出於一時的策略考慮？按毛澤東一貫的說法，只有在接受領導者那裏才談得到領導權，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自然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所判明的「人民」範圍內的階級、集團和個人自然也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但由於在所謂「人民」內部或政權內部還有「落後」的部分，因此黨也還有在人民內部、在政權內部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的任務，這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原則的邏輯依據。

然而有了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為什麼還要有無產階級專政那一條呢？因為前者不能完全涵蓋後者，更不能代替後者。無產階級專政與共產黨的領導是互相依存的。毛澤東認為，「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如果諱言統治，如果模糊了無產階級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性

質，模糊了它作為統治階級手中的暴力這一特點，不是無異於把共產黨的領導解除了武裝嗎？

查一查 1996 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修訂本）》，〔統治〕一條，釋為「憑藉政權來控制、管理國家或地區：階級～～|血腥～～|封建～～」，還是更多地用於負面意義；〔統治階級〕一條，釋為「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有時特指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這個「有時特指」反映了相當時期以來的一種語言習慣。

《共產黨宣言》說：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昨天的無產者，今天（經過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的工人階級，為什麼不在宣傳中強調自己的階級成了統治階級，就是要通過國家即有組織的暴力實行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呢？為什麼在宣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好像不那麼理直氣壯？這算不算黨的宣傳工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2001 年 2 月 19 日

《愛因斯坦語錄》

手頭這本《愛因斯坦語錄》，收集了愛因斯坦從 17 歲起到晚年許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有不少摘自非正式著述，例如題詞、訪談、他人回憶和私人信件，包括從未發表過的給兩任妻子的情書、家信（妻子是否宜於像官員換屆一樣稱「任」，我拿不準，但又找不到合適的序量詞，故暫從俗）；我們從中能更逼近地看到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激情又有個性特色的愛因斯坦。

我是「亂翻書」，就不先看那些關於政治、關於人類、關於宗教的大題目，而一翻就翻到似乎可有可無的「雜題」。

果然有趣，又不止有趣。

例如關於年齡、可理解性、好奇心和神秘感：

有些人，如你和我，雖然像其他人一樣到時候也會死，但是，不管活多大歲數，我們都不會老。我的意思是，在這個我們誕生於其中的偉大的神秘世界面前，我們永遠像充滿好奇心的孩子一樣。

這個世界的永恆的神秘是它的可理解性……它是可理解的，這個事實是一個奇跡。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驚奇地看到永恆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底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聖的好奇心。

我們所能經歷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感。它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感情，存在於真正的藝術和科學的搖籃中。如果不知道有這種神秘感，感覺不到神奇，感覺不到驚異，那就形同行屍走肉、熄滅的殘燭。

你不覺得這些話所包含的思想，領我們一步步走近詩也走近科學麼？

愛因斯坦極其推崇個人和個性：

在人類生活的多彩的展示中，在我看來，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豐富感情的個人，是個性，當群眾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仍然是遲鈍麻木的時候，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和崇高。

只有當人類社會達到足夠的寬容開放，使個人的才能得到自由發展，人類社會的高貴價值才能顯現。

另一方面確實也有這種情況，一個永遠不肯被奴役、或被當作盲目工具使用的、秉性自由的人，可能遭到肉體消滅。

而愛因斯坦堅信，只有獨立的個人才能產生使社會得以改善和避免貧乏僵化所需要的新思想，甚至「我承認，思想能夠影響身體」。

他這樣說「寬容」（1934）：

最重要的寬容就是國家和社會對個人的寬容。……如果國家變成主體，個人淪為惟命是從的工具，那末一切高尚的價值就都會喪失。

他這樣說「良心」（轉引自他的訃告）：

即使是國家的要求，也決不能做任何違背良心的事。

他這樣說到「暴力」(Violence)：

暴力有時可能很快地清除障礙，但是它卻從來沒有被證明是具有創造性的。

而早在 1930 年，愛因斯坦就這樣論「暴力」(Force)：

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批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

愛因斯坦這些話，講在希特拉上台兩三年前；而在德國這樣一個二百年來沒有民主和人權的「最殘酷的極權主義的故鄉」，這些話又一次成了不幸而言中的預言。

杭州出版社的這本書，愛麗絲·卡拉普賴斯編，仲維光、還學文譯，許良英校並作序，還附錄了許良英寫的《愛因斯坦評傳》，對於想了解愛因斯坦生平、科學貢獻、思想和人品，但又不可能鑽研《愛因斯坦文集》的一般讀者，不失為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2001 年 8 月 18 日

陽光下的黑夜

寫了談軟禁那篇文章，其中曾涉及暗殺云云。

於是，精神上的虐殺，肉體上的消滅，綁架，逮捕，行刺，極刑，殺人，砍頭，槍斃，絞架，凌遲，劊子手……這些中外古今或同或異的字眼紛至遡來，揮之不去。

※ ※ ※

這些話題，像陰謀、謀殺一樣，通常似是黑箱操作，不見天日的。

但現在窗外陽光耀人，寫下這些詞彙，依然陰氣森森，那毛髮倒豎之感，就是恐怖或恐懼吧。

不知印歐語系中的恐怖、恐懼是否同一詞源，在我的母語中，卻都源於一個恐字，七情之一，至少是有文字以來便有的心理反應。

那給人恐怖恐懼的刺激的，最初來自自然，黑暗饑餓寒冷風雨雷電山洪林火，野獸猛禽和一切對生命的猙獰威脅，繼而也許大量來自同類的自稱靈長類的人吧。

※ ※ ※

是的，這是全人類的現象。

所以 19 世紀的散文大師雖然沒經歷過希特拉的死亡營，斯大林的肅反，波爾布特的所謂革命，以及中土的白色恐怖、紅色恐怖，也早已寫出過論恐懼的宏文。也許現代人只能為他補充些後出的例證。

※ ※ ※

我在上世紀的 1998 年秋，在顧後瞻前的〈狂歡不再〉一文篇尾，曾說在 21 世紀人們可能遭遇到的後冷戰時代的三種致命的危險，其一即恐怖組織的恐怖行動。

不意「九·一一」這個為大半個世界異口同聲指認的大規模恐怖行動，這麼早就降臨到新世紀曙光初照的小小地球上。

但我在意識到恐怖組織的恐怖行動將給人類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全帶來的威脅時，也沒想像到「九·一一」事件這樣

大面積和強力度的殺傷，我心目中還是零星的至多是密集的爆破、槍殺、劫機威脅罷了，總之，沒想到個人或集團採取的恐怖行動，早就暗暗地發展成時人指稱的國際恐怖主義了。

※ ※ ※

在我接受的關於革命的正面教育中，是排除以肉體消滅為目標的暗殺行為即所謂個人恐怖行動的。

據說列寧的哥哥謀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未遂被捕，17歲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寧）表達決心說：「我們要走另一條路。」

另一條路即推翻整個的舊制度，而僅僅謀殺沙皇本人並不足以達到這一革命目的。

※ ※ ※

但在從整體上推翻舊制度的革命過程中，是不是排除恐怖手段呢？

歷史記錄下列寧的鐵腕。十月革命後，以革命的名義處死了成千上萬的政敵，其中包括昨天的同盟者以及平民。

※ ※ ※

1917年二月革命時已經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於1918年被秘密處決，連同妻子兒女。至今沒有證據表明列寧命令這樣做，但也沒有證據表明列寧不同意這樣做。

國際公法沒有一般地反對戰爭，但反對虐殺戰俘。

羅曼諾夫 (Romanov) 家族的末代沙皇連戰俘都算不上。

※ ※ ※

也許執政者的恐怖行動，無論殺戮一個人一批人或一個階級一個群體的人，都不算恐怖行動，而是其主權即統治範圍內的合法行為？

法國把一個專業劊子手世家稱為「合法殺人家族」。他們作為行刑的劊子手，不因「殺人」而受法律追究，他們的殺人是政府意志的體現，政府行為的實踐，因此歸根到底是「合法」的。

※ ※ ※

斯大林舉行三次莫斯科大審判，大開殺戒，都由總檢察長維辛斯基 (Andrey Vyshinsky) 主持，像按照幕表似地履行一道道法律程序，自然是「合法殺人」。

※ ※ ※

蘇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基洛夫獲得高票，「票高震主」，這是他隨後被暗殺，而人們咸認為出於斯大林策劃的原因之一。

據說為了徹查這一案件，引出了列寧格勒大清洗——大屠殺，當然又是「合法殺人」了。

「合法殺人」與非法殺人——也就是明殺與暗殺交互為用，在執政條件下，就以明殺為主，暗殺為輔了。

※ ※ ※

為什麼在卡廷森林殺害數以萬計的波蘭軍官的事又諱莫如深呢？

明明是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決議付諸執行，是光明正大的「合法殺人」，卻弄得支支吾吾、躲躲閃閃、鬼鬼祟祟？乃是因為殺外國人，且並非戰爭中的敵國的軍人，而觸犯了國際法，觸犯了世界範圍的眾怒，不敢承認，只能推託搪塞，諉過於人，一包包了四五十年，終於紙裏包不住火。

※ ※ ※

世上的事情都可以以小喻大。

從我們「身邊」看，那些鄉鎮市縣正副職官員之間，為爭權奪位，為掃清道路，不惜買兇殺人，不就是政壇名人巨擘之間製造口實置人死地的縮影麼？

※ ※ ※

東方有，西方也有。

美國總統四年一屆，二百年來從林肯始頗有幾位是被暗殺的。最晚的一位，是1963年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也譯肯尼迪）吧。

謀殺原因無他，不同的政策後面是不同的利益集團，是社會財富及資源佔有份額的矛盾，也是政治權力佔有份額的矛盾。

※ ※ ※

同是對政敵的謀殺，也有不同。

西方，多是在野的謀殺在朝的，劣勢的謀殺優勢的。

東方，則往往是主流的謀殺非主流的，有權的謀殺無權的。

※ ※ ※

西方，對手間可以說是旗鼓相當，名實相副的政敵。

東方，則撲朔迷離，平時無所謂政敵，都是同志和戰友，一朝翻臉，已成十惡不赦的「人民公敵」；其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假想敵」。

※ ※ ※

從好生惡死的人類本性和常情度之，一切以暴力剝奪他人生命或對他人生命形成威脅的，都使人感到恐怖，恐懼。

但常識又告訴我們，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而一切革命又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革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與暴力不可分，能說一切導致流血犧牲的都是恐怖行為嗎？

在這裏，我們的思維很容易陷入有關正義和非正義、多數人和少數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有權者和無權者、合法與不合法、人權與主權，以至陰謀與「陽謀」這一系列範疇形成的迷途、怪圈和泥淖。

※ ※ ※

訴諸情理，人性有共通的許多方面，不同的群體也會因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所持不同。

訴諸法理，各國的法律有時出入很大，甚至大相徑庭。理應共同遵守的國際法怕也遠不完善。

※ ※ ※

國際法將如何界定國際恐怖主義，我們拭目以待。有誰能作出有價值的建議嗎？

※ ※ ※

我們說恐怖行動，過去常指個人的或某些群體的個別行動。

我們說恐怖組織，就是把恐怖行動集約化經常化計畫化了。

而恐怖上升為主義，則是理論體系與系統實踐的互動，務虛它會形成精神控制，務實則可能導致政府行為。不僅對內必然是極權主義的專政高壓，而且對外富於侵略性，時刻危及地區和世界和平，安全，人類的安寧、生命和前途。

從現實政治層面和人類整體命運層面看，都需要對這個國際恐怖主義作出系統的綜合研究，分析它的源，它的流，它的不斷變化的表現。

※ ※ ※

國際恐怖主義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

我甚至想起了幾千年來有文字記載的「人性惡」的歷史……

2002年1月

為自由而閃耀

——讀《自由星輝——
世界猶太裔文化名人傳續集》

苦難能夠摧毀人，卻也能淬勵人的精神。無論一個人、一個群體以至一個民族都是這樣。

猶太民族兩千多年來遭到亡國滅種、走死逃亡之痛，到 20 世紀中葉，又有六百萬同胞死於法西斯的屠殺。同樣飽受法西斯主義荼毒的中國人對此感同身受。

1941 年，正當眾多的猶太人被驅趕到死亡營、焚屍爐，千百萬倖存者被迫輾轉流徙，隨時有死於非命的危險，而歐亞兩洲人民也已被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置於侵略的炮火下，其他若干國家和地區即將被捲入戰爭的災禍之際，這一年的 8 月，羅斯福和邱吉爾兩巨頭——準確地說是美英兩國政府

首腦——聯合發表了《大西洋憲章》，旗幟鮮明地揭櫫了「四大自由」，即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使全人類，包括猶太人，也包括中國人，在硝煙和血泊中聽到響亮的號召，在痛苦和迷茫中看到了熹微的希望。

二戰的勝利，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自由對法西斯的勝利。但遠非最後的勝利。戰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並沒有從某些國家內部和國與國之間退出。各式各樣的野蠻，各式各樣的專制，還在阻撓着人類的進步，製造着種種災難。

而在爭取人類進步的漫長過程中，特別是近百年來，湧現了燦若群星的作出卓越貢獻的卓越的人。一個奇跡般的發現：其中不少第一流的人傑，雖屬不同國籍，卻都是猶太民族的後裔。

我們像康德（Immanuel Kant）一樣仰望星空，又低頭歷覽這長長的名單，令我們動情的不止是這些人傑可見可考的經歷和業績，還有他們思想和實踐中貫串的人文精神。

在這裏，衡人的尺度，不是時下流行的所謂「成功」的標準。其中有些人與其褒為「成功」人士，毋寧如實說是「失敗者」，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就是在1919年領導柏林一月起義失敗後被德國政府秘密殺害的。

我這一代人在成長期中，追隨中國共產黨，嚮往俄國十月革命，因此，列寧稱譽為「鷹」（「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雞永遠不能像鷹飛得那樣高」）的共產黨人羅莎·盧森堡曾經是我們崇拜的偶像之一，她的《獄中書簡》則是我們錘煉革命情操的教材。然而我們囿於成見，往往忽略了，盧森堡那些被認為「犯錯誤」的見解，也許實際上正是她表現了高瞻遠矚的預見。

儘管盧森堡與列寧在革命活動中互相支持，對列寧也很尊重，但早在 20 世紀之初她就不同意列寧式的建黨結構，責備列寧是極端集中主義、主觀主義。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勝利，盧森堡站在支持者的立場，在歡呼聲中，她對新建立的社會制度提出批評說：「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她表示憂慮：「隨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陷於癱瘓……」她實際是要求實現黨內民主化進而擴大到全社會的民主化。這一獨立見解是基於她憎恨一切壓迫和奴役行為，抱有明確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義情懷。後來蘇聯七十多年逐步走向失敗的歷程印證了她的遠見。

另一位卓越的女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也譯漢娜·鄂蘭）是現代社會的有力批判者。她所著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不僅

給她帶來世界性學術榮譽，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本書以納粹的種族滅絕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指出那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它把一部分人視為天生理應消滅的「種類」，進行集體的改造和屠殺；過去專制政權僅限於迫害「政敵」，而集權主義卻無情地消滅它的「順民」；它甚至公然踐踏人的道德信條，使撒謊、作偽證、行使暴力等暢通無阻。這套邏輯將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解釋為一個封閉的整體，自訂一個「終極目標」，為此要對現實世界進行任意的改造，一部分人自封為這一改造的執行者；發動那些陷於被攻擊的恐懼中的人去攻擊其他人，並賦予「崇高」的含義，這正是納粹—法西斯主義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阿倫特在影響 20 世紀風雲的許多重大問題上，都發出自己的有力的聲音。她在《論革命》中把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加以比較，表達了「自由憲政的共和主義」的理想；同時揭示了「革命」這個人類活動中所包含的難以擺脫的悖論。

從德國逃亡到瑞典的女詩人奈麗·薩克斯（Nelly Sachs），她的作品更具猶太色彩，她認同她同胞的信念和宗教神秘觀，用象徵意味濃厚的有靈性的語言寫詩，不避諱死亡集中營和焚屍場的恐怖真相，呈現出面對人的卑劣行徑所感到的哀傷。她要「讓一切恐怖和怨恨都成為過去」，因為新事物不可能建立在仇恨和復仇的基礎上。1966 年，薩克

斯「由於其卓越的抒情詩篇和劇作以感人的力量表達以色列的命運，以及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寬恕、解脫與和平的精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¹

我們心目中這些燦爛的星辰，在歷史的天空，都是為文明而不是野蠻、為自由而不是專制，閃耀着自己全部的光輝。

※ ※ ※

在重版時冠以「智慧星輝」書名的《世界猶太裔文化名人傳》推出了88位傳主（編按：傳記主角）；眼前這本續集，傳主也達78位。前者選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及大眾傳媒各領域，後者則擴大到政治文化、經濟文化的代表人物。經濟文化方面所收的理論家和企業家，都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貢獻卓著，自由經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支柱，他們所代表的經濟文化符合社會進步的方向。而政治文化方面入選的個別傳主，所作所為則與社會進步的方向相悖，與全球價值相悖，與其他典型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名人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不可同日而語。如長期擔任斯大林副手的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公德私德均不足取。據本書中〈蘇聯歷史上最具有權力的猶太人——卡岡諾維奇〉（高科）一文稱，

1 對以上三位傳記主角的簡述，均引自《自由星輝——世界猶太裔文化名人傳續集》有關三文，作者分別為鄧峰、崔衛平、錢濤。

1925年，他受斯大林委派去改建烏克蘭共產黨，採取一系列反對所謂「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過激做法，不得人心；30年代，他全面支持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以積極和殘暴聞名，所到之處，便有成千上萬戶所謂「富農」、「富農的走狗」全家掃地出門；1934年，在蘇共十七大上，他借擔任組織委員會主席的權力，下令銷毀了近300張反對斯大林的選票，使斯大林和基洛夫都以滿票當選，為斯大林保住最高領導地位；1933至1934年，1936至1938年，他是大清洗的急先鋒，經他審批的逮捕、判決名單達幾十件，他審查大案、要案時隨意改動判決內容，並受斯大林委派到一些州去摧毀當地黨政部門，僅在頓巴斯一個地方，他就下令於一夜之間逮捕了一百四十名黨政幹部……夠了，就是這樣一個靈魂醜惡、雙手血腥的惡棍，極權主義的死命推行者，怎麼能廁身於為文明和自由的群星間呢？

也許編者所說的宗旨之一「從正反兩方面揭示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文精神」能夠解釋一二，收入卡岡諾維奇式的人物，是要他充當「反面教員」的。不過，把這樣的人列入「文化名人」，總覺難以苟同。名人固然，文化何在？只有卓越的政治家能夠代表一種政治文化，一般大小政客且不足與言政治文化，何況是以政治迫害為業的劊子手？

全書業已編就，我意無須改動，相信讀者自有辨別和評價的能力。

※ ※ ※

討論人文精神和文化方向，我以為應該從區別野蠻與文明、專制（奴役）與自由開始。

「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兩個詞，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其他語文中，多年來往往混用，有待界定。² 然而無論就「文明」還是「文化」而言，都不能離開全球價值的認定。

全球價值取決於全人類的共同要求和共同歸趨。在我們常識所及的範圍內，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實現越來越文明、越來越自由的現代化目標；只有民主，能夠對抗野蠻和專制（奴役），對抗形形色色復活和變種的法西斯主義。

「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凡是符合全球價值，有利於民主的建設健全，有利於人的越來越自由（而不是恐懼於專制）、越來越文明（而不是屈從於野蠻），有利於人們物質福祉的增進和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該是我們歡迎、樂於吸納和傳承的，反之，便堅決拒絕它。

2002年7月29日

2 參看陳言〈「文明」與「文化」〉（《學術月刊》，2002年第二期），我在本篇中所有「文明」一詞，則是對應於「野蠻」來使用的。

伯利恒之星

所謂「中東」、「西亞」，於我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遠不如歐美一些國度，雖然沒去過，但對它的方位、幅員，大抵有個模糊的印象。

然而有些地名，像耶路撒冷、伯利恒，可是從小就聽說，記得清清楚楚。恐怕是得之於教會學校的薰陶了。

這一切都跟輝耀着冰雪和燈火的聖誕節分不開。這是耶穌降生的日子，也是孩子們歡樂的節日。

我 1939 年上了北平育英學校小學部。那年冬天過我生命旅程中的第一個聖誕節。沒有宗教儀式，一年級小學生也

沒上相鄰的公理會教堂。但每人發了一紙袋，吃的，記得是夾餡麵包，還有零星糖果。數量不大，意思到了，上帝的饋贈啊。拿回家，自然是我個人享用的；好像高年級的姐姐哥哥並沒有拿到這份聖誕禮物。那該是格外厚待我這初來者了？——誰知道，或許他們也有份，沒帶回家就在學校吃掉了？

我還做過一件與聖誕節有關的「美術」兼「手工」作品。算起來該是 1940 年的聖誕節前夕；因為 1941 年冬聖誕節還沒到，12 月 7 日日機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我們這家由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資助的學校就被日本佔領者接管，我們提前回家過了一個長長的寒假。

而那年，日本還沒接管我們學校。為了歡度聖誕節，不記得老師是怎樣佈置的，反正我想獨出心裁，決心做一個金星，然後飾以青枝綠葉的流蘇。但回到家，真正動起手來，頭一個困難是材料：手頭沒有現成的金箔紙，連「電光紙」都沒有，只能用單面掛白的硬紙殼。借來姐姐和哥哥他們的直尺、三角尺和圓規，比來比去，改來改去，畫出個五角星的形狀，再用橡皮把淺淺的鉛筆痕跡擦去，保持紙面雪白光潔。原來構思作流蘇用的枝葉，是心目中的藤蔓植物，但這時已是嚴冬，窗外蕭索，室內又沒養文竹之類可堪披掛垂拂，想得不錯卻實現不了；無奈只得就在白紙殼上畫出幾

縷枝枝葉葉，塗上綠色，跟五角星聯在一起剪下來。那五角星是任其雪白，還是染成金黃，也還頗傷了一會腦筋。

這是我平生惟一一件自己創意的「美術品」。起先家裏人見我苦思冥想，畫了又改，改了又畫，問我的作業是什麼，我還保密，想做好後給他們一個驚喜。待到大功告成，竟只是一個平面的五角星上掛着一串死板僵硬的「青枝綠葉」。

這個想法是受到什麼啟示而來，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但那顆星，無疑是伯利恒天空上懸掛的，「東方三博士」遠路迢迢，奔着它來，終於趕到馬槽旁邊，「聽啊天使唱高聲，報知耶穌今降生……」

忽然想起這些陳年舊事，而且真是陳芝麻爛穀子的小事，是因為看報上國際新聞標題，伯利恒戰火不斷。我不是宗教徒，我總是有意識地回避有關宗教與戰爭的殘酷的歷史，告訴自己，一切宗教都是主張和平與仁慈的。但在人間的權力和武裝面前，似乎宗教情懷就變得脆弱無比了。

伯利恒天上的星，什麼時候能擺脫戰火的遮蔽？

2002年11月27日

「波將金化」

據說，在沙俄的葉卡捷琳娜女皇時代，波將金親王（Grigory Potemkin）為了使女王對他的領地的富足留下深刻印象，在女皇經過的大路旁建造了一些假的村莊。人們把這種做法叫做「波將金化」。

如果此說不誣，那末這種波將金化之風，也是國際性的。50年代時，《譯文》譯載過一篇匈牙利當代小說，生動地描繪了一個紅色農莊為了迎接來訪的外賓（自然是蘇聯代表團），臨時抱佛腳地裝點門面的趣事。西班牙影片《馬歇爾，歡迎你》（西班牙原片名：*¡Bienvenido, Mister*

Marshall!) 也攝下類似的場面，不過在官方儀式同時有另一種「歡迎」穿插其間就是了。

也是 50 年代，我也捲入過這種波將金化的活動。迎迓的卻不是上述這樣高級別的貴賓，而是幾個鄉聯合成片的檢查團，我在一個村的高級農業合作社裏，跟同伴一起往土坯牆上刷寫石灰大字標語：「歡迎檢查」。當時還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已是開始「力爭上游」的「大躍進」之後，大興「比學趕幫超」之風，各地的評比檢查不一而足，我知道，就有在馬路兩旁移栽密植，謊稱高產的，通稱「臉蛋子地」，做「表面文章」也，跟波將金搭設假的村莊如出一轍。

世事如轉燭，大起大落者再，類似的花架子不知見過多少。弄到後來，竟有這樣的奇聞：記者本來是為別的事情下鄉，但基層幹部以為是來調查災難的，於是佈置一些孩子，等車上客人一下車不問是真欽差還是假欽差，就圍攏上去哭窮喊餓，目的無非為了爭取上級多撥一點救濟款。正是老調子已經唱完，花架子尚未塔起——不，花架子已經倒塌。

在一要生存、二要溫飽的鐵則面前，一切勞民傷財、弄虛作假的花架子是不能長久地支撐的。

不知道那位波將金親王後來是怎樣的下場。

1990 年 9 月 7 日

首腦的睡眠

某報轉載了新加坡《聯合晚報》5月9日的一篇資料，原來的標題是〈權越大，睡越少〉，但篇中「天塌也睡」的德國總理科爾的例子就反駁了這一命題：儘管兩德統一的壓力和東德失控的經濟、社會問題逼人，總理辦公室的人指出，科爾睡覺「時間很長」，而且睡得「很好」。還是轉載者改標的〈首腦睡眠各有高招〉更貼切。

我最感興趣的是如下一則：

睡四小時：野心才是工作過度的動力。成就越高，內分泌會自動調節，使人的精力越旺盛。意大利總

理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一天只睡四小時，他就很喜歡說：「只有沒有權力的人才對權力感到倦怠！」

果然，安德烈奧蒂是以「宵旰憂勞」的勤政，不疲倦地日理萬機到夜理萬機，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來顯示他對擁有權力的不倦的愛好。

「宵旰憂勞」是個典型的中國傳統詞彙。中國傳統的詞或短語，有各種人通用的，有按照等級尊卑適用的；如這四個字，絕不用在半夜起床磨豆腐的人身上，而只用來表彰皇帝，連大臣都不配的。一般人起早睡晚：「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都是應該的、正常的、不算一回事的，唯獨皇帝「宵衣旰食」，天不亮就穿衣起床，天晚了才吃飯，就是難得的事情，須得稱誦以至歌頌了。

中國的皇帝，有沒有經常開夜車、幹通宵或者只睡四小時亦即兩個時辰的，我不知道。從正史和稗官小說看，堅持上殿辦公的不少，那是要早起的。當然，連累臣僚們起得更早。這才有了「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的名句。

據說李隆基——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早年也是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但是「在位歲久，倦於旰衣宵食」了；注意，他並非「對權力感到倦怠」，而是對起早睡晚，耽誤了他飲

食男女的煩瑣朝政倦怠了，有詩為證：「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把一應麻煩全推給了右丞相。如果皇帝算國家元首，那右丞相是政府首腦，輪到他執掌權力，輪到他對權力不知倦怠了。安史亂後，在野的詩人「自經喪亂少睡眠」，在朝的李隆基卻也是「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這時候他對權力倦怠了沒有呢？被兒子捧成太上皇，架空了。

南唐後主，有名的詞人李煜，睡眠的記錄也不屬於沉酣不起的。看他不但帶頭集體夜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而且單獨活動也不少，即在夜深人靜之後，同「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的妻妹小周后，「畫堂南畔見」，幽會偷情，總之也怪勞神的。

後起之秀正多，明萬歷皇帝朱翊鈞，十幾年壓根兒不上朝，睡眠情況不詳。他不是沒有權力的人，他不上朝也並不意味着他對權力「感到倦怠」。只能認為，他沒有擔心失去權力的危機感，他自信「天授」的、世襲的權力，不會因他不親政而轉移。這跟他那白手起家得天下的先祖朱元璋的心態顯然不同了。

安德烈奧蒂的總理一職不是終身制，如果在任期內沒有相應的足夠的政績，可能就將由「有權力的人」變為「沒有權力的人」，所以他不僅不會對權力感到倦怠，而且要充

分運用他的權力，以免「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至於他用權於什麼方面，則是另外的問題了。

不過，安德烈奧蒂說「只有沒有權力的人才對權力感到倦怠」一語，恐怕只在反襯「有權力的人不會對權力感到倦怠」這一點上是說對了；而沒有權力的人裏面，固然一部分人對權力是沒有興趣或稱「感到倦怠」的，還有另一部分人，則對權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想通過各種不同的手段取得權力——現在有權力的人，除了世襲的以外，不都是從沒權力的人變成的嗎？有權的人拚命在那裏以權固位，不也多半是害怕沒有權力的人來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嗎？

1991年6月18日

勳章的誘惑

阿拉貢 (Louis Aragon)，作為當代法國的大詩人，作為法國的共產黨員詩人，曾經是我青年時代的偶像之一。我想不少人跟我一樣，不僅讀過他的詩歌、小說、散文作品，而且熟知他的生平。不管國際共運中發生什麼事情，中法兩黨曾有什麼爭論，這種讀者對心目中大作家的感情都沒受到影響。

然而最近讀到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82 年為小說《玩笑》(Žert，英譯：*The Joke*) 所寫的自序，其中提到的一件事讓我困惑了。

《玩笑》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1968年8月，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兩個月後，《玩笑》在巴黎出版。路易·阿拉貢在前言中稱這本書是「本世紀最傑出的小說之一」。這篇前言一時轟動了全世界，因為「阿拉貢不僅是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著名人物和大小說家，而且還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昆德拉接着寫道：

記得1968年秋天我逗留巴黎期間，我曾與他（指阿拉貢）會面。我到達時，他正在接待兩個來自莫斯科的客人，薩哈羅夫的朋友。他們極力勸說他繼續保持與蘇聯的關係。阿拉貢對俄國入侵捷克極為憤慨，他斷然告訴他們，他將永遠不再踏上俄國的土地。「即使我想去，我的腿也不會同意。」

他一邊說，一邊在地板上踱來踱去，就像一部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悲劇中的人物在法國國家劇院的舞台上踱來踱去一樣。我當時很欽佩他。四年後，他的腿卻同意帶他去莫斯科接受勃列日涅夫頒發的一枚勳章；十四年後他的腿又把他帶到法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講壇，那次大會既寬恕了在阿富汗的暴行，又寬恕了對波蘭的奴役。然而正是這同一個阿拉貢曾經對俄國入侵寫過一篇也許是迄今最雄辯、最尖銳的文字——他為《玩笑》寫的前言。

這件事使我由困惑而啼笑皆非。大概不是昆德拉造謠中傷。他住在巴黎，如果憑空杜撰阿拉貢接受勳章的事，讀者也不答應的。

一陣啼笑皆非之後，只怪過去對像阿拉貢這樣的大家，心目中過分拔高，忘記了他雖在某些方面有出眾的天才，但他首先也是常人，因此也難免有人類共同的弱點。無法抵抗勳章的誘惑，怕就是這種弱點之一吧。

把事情歸結為勳章的誘惑，阿拉貢也許以為是一種簡單化。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他自己又沒有作出解釋——他也許認為不需要什麼解釋吧。

米蘭·昆德拉也真夠討厭的，一點也不知道「為尊者諱」。

勳章是有誘惑力的，哪怕是勃列日涅夫頒發的；不能抵抗勳章的誘惑，阿拉貢尚不能免，何況不如阿拉貢的人呢！

唉……

1992年5月17日

高貴的屍體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1918 年被殺害後，屍體下落不明，於是有了沸沸揚揚的許多傳說。其中之一是，法國人把尼古拉二世的屍體買走了，我看過《巨人細事》中一篇譯文，就是這麼說的。我當時想：買這具高貴的屍體去幹什麼？

根據俄羅斯總統的命令，從去年 7 月開始尋找沙皇一家的屍骨。考古學家宣佈，1991 年在莫斯科以東 850 公里處的一座森林中，挖掘出一個墳坑，埋着十一具屍體。其中有沙皇、皇后和五個子女，另外四個人是御醫、御廚、男僕、

女僕。驗屍的初步結果表明，被認定為沙皇的頭顱上有一道老傷，這是他年輕時候訪問日本被刺客用軍刀刺傷的。

這一發掘還得歸功於當時負責行刑的秘密警察尤洛夫斯基（Yakov Yurovsky），他在緘默了七十年後，1989年發表了他在行刑兩天後寫下的詳細經過，包括毀屍方法。當時決定燒毀皇后和王子亞歷克賽（Alexei Nikolaevich）的屍體，但是錯把另一女屍燒毀了，據信是17歲的四公主安娜·斯塔西絲（Anastasia Nikolaevna）。隨後所有屍體都澆上硫酸掩埋。

為什麼這樣毀屍滅跡，是執刑者的自行其是，還是奉上峰的命令？「出於階級仇恨」，還是政治考慮？不詳。

1920年在柏林冒出一位自稱倖存的安娜·斯塔西絲公主，打了幾十年身份和財產官司，後來嫁給美國一位歷史學家，1984年死於美國維吉尼亞州。她若活到現在，夠多尷尬！不過，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Anastasia*）並不因這一懸案之大白而減其欣賞的價值。

本世紀另一個焚屍疑案的主角是希特拉。前些年不是還流傳着希特拉未死，藏在阿根廷的說法麼？

最近報載，曾任朱可夫元帥翻譯官的著名歷史學家列夫·別濟緬斯基斷言，希特拉和他的情婦埃娃，以及戈培爾夫婦子女一家人的屍體，是直到1970年才在馬格德堡最後銷毀的。這些雖遭焚燒而沒有燒盡的殘骸，在1945至1946

年間曾隨蘇軍第三突擊集團軍多次轉移，埋了又挖，挖出再埋，反復了六到九次。這些傢伙活着時折騰人，死後被人折騰。所以如此珍藏，不肯毀棄，據說蘇軍反間諜機關深體上意，擔心斯大林什麼時候想親自看看屍體。直到 1970 年放心毀掉這批屍骨時，上距斯大林 1953 年入殮紅場玻璃棺已十七年，上距斯大林 1961 年被「焚屍」入土也已九年了。

高貴的屍體各有各的際遇。

路透社報道，開羅大學醫學院最近在庫房裏發現了四具有三千四百年歷史的、用鹽保存（鹽漬的！）木乃伊，還有 524 具（524 具！）歷代王室成員和貴族的「遺體」，大約也製成了木乃伊吧，都是 1903 至 1953 年半個世紀一個英國人道格拉斯·德里發掘、收集的，有的經他解剖，骸骨已遭破壞，但都留下了詳盡的記錄。其中最有名的是：祖塞爾國王——他在五千年前下令在塞加拉建立了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沙尚克國王——他在大約公元前九百二十五年領兵在巴勒斯坦取得過軍事勝利。這五百多具高貴的屍體將送往原來僅有 27 具王室木乃伊的埃及博物館，使館藏遽然豐富了。

比起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希特拉來，這些天方貴冑死後若干年還為醫學解剖學做出貢獻，雖然生前沒有簽過捐獻屍體的遺囑；今後還將若干年地在博物館展覽，對於生前前呼後擁、煊赫一時的死者，這也算一派「哀榮」、身後的風光

了，而希特拉及其情婦卻只有牙齒和牙床存放在莫斯科的檔案館裏，檔案聞已解密，此牙似尚未開放參觀，然令人憶及當年，似依稀聽到阿道夫·希特拉齒音嘶嘶的演講，大談工人利益與人類和平也。

不久前曾旅行西藏，在當雄參觀了一座「神鷲」環繞的天葬台，並與天葬師合影留念。我不懂人類喪葬在文化史上的意義，但以為如天葬者，形神兩失，倒也算得上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比火葬留骨灰顯得更乾淨。至於千里奔波把骨灰東撒一撮，西撒一撮，則既不灑脫，又勞師動眾，只有經濟開銷，並無社會和政治效益云。

1992年8月11日

同僚與冤家

去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一個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一個拉賓（Yitzhak Rabin），早就呼聲甚高，故在意料中；而與「巴解」主席、以色列總理分享的，出來一個以色列外長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在推進巴以和談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這都不需多說。

有趣的是，這個佩雷斯，與拉賓既是同僚，又是冤家。我原不知道，讀到《新民晚報》上吳偉農先生的特稿，才驚訝這兩位的出身、經歷「如出一轍」，請看：

拉賓 72 歲，佩雷斯 71 歲；

兩人的父輩都生長在東歐，前者是俄羅斯人，後者是波蘭人；

兩人都曾留學美國；

也都曾任以色列駐美使團負責人；

兩人也都擔任過以色列工黨主席，政府總理和國防部長。

真是「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不經心的國外讀者，也許會把他們視為一人。然而誰能想到，這一對「哥們兒」竟是冤家路窄，「不共戴天」，從四十多年前以色列建國開始，兩人就矛盾重重：

據說，起初拉賓任精銳的帕拉馬赫突擊隊高級指揮官，而佩雷斯作為總理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的智囊人物，硬是決定解散這支部隊；

50 年代中期，佩雷斯作為國防部總司長，同拉賓就以色列應該以誰為自己的戰略盟友而發生爭執，拉賓主張美國，佩雷斯主張法國，結果佩雷斯獲勝；

幾年後，拉賓謀求擔任總參謀長，而佩雷斯舉薦了別人，即現在的以色列總統魏茨曼 (Chaim Weizmann)，雖然佩雷斯失敗了，拉賓如願以償，卻餘恨未消；

此後，「兩人雖然輪流執掌工黨大權，溝壑依舊。1992年拉賓出任政府總理後，在黨內各派平衡的壓力下，才很不情願地任命佩雷斯為外長；而且拉賓宣佈，兩人不會平分秋色，由他唱主角，佩雷斯應甘當配角。」

這篇流水賬，除了勾勒出這一對「難兄難弟」的升官圖以外，確也標誌出兩人互不相讓，恥居人下，此消彼長，不斷較量的過程，說是「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亦不為過。此殆中國之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歟？然而如果不是同走一條仕途，自不會撞車碰頭，也就不會成為冤家。本來「捆綁不成夫妻」，偏要同床，而又異夢，仍不離床，可見那床很有吸引力。夫妻不和，但「名分」仍在。同堂議事，同僚的名分是在的；同屬工黨，則同志的名分也還是在的。這裏先以兄弟為喻，後以夫妻為喻，不避庸俗化之譏，冀得人情味之實；國家之間，尚以「兄弟般的友誼」為貴，何況個人，更何況同僚與同志呢？而兄弟是天生的，同志是自己選擇的。明裏暗裏，鉤心鬥角，卻能「鏗而不捨」幾十年如一日，此中必有特殊的樂趣，是局外人所不能輕易領略的。

這樣說絕不誇張。以我們局限於自己身邊或擴大到「中土」的經驗，不能不認為拉賓總理和佩雷斯外長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難解的謎。謎就謎在：他們早被公認為「不共戴天」的對頭，而竟能「共戴天」近半個世紀之久；他們互不服氣，

勢不兩立，似乎既有權力地位的計較和角逐，又有政策主張的分歧和爭執，但是誰也沒有用明槍和暗箭，或以什麼冠冕堂皇的名義置對手於死地；相反，大家看到他們公事公辦，把個人恩怨放在一邊，就如和平解決巴以雙方衝突的問題，若沒有拉賓和佩雷斯的和衷共濟，是很難想像的。諾貝爾和平獎，為了表彰實現中東和平的勞績，在授給阿拉法特的同時，授給以色列這兩位當權派，顯然不是為了在這一對「又是同僚，又是冤家」的政治家之間搞平衡，有所彌縫或加以照顧。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

慚愧得很，在我們縣以下的，例如股級機構、村級單位，兩三人三五人間也會有「你死我活」之爭。因此請專家研究一下，像拉賓、佩雷斯這樣結對子的搭檔，有爭鬥而無死傷，還都能幹出點有益於民族、有益於人類、有益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像樣的事情來，秘訣何在，以為借鑒，實在頗有必要。

1994年10月18日

戲說音樂

近來「戲說」之風大盛，大抵是《戲說乾隆》電視片大獲收視的緣故，人們彷彿恍然大悟，原來沒有什麼不可戲說。楊公憲益《歲末雜詠》有云：「關張空有兼人勇，不及乾隆武藝高。」便是對戲說的戲說了——這就叫作打油詩，詩中的戲說也。電視劇《三國演義》以忠於原著自律，一板一眼，亦步亦趨，沒有戲說，也是不能討好的原因之一。羊羔雖美，眾口難調，也有不愛吃的。戲說雖有趣，也有不感興趣的，那末關掉電視就是了。娛樂片不是歷史教育片。好在還有別的波段，可以換台。現在畢竟不是一聲哨響，整隊出發去看樣板戲的年代了，不會因為愛看不愛看鬧出什麼

「態度問題」來。何況「戲說」的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乾隆皇帝唐伯虎之流，屍骨已寒，沒人找來打名譽權官司；即使有人執舊日關於「文化部成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的「最高指示」前來問罪，認真起來，這「戲說」正是在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玩笑，把他們從眾人仰望的高度拉下來，變相地執行了橫掃他們的「最高指示」：如此看來，戲說云云，豈不也可以躋入主旋律或準主旋律了嗎？

歷史可以戲說，音樂當然也不妨戲說。為免褻瀆神聖的音樂殿堂，姑只戲說市井里巷間的流行音樂。不過，說實在話，音樂，首先是古典的、高雅的音樂，受挫於戲說的少，而受挫於似乎正兒八經的干預和禁令者多。希特拉欣賞瓦格納（Richard Wagner），卻連貝多芬都不能容。蕭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上了蘇共中央的文件，自然不是表揚。我們這裏，大家也許還記得 1975 年有所謂「無標題音樂」一案。江青一夥跟林彪一夥，在政治上或說在權力分配上有矛盾，屬於「兩丘之貉」；分據兩丘，為貉一也，林彪說的「非常政治化」，江青亦然。指責所有民歌都是「情郎妹子」，通盤否定，顯得「非常政治化」，反對「無標題音樂」，振振有詞，歸結到一點，更是「非常政治化」。由此上溯十年，有所謂「十大軟歌」一案，也許不能簡單歸咎於江青，儘管她當時已經出山大搞樣板戲，甚至炙手可熱，但她還沒有直接發號施令之權，然則或是善體懿意的人之所

為，冀得風氣之先歟？來龍去脈不去追究，反正包括《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在內的十首歌一時遭禁，連帶所及自不止於此，因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人們，不能不也善體「精神」，加以擴大，好預作防範，免得「碰在槍口上」。

於是可見音樂和政治竟是長期捆綁在一起的。這大概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國情。杜牧詩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生於9世紀上半葉的杜牧，上距死於7世紀初的陳叔寶，已經二百多年。陳後主在《玉樹後庭花》聲中亡國，受盡了人們的奚落。古例皇帝駕崩，是為國喪，全國不得飲宴女樂，為期十天半月以至個把月不等。不過陳叔寶是亡國之君，不再享此哀榮，或說可不援例辦理，那末茶亭酒肆，淺斟低唱，也就怨不得商女。況且後庭花曲既是陳後主所心愛，後主已死，商女猶唱，焉知不是商女寄託哀思，以慰後主於地下呢？史籍粗疏，我們弄不清會不會是新朝的新貴故意點唱這支曲子，來「寒磳」一下前朝的末代皇帝，把他的宮廷音樂拿來取樂，並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其中也許不乏前朝的舊臣，杜牧偏要向商女來責以「不知亡國恨」的大義，未免找錯了對象，甚至難逃「柿子揀軟的捏」之譏了。

至於若說杜牧所指並非當時，而是後來的靡靡之音，似乎更不搭界。二百多年前陳後主的亡國，不過亡其一家之國，究竟「干卿底事」？

不過禁唱十大軟歌之類，那思路恰是從反對靡靡之音而來，以其靡靡也，以其軟也，足以軟化唱者尤其是聽者的意志也。《何日君再來》雖是抗日的文化人作詞，曲曲傳出淪陷區人民不知勝利何日但仍抱渺茫的希望，卻被指為散佈消極悲觀情緒的靡靡之音，長期沒有解禁；然而我記得有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從韋瀚章的詞到黃自的曲，「旗正飄飄，馬正蕭蕭……」絕不消極，絕不靡靡，相反是慷慨激昂，聲調鏗鏘，但是也長期都聽不到，沒有明文禁唱，實與查禁無異，不知有沒有作者方面的關係，很難索解，須問音樂史家。

這裏只是說明歌分軟硬其標準頗不可靠。拿近的說，有一首對月長歌，曾經流行一時，歌詞寫邊關戰士和他們的妻子應該共享勝利的榮譽，毫無問題，是硬的，但那曲調則無疑是軟的，不說是靡靡吧，也可謂哀婉欲絕，如泣如訴，當得上「興觀群怨」的一個怨字；與同類的例如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抒情歌曲相比——無論是《喀秋莎》，是《小路》，那戰士與親人互相思念之情，因意識到戰爭的正義性而不惜犧牲，遂賦有了崇高的色彩，就不是淒淒哀哀的旋律所能同日而語的了。再如《國際歌》，這是全世界無產者共同的歌，用所謂軟硬的概念來套，該說詞曲都是硬的，經過歷史考驗，真的過硬。然而近幾年竟也少有人唱，不知道是什麼因由。

歌曲也好，音樂也好，它的流行與不流行，除了以杜牧式的着眼點為基礎的政治干預（包括提倡和反對，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並可能採取不同的形式）以外，還是大有學問，大可研究的。就是對於前者，也不能不研究；主管的官員，有關的老闆，不研究行嗎？音樂創作人員，若是成天捉摸音樂以外的東西，怎麼不僅通過而且要獲得政治的、經濟的多方面的效益等等，恐怕就沒工夫把功夫用在音樂上了；但若是全然不顧一切，「不識時忌諱」地任意揮灑，或是目無受眾地「對牛彈琴」，則難免碰壁，甚至作品連面世也難。

十八年前的 1977 年，捷克有些年輕人引進了西方的流行音樂，當局恪守反西方的原則，加以查禁。於是圍繞着樂隊的命運爆發一場鬥爭。這場鬥爭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名為「七七憲章」的反體制政治組織。回過頭看，一些年輕人搞一點老一輩看不慣的音樂歌舞，是不是真會顛覆政權？值不值得大驚小怪，激化矛盾？十幾年後，政權顛覆，到底是什麼原因？有幾分是由於音樂或歌舞？

捷克是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的故鄉，而德國可以說是整個古典音樂的故鄉。今天，德國又成了流行音樂的最大市場。據說當地的電子跳舞音樂（Technoelectronic dance music）樂手最近成了紅人，喜歡這種音樂的德國青少年達到 600 萬人，巴黎、倫敦的居民

也歡迎他們，有些作品打進了英、美的跳舞音樂流行榜。最有趣的是報道說，「德國官員看見青少年如此着迷，總算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喜好與政治無關，樂迷不像那些少年光頭暴徒，終日只知用暴力解決事情，為政府增添煩惱。」原來這種電子跳舞音樂具有教化之功，可以使青少年沉湎於不關心政治的娛樂，不去惹事生非，能讓當局騰出手來對付新法西斯光頭黨徒。

拿德國這個例子對照前述捷克那個例子，當局對待流行音樂的態度完全不同，後果也不同；兩者的制度不同是毋須說的了，兩例中的音樂同屬通俗的、流行的音樂，怎麼會導致截然不同的政治後果呢？

中國的國情又自不同，又一個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們作為局外人，大而化之地談說海外新聞與舊聞，無由作中肯的分析，結論只能是：政治是複雜的，音樂也不簡單，或說音樂是多樣的，政治更變化多端，所以音樂和政治的關係，決然是「戲說」說不清的，就此打住。

1995年2月10日

論醜聞

讀報紙的國際新聞版，觸目是國際爭端，局部戰爭，而各國國內，則無非兩大塊：一是權力鬥爭，一是災難頻仍；這裏所說的醜聞，往往也是官員醜行的曝光，甚焉者會引發上層人事的變動，更甚者也可以叫作與水、旱、地震等天災並提的人禍。

北約秘書長克拉斯（Willy Claes），曾擔任比利時經濟事務大臣，其間比軍方在從意、法兩國公司購買飛機和航空設備時，發生營私舞弊受賄情事，很像幾年前日本的那個「洛克希德」一案；而克拉斯「應該說是這兩筆交易的主要決策

人之一」，他「應該知道整個賄賂案件」。這導致克拉斯的辭職。

法國前交通部長阿蘭·卡里尼翁，作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三十六年歷史中第一個因受賄案出庭受審的部長，如果罪名成立，最多可判處十年徒刑。

瑞典副首相在十一個月內，用政府信用卡為個人購物，花費了約合 3,500 美元的公款；法國總理為自己和家屬弄到廉價住房：這些都遭到傳媒披露，輿論譴責。

韓國前總統盧泰愚，曾聚斂了巨額的「政治資金」，事發後，舉國譁然，他已為此受到傳訊。

醜聞不限於財貨。曾經七任意大利總理的朱利奧·安德烈奧蒂被控身為黑手黨成員，一朝淪為階下囚。愛沙尼亞內閣第二號人物，副總理兼內務部長薩維薩爾竊錄政要電話，不但自己丟了官，還使執政不過半年的聯合政府土崩瓦解。

果然都是醜聞。

不過醜事向公眾揭開，這才成為醜聞。公眾這才能拭目以看醜事的處理和醜事的結束。

沒有醜聞的地方，未必沒有醜事。掩蓋醜事，則醜上加醜。

或許可以說，沒有醜聞是最大的醜聞。

1995 年 11 月 16 日

多少人想當國王？

我們常把一些出乎想像之外的事情叫作「天方夜譚」或「海外奇談」，這也許是長期閉關鎖國形成的心理。但人們對一些來自海外的哪怕是匪夷所思的資訊並不深閉固拒，一因好奇，聊以供茶餘酒後的談資，二也還借此打開一點眼界和思路吧。

我讀報紙的國際版，關心天下大事或天下小事，就不全是為了惦念另一片天空下「水深火熱」的黎民，有時候也想獵獵奇，把「遠在天邊」的異國人事拉到「近在眼前」來。

比方國王，在我們這兒，只是活躍在小孫女兒心目中的童話角色，而天下之大，如在所謂「天方」那一帶，也還有人生活在國王的統治下，那裏是童話的國度吧？

報載，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因病休養，擔心大權旁落，沙特王室家族有六千多名親王，其中絕大多數親王都對國王寶座興趣濃厚。

這也引起我的興趣，「奇談」之奇，就在於有六千多人想做國王，六千個候選人，而國王寶座只有一個，怎麼辦？「抓鬮」還是搖彩？

認為一國之王，更不必說像沙特這樣的富國，可以像法赫德國王那樣享受權力，享受財富，在蒙特卡羅一夜豪賭輸掉 600 萬美元而面不改色，傾國傾城地吃喝玩樂，令人豔羨不已，於是覬覦王位，如果不是說「人之常情」，也會是親王們之常情吧。但以我輩的「人之常情」，除了「需要」，是不是也還得考慮一下「可能」？六千親王沒有一個是白癡，卻並不覺得想當國王是想入非非，他們想必自有根據。他們堅信自己也有資格當國王；不是像在東方古代那個堅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民，靠的是揭竿而起的竿，鋌而走險的鋌，總之，要以暴力奪王位——然則這些親王靠的是自己的「種」乎？

在更遠的西方，那個不安於「將兵」、「將將」地位，也要嘗嘗為王滋味的拿破崙，曾有一句名言傳世曰：「不想

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果然，不想當國王的親王就不是好親王了。

我們讀本國史，歷代都少不了爭奪王位的宮廷軼聞，弄得兄弟鬩牆，叔侄啟釁，但不管是真的窺伺神器，還是被疑為圖謀不軌的，一時都不過一二人、二三人而已，倘李世民遇到的不僅是建成、元吉，一擁而上，竟達六千之眾，他在玄武門前殺得過來麼？……總之，不知道是在沙特爭王位沒風險，還是中國歷代的宗室都太老實？但僧多粥少，沙特最後畢竟也只能有一個當上國王的，不會出現六千人紛紛稱王的局面，新的國王又將何以對待那六千個過去的競爭者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將是成年人的童話。講給孩子的童話都是教人以真善美的，成人的童話呢？

1996年1月11日

一幅畫前的兩種愛國心

——夜讀抄

列賓（Ilya Repin）青年時代的名畫《伏爾加河上的絳夫》（1871-1873），是我最早傾心的不朽傑作之一。就是這幅畫激發我在1947年寫了長詩《給伏爾加船夫》。後來每次面對這幅畫的哪怕是很小的照片複印件，也仍然感到一種震撼：在如此宏偉壯麗的大自然裏，人們本來應該過美好得多的生活啊！

早年學畫後來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孫越生在隨筆〈讀列賓《絳夫》一畫偶得〉中，引用了列賓《撫今追昔》關於此畫構思過程的自述，作了深刻的評論。

孫越生說這幅畫「哀而不傷的大手筆即使不能點燃良知熊熊的怒火，亦將引起心靈默默的同情」，又說這幅畫「為想像和理智留出了多麼寬廣的活動餘地，充滿了多少悲歌的含蓄，這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說中了我的感受。

而他說到有關《緯夫》一畫的命運的插曲則是我不知道的。

他說，《緯夫》留傳至今，已經沒有人再來否認這是列賓給俄羅斯民族帶來的巨大光榮了。但是，當時他卻受到形形色色的非難。在一個封建專制官僚帝國裏，這種非難並不奇怪。但奇怪的是，這幅名畫及其作者，卻受到一位俄國的愛國將軍，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參加者，國家公產部部長節列諾依·亞歷山大·阿列克賽維奇的反對。這位將軍看過這幅畫後，他的愛國心和主人翁態度使他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就在巴黎負責管理俄國留學生的鮑戈柳包夫教授的畫室裏，當着主人的面盛氣凌人地訓斥留學生列賓道：

是什麼魔鬼支使你畫這幅荒唐透頂的畫的？你準是波蘭人吧？……你怎麼不害臊，你原來是俄國人！豈不知我正在着手取消這種原始野蠻的運輸方式，要不了多久，準保沒有人會想到它。可是你卻畫這種畫，還拿它到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上去炫耀。我想，你這是打算找糊塗的富翁，希望他能買下這些大猩猩——我們穿樹皮鞋的鄉巴佬吧？亞列克賽·彼得羅

維奇，哪怕您多開導開導我們這些公費生先生也好，叫他們想想，他們既由政府供養，就應該多表現一點愛國心，不要把破爛的包腳布抖落出來送到萬國博覽會上對歐洲去宣揚。

孫越生在講完這段故事以後，說：「風物長宜放眼量。歷史已經對這位愛國將軍的愛國心和主人翁態度，和由這幅偉大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傑作所表現出來的愛國心和主人翁態度作了誰是誰非的判決。」最後，他問：「《絳夫》的命運及其教訓，難道不值得讀畫和評畫者深思嗎？」

此文作於 1981 年 6 月，距今已十五年了。收在《歷史的躊躇》（「金薔薇隨筆文叢」第二輯，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一書中。

抄書至此，忽然想起我們的詩人蔡其矯 1958 年春發表的《川江號子》一詩，寫的也正是川江上的船工，緊接着就遭到批判，批判文章引用了如下六句：

你那碎裂人心的呼號，
來自萬丈斷岩下，
來自飛箭般的船上；
你悲歌的回聲在震盪，
從懸岩到懸岩，
從漩渦到漩渦。

批判文章在「碎裂人心」和「悲歌」下加了着重號。那些強詞奪理的批判，看來只有入人以罪之心，恐怕與上個世紀那位俄國將軍式的「愛國心和主人翁態度」都是不相干的了，從略。

1996年4月1日

都是過客

從《大時代文摘》報上看到摘自 4 月 8 日《上海譯報》的一篇文章，標題不知是誰做的，叫〈歷史過客瓦文薩〉。

記得在文革中對「革命小將」的諄諄教誨中，有一句話是常說的，就是不要作曇花一現的、歷史上匆匆來去的過客。

從那時候起，總覺得「歷史過客」是個貶義詞，好像與「歷史的垃圾堆」只相隔一間了。

為什麼說瓦文薩（Lech Walesa，港譯華里沙）是「歷史過客」？他 1943 年生，1967 年入海港城市格但斯克船廠作電焊工。1970 年曾任車間罷工委員會成員，旋被逐出工會

並開除出廠，從此他專事工人運動。在 1980 年大罷工中，他領導成立了全波蘭的團結工會，有 1,000 萬人參加。1981 年末團結工會被取締，瓦文薩被捕坐牢一年。1989 年團結工會合法化，經議會選舉，出而組織政府。1990 年瓦文薩當選總統。1995 年他在總統大選中失利，1996 年 4 月 2 日回到格但斯克船廠重作電焊工。

當然是因為他「轉了一圈又回來」，沒能連選連任，成了「下台幹部」，而且當然斷定他不可能東山再起，而是從政治舞台「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名之曰歷史過客：惋惜耶？抑奚落耶？

然而如果蟬聯高位，例如做上終身的總統，就不是歷史過客了嗎？

李白有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們住的地球已有五十億到六十億年的歷史，光陰指日月，月亮雖稍年輕，太陽卻更久遠，尚且都只是天地間的過客，誰能永遠賴在「萬物之逆旅」裏當主東？

有一位曾與瓦文薩共事八年的老友說，瓦文薩很會「砸碎」東西，但他很不善於建設，而在新國家裏，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此說屬實，在這個意義上，瓦文薩做一個所謂「歷史過客」，或許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想開點：我們其實都是匆匆來去的過客……

1996 年 6 月 4 日

全斗煥盧泰愚功罪論

韓國在經濟上的長足發展，在亞洲在世界有目共睹，應該說先後曾任總統的全斗煥、盧泰愚與有功焉。他們在任時對外發展外交關係，對內進行政治改革，不能說沒有功績，包括他們和平移交權力的實踐，也有助於促進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然而，僅在 1980 年 5 月 18 日的光州事件中，當時作為軍方將領的全斗煥、盧泰愚派傘兵部隊前往光州鎮壓起義的學生，就造成二百餘人死亡的慘案。他們二人難辭其咎。此外還有貪污受賄的違法犯罪行為理應依法查處。

全斗煥、盧泰愚兩任前總統的功罪，以功為主？以罪為主？「三七開」耶？「四六開」耶？抑「倒三七」、「倒四六」耶？昔謂「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今則一千年太久，只爭朝夕，不過十幾年，韓國國會就在現任總統金泳三要求下通過一項特別法令，對光州事件重行調查並追究決策者全斗煥和盧泰愚的法律責任。又幾個月，在1986年8月26日，漢城地方法院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進行一審宣判，判處全斗煥死刑，盧泰愚二十二年半有期徒刑。

這一判決顯示的法治秩序符合民主法治的通則，令全世界矚目。這表明韓國已徹底擺脫東方專制主義「刑不上大夫」的歷史影響，成為現代法治國家；有功獎功，有罪治罪，功罪分明，不以什麼將功折罪為名而行包庇罪犯之實，使負罪者無論什麼身份都不能逍遙法外，這種公正性和正義性不但能在一時大快人心，大得人心，長遠看來又加強了法律的權威，大有利於國家社會的穩定和國民道德的提高。

金泳三在剛剛就任總統時曾經表示，為了韓國的團結，有關光州事件的是非最好留給歷史去評判，去作結論。後來他改變了這一態度。事實證明對全盧二人的大審並沒有破壞韓國的「團結」，而是如所報道的「舉國歡欣」。

不過，在韓國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反對黨認為，金泳三是在反對黨要求他說明是否曾在選舉中收受盧泰愚「贈金」的壓力下，借調查光州事件來轉移視線；金泳三在上次

大選中率領他的黨同盧泰愚的執政黨合併組成新黨，才打敗對手當選總統的，現在盧泰愚斂財貪污的事曝光，他需要同盧「劃清界限」，選擇光州事件採取動作，一不牽扯他，二可以從執政黨內把盧泰愚的勢力排擠出去，三則藉以提高自己的聲望，為明年大選爭取選票。這倒確是一石三鳥之計。

另一種不同的聲音來自韓國國會中一些前軍人出身的議員和一些軍方人士，他們的反應特別強烈。對此，金泳三表示，特別法將只對光州事件的主謀追究法律責任，而對具體執行的人員不予追究；網開一面，減緩了這方面的壓力和阻力。

從傳媒對上述情況的分析看來，金泳三的政治智慧足夠周旋。漢城審判的成功，也是金泳三的成功。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這一決策順應了歷史趨勢和社會良知。以金大中為領袖的反對黨儘管指責金泳三的動機，但對重新調查光州事件也是極表歡迎和支持的。

傳媒推測，金泳三出於要在 1997 年大選中取勝的政治需要，很可能在某一關鍵時刻會宣佈對全盧二人特赦減刑，使全斗煥免於一死。即使這樣，也絲毫無改於對全斗煥、盧泰愚二人的審判和一審判決所已形成的歷史意義、政治意義和法律意義了。

附帶說一下，在我們國內，對這件事也有不同意見發表。9 月 22 日《環球文萃》的「百姓談天下」欄刊出署名大齊的〈從重判前總統觀民風之淺薄〉一文。據說邱吉爾在

戰後落選時曾經慨歎，英國國民是忘恩負義的國民云云。我以為英國當年的選民不拿自己的選票送人情，不拿首相的職位做獎賞，對自己的公民權利負責，也對國務和歷史負責，是成熟的表現，何忘恩負義之有？邱吉爾的這一指責，情緒性超過理性，雖情有可原，卻大失風度。邱吉爾落選且不足據以指責英國選民，全斗煥、盧泰愚的受審判刑，韓國人由此感到快慰，又怎麼能成為韓國朝野上下「民風之淺薄」的論據呢？

論者說：「對前總統的否定就是對那個時代的否定，對前總統的審判就是對前政府的審判。筆者以為，不應該以今日之觀點強加給昨日之事之人，所謂法不約前是也。」又說：「望韓國政府能夠赦免兩位前任（總統）無罪，不以今日至清之律糾辦前朝權貴，網開一面仁和施政，所謂既往不咎是為了讓以前有罪之人能夠有機會體面地自我革新，濫用過猛之『藥』、暴絕之刑將迫使本可從新之人因畏罪而拼力抵抗，如此國無寧日可預，三思！」

這也許是論者大齊的「瞎操心」，似不致被韓國朋友目為「干涉別國內政」吧？《環球文萃》刊發此文時，編者注明「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報刊能夠發表「只代表作者的觀點」亦即不代表或不完全代表編者觀點的文字，「聊備一說」，這不能不說是在開放言路上的一大進步，讓人高興的。

1996年10月14日

逸事與醜聞

哪裏出了貪污受賄，叫腐敗，就是醜聞，只有攻守異路：攻之者要揭發曝光，守之者捂着蓋着包庇着，皆因這是公認的醜聞。

哪裏出了桃色新聞，或者叫做緋聞，就不一樣了。有的說是醜聞，有的說是逸事，所謂風流逸事：或者寬待古人，一樣的事，在古人是逸事，甚至是「韻事」，在今人則是醜聞；或者寬待死人，活着時傳為醜聞，死了以後時過境遷，定性也就變為韻事了。至於當今，在里巷小民算是醜聞的，到明星名人那裏，就成了齒頰生香的談資，小報暴炒的「要聞」了。

不是常常做中西文化的比較麼？

如果緋聞出在公職人員身上，就比較出異同來。

拿美國來說，我們都讀過馬克·吐溫《競選州長》那篇小說——對立面為了搞垮對手，收買了一群小野孩子，到競選會場上去「認爸爸」，使正在做競選州長演說的先生涉嫌為一群非婚生子之父，不勝尷尬之至——此文多年被我們選入中學課本，固然是為證明美國政治的「假民主」，競選導致亂成一鍋粥，可也從一個側面表明，要贏得那裏的選票，不能不多加檢點，保持良好的公眾形象。可見在那裏，輿論一般嚴於官而寬於民。

在我們這裏，一旦發生緋聞或醜聞，不但官民有別，官大官小也不一樣，一首至少流傳了十幾二十年的新民謠說，同樣性質的事情，大領導是「業餘活動」，小領導是「作風不正」，一般幹部可就叫「流氓成性」了；處理時，有的去「休養」，有的去「（勞動）教養」，也算「區別對待」嘛。

這是中外之異；而當官的幹這些勾當時，諱莫如深，強化保密，被揭出來，又不免掩蓋和抵賴，大家從克林頓事件中已經看到，其實不讓克林頓專美，這一點倒是東西相同的。不同的是克林頓的這些事情沒有當作隱私，相反弄得個滿「城」風雨，沸沸揚揚，不像我們對陳希同的「生活糜爛，道德敗壞」只一筆帶過，不去滿足窺視欲的低級趣味，不讓那些骯髒東西污染視聽，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有人說，美國可以把在位的克林頓的不軌行為拿來示眾，而此間陳希同這方面的問題，不過是拔出蘿蔔帶出泥。這是不懂得中國一向主張抓主要矛盾，如果只曝光陳希同的「糜爛」，不是分散注意，轉移視線，因小失大了嗎？況且，只要注意我們的傳媒，就會發現近日也不斷有涉及負責官員「男女關係」的案件公諸報端，但不像克林頓案那麼「單打一」罷了。

舉四川射洪縣副縣長唐興東的例子。他於1997年任縣財政局長時，與下崗女工李雪紅「建立戀愛關係並與妻子離婚」，雖說也有一段婚外戀的情節，不過經過法律手續辦了離婚，如果到此為止，也就只剩情夫情婦兩人的事了。但因唐興東的父母反對此事，那個「新歡」李女士對唐的母親大打出手，新升官的唐副縣長也趕來助陣，把母親推倒在地，他父親的無名指關節也被打錯位了，事情才複雜起來。二老向法院起訴以後，1998年12月18日，射洪縣法院判決被告人李雪紅賠償醫療費、護理費、傷殘鑒定費等共4,000元。這天中午，唐副縣長帶着「社會閒雜人員」衝進審判長范光榮家，對他拳打腳踢，還拿起菜刀揚言要砍死審判長，被趕來的民警制止。這則新聞，以準「緋聞」始，而以暴力相向終。

另一個例子是河南駐馬店市的女副市長陳桂玲，仕途一帆風順，原是遂平縣人民銀行的一個科長，提為副行長後，1996年又升為行長；相隔兩年，於1998年3月，到駐

馬店走馬上任為科技副市長。就在這一年夏季離了婚。在今年1月5日、6日之間，她舉槍打死了時任河南省工商銀行國際業務部主任的劉銘鼎，然後自殺。據警方稱，此案已基本調查清楚，屬於情殺。這也已從一般「緋聞」升級為人命案，不是克林頓式的偷情可比了。

前一個案例，更帶中國宗法社會的色彩；後一個案例，粗看好像帶點「殉情」的味道，但稍加尋味，這決不是當代中國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倒像是顧城殺妻的翻版。也許夾雜着更多的世俗因素。不過可以看出，這位36歲的女副市長，手段與市井愚昧婦人無異，大不類政治人物所為，也許是涉足官場還嫌不深吧。

從這兩例，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的哪些異同，還是留給專家們去研討的好。

但這一個副市長，一個副縣長，死了的，活着的，都不會像克林頓那樣，一邊像犯了錯的孩子等着挨罵，一邊還繼續保持居高不下的支持率。真是中國的群眾太「勢利」，誰出了事都只供別人「瞧好看」麼？有人分析，那些支持克林頓的美國的「群眾」，據說也是只看到克林頓帶來的經濟好處，因此同樣難逃什麼「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之譏云云。不過，話說回來了，克林頓在「花案」之外，好歹是有政績的，那兩人除了搞婚外戀，還做了什麼有益於人民的事嗎？

1999年1月15日

老皮真逗

我對政治人物從不稱「老」稱「公」，何況是毫不相干的外國人，更何況是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這樣有血債的「智利前領導人」。

這回破例，但不稱皮老，而稱老皮，不是為示親切，從俗簡化而已。

此人政績即劣跡眾所周知。在英國被押，一副老病纏身快死的模樣，竟弄到了病情證明，得以逃脫解往西班牙受審的危機，飛回智利。一下飛機就扔掉輪椅，不再裝病，可謂得意忘形矣。

智利高等法院現已做出剝奪皮諾切特終身參議員豁免權的裁決。據說「皮諾切特在不得不面臨起訴和審判的情況下，一改往日深居簡出的做法，頻繁露面，意在儘量爭取民心」。

玩出什麼新花樣？9月4日，他在妻子陪同下，在首都聖地牙哥由他的孫女宣讀了一份告白書，呼籲「全體智利人民團結起來，忘記過去，放眼未來」云云。

老政客不忘打官腔，叫人們「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幹什麼，不是清算他的禍國殃民的舊債，而是「忘記過去」，一筆勾銷。

好一個如意算盤。你說逗不逗？天津話說：眼不眼？

誰最愛聽「忘記過去」這句話？老皮若起草倡議「忘記過去」的宣言，徵集簽名，蘇哈托（Suharto）準會頭一個聯署，敝國那些已經落網的和逍遙法外的，顯性的和隱性的刑事犯都會樂於大力聲援，為「忘記過去」運動推波助瀾。

2000年9月30日

小議「跟屁蟲」

偶然發現一家報紙的國際版上開闢一小專欄，叫「國際打油」。

這一天專欄的詩配畫，題為《跟屁蟲》，詩云：

總統小布什，首相布萊爾。兩布成搭檔，一唱一個和。你要滅拉登，我咒他早死。你炸阿富汗，我喜做陪客。你反薩達姆，我說不宜遲。你做霸王夢，我在床邊樂。小英跟大美，忠心最了得。甘當跟屁蟲，欣然無愧色。

這位詩人謙稱「打油」，原來說的都是世界上頭等大事。大約從文革結束以後，中國不準備再當世界革命中心，

特別是 1989 年後強調中國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來，國內傳媒對國際問題的表態都是很謹慎的，久矣夫不見對別國領導人的嬉笑怒罵了。而這首國際題材的「詩」，獨樹一幟，表了中國政府不曾表過的態。

詩人把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港譯貝理雅）關於拉登等的對策與布什（George W. Bush，港譯布殊）總統執行的美國政策相一致，諷為「跟屁蟲」，顯然是以為應該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正理——因為，按詩人的看法，美國從「九·一一」以來的反恐怖主義行動，海灣戰爭對薩達姆的打擊，都是其「霸權主義」的表現，俺們在三十年前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急先鋒，於此豈能後人？

國際社會在某些問題上達成雙邊或多邊的一致，或基於利害，或基於道義，不一定意味着必然是小國、弱國對大國、強國的「忠心最了得」的結果，那樣也太看不起有國格、有骨氣的小國和弱國了。這也許是詩人囿於自己的經驗，以為「保持一致」只能是誰「忠」於誰的問題。

但不管你怎麼看，人家英國首相布萊爾代表英國政府在國際上舉足重輕的問題上，有自己的既定方針，是你這個打油詩人所奈何不得的。布萊爾雖貴為首相，按英國的政治體制，並不是能夠自說自話，自行其是的，他要對女王負責，也要對議會負責，對英國人民負責，英國和英國人民什麼時候成為「小英」了？詩人不覺得自己太把自己看「大」了嗎？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懂得尊重各國人民，無論這個國家的大小強弱或你個別人眼裏的「小」或「弱」，你沒有理由無端指責別國，甚至把你的想法強加於人。你說布萊爾是「你要滅拉登，我咒他早死」不對，怎麼才好？必得「你要滅拉登，我祝他長壽」？

我先是以為此打油作者乃是繼承並發揚「中國可以說『不』」的一脈傳統，回過頭看看詩前小序，說，「『九·一一』事件後，英國首相布萊爾緊跟美國『走四方』，鞍前馬後，特別賣力。近日國內輿論嘲諷他是美國的一隻『跟屁蟲』，布萊爾對此說不屑一顧」云云。原來如此，所謂「跟屁蟲」之說，並不是作者的創意，不過是英國國內的一種輿論吧，我想，英國不是「輿論一律」的國度，相信其國內不會只有這一種輿論，而且這種輿論也不會多麼強烈，所以布萊爾可以「對此說不屑一顧」。只有在遙遠的中國國內有這麼一位詩人，不但對此說「一顧」，而且把它敷衍成一首「國際打油」了。

詩人把布萊爾以至英國決策層叫做美國政策的「跟屁蟲」，或者可以說他有這個自由吧，但切記，「辱罵與恐嚇不是戰鬥」，不然的話，應該把你叫成誰的什麼呢？

而按照一般的禮節，在這裏還是把這首「國際打油」的作者尊稱為「詩人」的。

2002年5月4日

斯大林格勒站

巴黎每個地鐵站裏，都用特大字在牆上寫着站名。我頭一次乘五號線，一進站就唸出：「Stalingrad」，這不是「斯大林格勒」嗎？

斯大林格勒：久違了。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問題後，不記得在哪一年，就把伏爾加河畔這座名城改稱伏爾加格勒了。在那同時，什麼斯大林諾¹、斯大林納巴德等等都改了新名或恢復原名，塔吉克斯坦首府就從斯大林納巴

1 自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問題後，批評逐步加深，當時的蘇聯和東歐社會掀起了一股去斯大林化運動，不少街道城市因此易名。斯大林諾（Stalino）為蘇聯加盟共和國時期的工業城市，1961年更名為頓內次克（Donetsk）至今，為烏克蘭第五大城市。

德改回「杜尚別」(Dushanbe)——在當地語言裏叫了多少年的：三棵樹。

這個巴黎地鐵站，不知是什麼時候以斯大林格勒命名的。我想當是在二戰之後。

二戰中，從 1942 年冬天到 1943 年初，在伏爾加河西岸冰天雪地裏慘烈的斯大林格勒戰役，肯定是希特拉的德國軍隊當時遭到的最大一次失敗。整個 10 月份，俄國人在巷戰中利用斷壁殘垣，頑強防守，捍衛每一寸焦土廢墟。直到轉過年來，在蘇聯五千門大炮的狂轟猛炸下，雙方在城內瓦礫成堆、遍地冰凍的廢墟上，展開最後肉搏式的爭奪。一時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着斯大林格勒；正是在這裏，不但粉碎了希特拉控制伏爾加河、掠奪高加索石油的迷夢，而且就此擋住了他們東進的腳步。

構成這次戰役結局的，有希特拉狂妄、愚蠢和偏執造成的多次失策，更有蘇聯 150 萬大軍和斯大林格勒成百萬居民的英勇戰鬥和犧牲。

十五年後，我從蘇聯帶回一塊斯大林格勒的彈片，久埋在浸血的泥土裏已經生鏽，不能辨認炮彈原來屬於哪方了。當時寫過幾句感想：

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
多少淚，多少汗，多少鮮血！

多少次忍痛生離死別，
多少人悲壯地告別世界。

歡樂的回憶，純真的願望，
幼稚的過錯，懊悔和原諒……
對多少人這一切都不復存在，
都已經在浴血的土地上埋葬。

即使你今天還很年輕，
即使你沒有經歷過戰爭，
這一塊斯大林格勒生鏽的彈片
不能不使你想起很多事情。

斯大林格勒戰役時我已經 10 歲，生活在日本佔領軍統治下，那時候淪陷區報紙按照日文裏漢字譯法，把那血戰中的城市稱作「史達林格勒」。我從片言隻語想像着那裏的巷戰，為爭奪每一幢房屋的生死角逐，直到我無法想像下去。

生活在納粹佔領下的巴黎人，從成年人到孩子，一定也像我一樣，對幾千里外那座激戰中的城市不再感到陌生了。

我想可能正是這個緣故，在巴黎解放以後，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大約就在把凱旋門周圍命名為戴高樂廣場的同時或稍後，分別給地鐵作了羅斯福站、斯大林格勒站這樣一些命名，多半是為了保存一段關於二戰的記憶。作為歷史的紀念，沒有像對羅斯福那樣用另一「巨頭」斯大林之名，

單取了歐戰東方轉捩點的斯大林格勒之名，不能不說表現了法國人的睿智和分寸感。

我讀到的寫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文學作品，不如寫列寧格勒保衛戰的多。最早是蘇聯隨軍記者、詩人、作家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蘇聯外文局出版的中文譯本。透過薩巴羅夫少尉和護士安孃的戰場愛情，我們多少體驗了硝煙火網短兵相接的斯大林格勒的氣氛。

另一部通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九十九個晝夜，表現了人們爭取自由、反抗奴役意志的長篇小說，是蘇聯作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戰後寫的《生存與命運》，在作者生前被禁，1988年才在蘇聯國內出版，我看到的是90年代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中譯本。

書中寫到了1943年1、2月間，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時下了一場大雪。那雪「覆蓋了如網般縱橫交錯的戰時的道路，覆蓋了硝煙和污泥……積雪下沉睡着強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這不是雪，而是時間本身：潔白而又柔軟的時間一層層地沉積在鏖戰的城市的廢墟之上。現在一切正在變為過去，在這場緩緩飛舞的大雪中看不見未來。」

永遠過去了的過去，有什麼永恆的東西留給未來？

我們今天生活着的世界和歲月，不就是六十年前生者和死者的未來麼？

巴黎地鐵的斯大林格勒站，有三條線路在此交叉，我每次經過這裏，都要想起世界歷史上那一重大的戰役。

格羅斯曼在《生存與命運》中寫道：

世界名城的特色在於它們的靈魂，「戰爭之城」斯大林格勒也有自己的靈魂，這靈魂便是「自由」。

也許正是這城市在戰火中錘煉的自由的靈魂，讓愛自由的法國人長久地銘記着她吧。

斯大林來了又去了。斯大林格勒在與專制迷信決裂的日子裏，擺脫掉加在它身上幾十年的名字，但也沒恢復「察里津」的舊名，而是以它依傍伏爾加河的地理位置，謙遜又自豪地以伏爾加格勒命名了。

巴黎地鐵的斯大林格勒站，本來的命名就與斯大林其人無關，自也無須跟風改動。巴黎的地鐵站，地面上的大街小巷，不少是以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命名，讓人恍若穿行在歷史中。

歷史，像地鐵列車那樣一節節地漸行漸遠，但不斷遠去的歷史，有時又彷彿離我們很近。

2002年8月1日

國會大廈

塞納河左岸的國會大廈，是二百年前的波旁宮，路易十四的女兒波旁公爵夫人的府邸，她的情人拉塞侯爵就在相鄰處修建了私家豪宅。人事有變異，往來成古今，還在法國大革命前，就由另一位親王把這兩處房產並為一座了。「請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後來歸了公，據說拿破崙還曾過問這座歸了公的改建過的波旁宮的外裝修呢。

拿破崙的墓葬就在波旁宮西南，滿巴黎登高一望準能看到的鎊金圓頂的榮軍院；另一邊不遠有羅丹美術館，就位於

1730 年建成的一處私人園林。這三處，叫名勝也好，叫古跡也好，恰成一個三角形。

走上波旁宮高高的台階，十二根矗立的圓柱守護着氣勢恢宏的門廊，間隔着並列五座宮門。要深入進去，才到達議會大廳，半球形圓頂，據說是由舊日接待廳改建。我想，當年波旁公爵夫人和拉塞侯爵幽會，顯然用不着這麼大的空間。有回聲嗡嗡的廳堂絕對不適用於夜半的私語。而一百年前中國學者、黎庶昌寫的〈法國議政院〉文中描寫的，大概才是這裏典型的光景。

手邊沒有黎作《西洋雜誌》，但在友人書架上看到《雜文作坊》，裏面有我讀黎書後寫的雜詩並有注。

其一是：

嘈雜人聲辯若狂，宣言宗派聽鈴鐺。
朝來定議夕退位，民情國事兩無傷。

黎庶昌〈法國議政院〉文中所記若是。〈伯理璽天德辭位〉文敘法國總統馬克蒙無議會多數支持，被迫辭職；「朝定議，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聞也者。」

這是說，議會有權決定總統的去留；在法治而非人治的國度，哪怕是總統易人，也不致引起社會的動盪，國家事務照常進行。

其二是：

西洋雜誌志西洋，萬里來觀議事堂。

獨斷獨行今已矣，改弦頗思得更張。

黎庶昌著《西洋雜誌》，於西方政制民俗，以及物質精神文明，多所介紹。又其《答曾侯書》謂：「中國君主專制之國，有事則主上獨任其憂，臣下不與其禍。」〈俄皇遇刺〉文中對亞力山大二世「事皆獨斷專行，又不設立議院，民情不能上達」頗感不滿。

黎庶昌是晚清末世的清醒者，放洋觀光，於別國先進是個有心人；但他畢竟屬體制中人，讚賞議會制，也着眼於民情可以上達，使君主得以兼聽，更使民眾為國——實則是為君主分憂，仍在君主立憲窠臼中。正如康有為主張由上而下的改革，以避免重蹈法國王室被革命推翻的覆轍，都是為「聖上」設想。這是他有所局限的地方，但他能看到議會制容納不同意見，有利於比較選擇，終究勝過盲目固持大權獨攬的權力者一籌。他在當時能公然宣揚西洋的政治文化，沒有視為夷狄之學或資產階級一套一筆抹殺，是他的開明；而他卻未因此受到追究查處，也還由於那時全國浸潤於一片求變的氣氛，先有開明的官員辦洋務，繼有相對開明的光緒皇帝支持維新，「戊戌變法」雖被堅持專制的慈禧太后血腥鎮

壓，但慈禧隨後也不得不保留若干維新措施；最後，君主立憲的方案千呼萬喚終於出來，可惜太晚了，沒能起到由此讓步而抵銷革命的作用。大清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皇朝在辛亥革命的衝擊下顛覆了，黎庶昌等一兩代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們的著作，也就成了近代思想史的檔案材料。

每逢讀史，我常常不免有生當明末或清末的感覺。站在中國的先進者一百年前曾經來觀禮的法國議會門前，忽然想起黎庶昌那遠去的聲音，不是歷久彌新，猶如在耳邊麼？

示眾台

巴黎市政廳不遠，是有八百年歷史的中央菜場。菜場北邊一個十字路口，據導遊小冊子說，那兒有個不注意就會忽略的，遠沒有宮殿、古堡、教堂那麼身價高貴，但又不能不叫古跡的，「示眾台」。

但友人告訴我，示眾台今已無存，當初是無意遺留下來還是有意保存的，後來的拆毀又是無意抑或有意，如是有意，意在什麼，是誰決定的，不知有沒有史料可考。我自己國內的事情尚考不清，哪還管得了別國的事？

然而久久不能去懷。遙想 14 世紀這座示眾台初起時，菜場每周開市三天，商販雲集，肉菜滿攤，四面八方的顧客往來，有時就在必經的路口，駐足而觀，那示眾台上押來了小偷、騙子、妓女們，任大家往他們身上拋垃圾、扔石塊以羞辱之。

那時候，有沒有人不以為然？一個時代的風尚，就是不成文法，尤其是以為「從來就如此的」。《聖經》裏耶穌那個時代，不是就流行往所謂通姦者或其他「不道德」的人身上擲石頭麼？

羞辱以至虐待「公認的」不道德者，就最足以顯示自己的道德了吧，可不是從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嗎。

這個古老的風俗習慣，或說是「法外之法」的「刑外之刑」，不知在法國持續到什麼年代，具體地說，像這樣一座處於市中心的示眾台，延續到什麼年代才停止使用？

不過，我看，一直到 18 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中使用率達到最高的斷頭台，可比小小的示眾台厲害多了，它同樣召引人眾來圍觀，收示眾之效，但早已不是為了羞辱當事人，以儆效尤，而是為了鎮壓異己，威懾整個社會。

這座示眾台既是位於聖厄斯塔許十字路口，就與聖厄斯塔許教堂為鄰。兩者同樣可稱古跡。這座始建於 16 世紀

的規模僅次於聖母院的老教堂，流傳下來的卻都是可以引為榮耀的佳話，單說文藝方面的，劇作家莫里哀在此受洗，詩人拉方丹在此舉行葬禮，作曲家柏遼茲在此欣賞了由 950 名音樂家演出他的大作《感恩贊》，鋼琴家李斯特在此首演《大彌撒曲》。這一切都同法蘭西以至全人類的文明相關聯。

而示眾台展示的既是社會底層的陰暗面，又是對待這種陰暗面「以不道德對不道德」、「以非法對非法」的不文明表現。以羞辱別人人格為得意者，什麼時候能認識到這也是可恥的呢？

也許只有讓兩者並存，而不以前者掩蓋後者，才是一種磊落一種豁達。

中文譯作「示眾」，如果的確傳達了法語中的原意，那末，我想，中國之有「示眾」的歷史恐怕要比法國悠久得多，遠的不說，上個世紀 50 年代到 70 年代，歷次政治運動以至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到處響徹「把某某某揪上台來」的嘶喊麼？1966 年 6 月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不是就搭起什麼「捉鬼台」麼，捉的是鬼，自己便是人或神了，鬥的是反革命，自己便是革命之化身了，這樣的台是批判台，鬥爭台，是「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場，豈是小小的巴黎古「示眾台」可比乎！

1966 至 1967 年參加過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周揚等人的萬人大會，對那一長串批鬥對象包括所謂陪鬥的人，是批判，也是示眾；長安街上過卡車，彭德懷元帥被押沿街示眾，示眾也是批鬥；後來除了秘密處決以外，流行公審公判，無不有示眾的意味。一時間，神州赤縣，到處在遊街示眾，到處揪上台示眾，劉少奇主席在中南海自家院裏挨鬥，沒有另外搭台，站在台階上，那台階也是示眾台了。

至今 960 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沒留下一處古代的、近代的、現代的示眾台，因為處處曾是示眾台，處處可充示眾台，也就沒有特定意義的示眾台了。不須單獨建立文革博物館，或許也是同理，讓過來人指認，哪一寸土地沒有留下過文革的創痕？

中國人歷來有毀壞真古跡、製造假古董的毛病，誰知道千百年後會不會重建什麼文革「示眾台」，甚至仿古仿洋複製出西方古籍中所有而實地所無的「恥辱柱」來。

吃什麼好

「如此炎炎的只是為了麵包與自由。」

在法國大革命前夕，1788年歉收，各種食品特別是麵包供應不足，價格昂貴。1789年7月巴黎市民攻陷了巴士底獄的武器庫之後，10月，怒氣沖沖的市民又前往凡爾賽宮，抗議麵包漲價；據說路易十六的瑪麗·安東尼王后（Marie Antoinette）建議他們：「那就改吃奶油雞蛋卷吧！」

這一下讓我想起晉惠帝，時難年荒，許多農田顆粒無收，災鴻遍野，報到這位皇帝跟前，他說得倒輕巧：「何不食肉糜（幹嘛不喝肉末粥）？」

時隔千百年，地距千萬里，聲口竟這樣相似。

糧食不夠吃了，吃什麼好？1958年大躍進前，我在農村吃過兩種代食品，一種叫「黃菜盤子」，是鹽鹼地上一種野生植物的籽粒磨成的，一種是所謂蘿蔔條，東北糖廠榨甜菜的下腳料，成麻袋地運來，打開包就已經餿了。1959至1960年，大躍進的惡果已經突現，正式提出「瓜菜代」的口號，瓜菜也不夠，我們奉命去打樹葉，以製造「葉綠素」，混進麵食糊弄肚子……這時聽到了「最高指示」：「忙時吃乾，閒時吃稀」，這是傳統農村應付青黃不接、饗飧不繼的老法子，顯然是「生於深宮之中，養於婦人之手」的晉惠帝、路易十六王后者流所沒有的見識。

後來，「忙時吃乾，閒時吃稀」也辦不到了。直接死於饑餓或由饑餓、營養不良導致的病痛和虛弱的，以千萬計。從歷年人口狀況包括出生、死亡統計數字的正常規律計算，所謂「自然災害」而從全國來說實為風調雨順的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達到3,000萬至4,000萬人之譜。當局沒有正式公佈過有關數字。

我身邊沒有死人，但我發現許多「身大力不虧」的，反比體弱多病者先患了浮腫。原來因為他們體力消耗大，需要熱量大，半饑半飽的後果就最早在他們身上顯現出來了。由此，我揣測在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裏，不但有大量老弱病殘和嬰幼兒，也會有相當數量的青壯年主要勞動力。

畫中人

羅浮宮裏有一幅名畫《1804年12月2日拿破崙大帝的加冕儀式》，是事過兩三年後（1806–1807）畫家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作品。看這幅畫其實不必去羅浮宮，許多畫冊都有的。

算得上重大歷史事件，該是紀實性的。畫中有一位老太太，定定地注視着拿破崙急不可待地取過皇冠，正待給自己頭上戴去。這位老太太就是拿破崙的母親。紅色的風帽，紅緞寬領的對襟素色外袍，表情凝肅，不知心裏怎麼想的。

然而，實際上，加冕那一天，拿破崙的母親還呆在科西嘉島家裏沒來。不知是登基稱帝的兒子沒有請她，還是老人家不想來湊熱鬧。

大衛自己的創意，抑或受命而為？已無可考。

這是往畫裏添人。

也有從畫裏減員的，那就是1950年畫家董希文的《開國大典》，與毛澤東、周恩來同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軍民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及高崗。

1955年中共中央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不久，高崗自殺，於是《開國大典》作者便將畫中的高崗抹去，在那個位置上畫上一個花籃。

也有不添人也不減人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新華社發照片，為了按新的政治局排序配齊人頭，據說由熊復決定，圖片部做了些手腳，是把鄧小平的頭像剪接到陳毅身上，還是把陳毅頭像剪接到鄧小平身上，記不清了。按行話說叫「技術處理」，按文革小報的話就叫「換頭」了。

此類事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人民畫報》的紀念專號裏，發表當時黨和政府領導人守靈的照片，因發

稿時已在 10 月 6 日揪出「四人幫」後，照片中的「王、張、江、姚」（按實權大小的順序應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原來的實際站立之處，變成空檔，四個權傾一時的人物真的「蒸發」，煙消雲散，連個鬼影也沒留下。

想到有人說過：「當代無史」，信是見道之言，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西，概莫能外。

一樣的廣場

羅馬有個威尼斯宮，沒有列入我們這次參觀的景點。年輕的導遊只是遠遠一指，說那個二樓的陽台就是有名的墨索里尼陽台。

墨索里尼在那個陽台上「表演」過無數次演講，說是表演一點也不錯，他用心總結經驗說，個別談話要親切，群眾場合要煽情。想見他當年站在這陽台上，面對成千上萬向他狂呼「法西斯萬歲」的黨徒，自我感覺是當代的凱撒，何等的不可一世。

墨索里尼是靠煽情、蠱惑、欺騙起家的。1919年，他在米蘭組織了有一百五十人參加的「戰鬥的法西斯黨」，提出取代「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是：「信仰、服從、戰鬥」！

信仰什麼？服從什麼？為什麼而戰鬥？

墨索里尼說：

19世紀，人人口中無不說民主。現在的口號應當恢復古來的理想，改為「以少數賢明之人治國」。……歐洲再向民主方面走，是愈走愈糟；只有革命可以救國。

他說的革命，就是反民主之道而行之，就是法西斯專政。

當時意大利有國會，實行代議制民主。墨索里尼的黨徒施展流氓手段威脅選民：「誰不投黑衫黨的票，重者致命報復，輕者一杯蓖麻子油！」就這樣，從1919年的四千張選票，一躍而為1921年的十七萬八千張選票；隨後，法西斯黨的武裝黨徒即達五十萬人，普通黨員一百萬人，他們控制和操縱的工會等社團二百五十萬人。國會中的法西斯黨團，佔了五百三十五席中的三十五席，他們已經感到不滿足了。

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率領十萬人向羅馬進軍，迫使內閣辭職，他當上政府首腦，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專政；比1933年上台的德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工黨）黨魁希特拉早十年，可以叫法西斯主義的「祖師爺」了。

墨索里尼一上台，立即禁止遊行示威，叫喊把「誹謗」法西斯主義的人「釘在牆上」。接着，公佈法令，除了法西斯黨團以外，所有的政黨和政治團體都予取締，「一切權力歸於法西斯」，墨索里尼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還不算，進一步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在取消工會同時，成立法西斯工團，把資本家和工人、勞心的和勞力的，全納入這個組織的領導下，為法西斯國家從事物質生產。它要求，「在法西斯國家中，每個市民不再是一個自私的、反社會的、反集團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國家的模範公民（？馴服工具！）。」¹

大約在 1926 年底，墨索里尼不但「革命」成功了，他在內政上的各項「改革」也成功了，這年 11 月他頒佈《緊急法》，標誌着國內法西斯化已經完成。

墨索里尼在接受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採訪時，志得意滿地說：「我來到這兒就不想走了，不打算走了，打算盡可能久地留在這兒。」他說起他所崇拜的德國「鐵血宰相」俾

1 這裏採用的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語言，而在墨索里尼對他的女婿齊亞諾（Galeazzo Ciano）的私房話，可就直截了當得多：「意大利民族是一群綿羊。十八年也改變不了他們……我們要叫他們循規蹈矩，從早到晚穿着軍裝。打他們，打他們。……要使一個民族偉大，必須把他們送去作戰，甚至你非臭罵他們一頓不可。我就是要這樣做。」（《齊亞諾日記》，轉引自解力夫《專制魔王——墨索里尼》，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斯麥，藉以夫子自道：「對獨裁者來說，長期掌握政權是極其重要的。」²

墨索里尼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為了轉移對國內危機的注意，也為了他建立新羅馬帝國的狂妄目標，他又在國際上尋找同夥，尋找支持。他在指揮意大利軍隊單獨入侵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其後改稱埃塞俄比亞，Ethiopia）以外，又夥同德國納粹希特拉一起武裝干涉西班牙。此後，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就成為生死搭檔，墨索里尼管希特拉叫「元首」，希特拉管墨索里尼叫「領袖」。他們在二戰中雖有利益矛盾，卻在總體上互相響應、互相支持的一系列戰爭罪行，是人們所熟悉的了。

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就在這個威尼斯廣場的陽台上，發佈了追隨希特拉參戰的宣言。他歇斯底里地叫喊：

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將把我們牢牢地聯繫在一起，這句話正紮根在德國人的心裏，他們已經飛着，在天空，準備從阿爾卑斯山一掃到印度洋，那就是：征服吧！

廣場上的法西斯黨徒照例狂熱地鼓掌、歡呼、跳躍、嘶喊。

2 轉引自解力夫《專制魔王——墨索里尼》。

將近五年以後，1945年4月28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出逃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被意大利邊境一支遊擊隊處決。他們的屍體被裝上卡車，運到米蘭，拋到廣場上。米蘭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發迹的地方，但此時在這個廣場上，已沒有向他歡呼的萬頭攢動，只有滿懷復仇的憤懣的人群，先把他們的屍體吊在路燈杆子上，又放下來扔到路旁陰溝裏，也有的說是一家咖啡館門前，陳屍，踐踏。

羅馬的廣場，米蘭的廣場，一樣的廣場，今天，一樣是人們在悠閒漫步，鴿子在從容覓食……卻寫下了法西斯狂人墨索里尼的生平始末。

那遙遠的磨坊

你知道我為什麼忽然想起那遙遠的磨坊嗎？

那磨坊在德國的波茨坦，現在有許多中國遊客去過，知道那是二戰勝利前夕通過《波茨坦宣言》的地方，宣言確定了中國在戰後的權益，至今常常被引用；人們想必還都逛了 18 世紀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建的無憂宮，捎帶着無憂宮前不遠的一座老磨坊。

磨坊的故事說來也簡單，19 世紀時，威廉一世（William I）繼承這座宮殿以後，發現前面那個磨坊礙他的眼，傳話給磨坊主人，打算花錢買下來；不料（首先該是國王不料，

而我們熟知君主脾氣的中國人自然也不料)那磨坊主不幹(似乎不是售價沒談妥，而是壓根兒就不想賣)，惹惱了國王，強行拆除。不料(也該是國王不料，同時我們現代中國人也依然不料，「太出格了」)那磨坊主竟把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又是不料(反正我是不料，不知威廉一世料到否)法庭依法判決威廉一世把那磨坊重建起來，並賠償磨坊主的損失。最後一個不料(光剩下我不料了)，是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竟服從法庭所判，且稱讚法官的公正和膽識，說「此吾國最可喜之事也」。在我們這裏要「戲說」才有的情節，一百多年前在他們那兒發生了；按我們的習慣，是批判這國王故做姿態，就跟批判某國某國搞「假民主」似的；其實掉過頭來想想，做個姿態也好嘛，看他做的是什麼姿態，「假民主」未必就比真專制還殘酷？如果一直把「姿態」做下去，不是就弄假成真了嗎？試想，倘若威廉一世他一抹臉，沒等磨坊主告狀，先就把人抓起來，或在訴訟過程中給法庭打個「招呼」，判那倒楣的原告一個「不予支持」，乃至「破壞秩序」什麼的，至少「妨礙執行公務」的罪名就很現成；再如果法庭竟敢違旨，那就把法庭整個換班，把法官、磨坊主，還有辯護律師(如果有的話)通通抓起來，一個也不能少！那不也是一種「姿態」嗎？

這後一種姿態，並不是我僅僅按「自己」的經驗設想的。威廉一世是誰？是難得的聞過就改，又懂得以法治國的

「明君」嗎？請注意，他就是打了一場普法戰爭，從外部引起巴黎公社起義的那一位普魯士國王。

就是這麼一個傢伙！我由那遙遠的老磨坊想起了他。

對，你猜得不錯，我是因為不斷地不斷地聽到看到看到聽到，近年來中國大地上，「地產熱」和「城市化」熱當中，普通的城鄉居民遭到強制拆遷，不但身外的產權得不到保障，甚至挨打挨轟，連起碼的人身權利也橫遭侵犯，且不少地方法院都不受理，應了訴告無門那句古話。

難道我們這裏的房地產公司開發商及其下屬人員，政府相應職權部門直到最基層拆遷辦公室工作人員，竟還不如一百多年前反動普魯士的國王威廉一世遵守法律，從而表現得通情達理嗎？

我已經兜出了這個國王的老底，沒有替他塗脂抹粉的意思；也不是說外國例如德國的月亮比我們中國的圓；不，圓過一次不等於老圓，過去圓過也不是後來就一定還圓。這就是了。威廉一世之後，不到一百年，德國換了希特拉執政，他把條約當成了騙人的廢紙，他指使法庭公然製造冤案，他視人民生命如糞土……在他惡魔的一生中，你再也找不出像威廉一世和磨坊這樣的佳話。

我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吃驚：原來歷史是會倒退的，人類社會是會倒退的，倒退一百年，甚至更多。而我從小受

的教育：未來永遠是美好的，一切都會一天比一天好，人類也會一代比一代強。說到底，還是「進化論」的影響。

但是，魯迅先生其實早在 1927 年，就告訴我們，他頭腦裏的進化論是怎樣被現實給打碎的。他原來以為，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好，不幸的是，在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後，他在廣州親眼看見，「投書告密」、「助官捕人」的，竟大抵都是青年！

我曾經以為，魯迅的書我不止讀過一遍，魯迅這從鮮血得出的教訓，我也幾乎能夠背誦了。然而，事實上是我心目中還深埋着以為青年一定就好過老年的……不說是偏見，也有其片面性吧。由於我親身經歷了直到 70 年代末的各次政治運動，飽覽了運動中暴露的人性陰暗面，以致我對經歷過這些「風雨」和「世面」的幾代人，似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儘管我也看到不少堅守人性的善良，道德的底線，以至堪稱「民族脊梁」「純粹的人」的典範。因此，我曾以為，等到我們的社會中堅、精英人物多數是沒有經過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既沒有整人的經驗也沒有挨整的教訓的一代人時，他們的靈魂不曾被強大的外力——物質和精神兩重暴力——所扭曲，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中國的面貌就會一天天好起來。我真誠地這樣期待過，這樣祈願過。但是，我終於發現，我的頭腦過於簡單了，我的希望是虛妄的；我如果還有一點所謂思維能力，也不夠分析中國當前的各種現象的。

雖這麼說，大家不要為我擔心，我只是發現自己樂觀過了頭，而我還沒有絕望。魯迅轉述的西哲之言，早就告誡我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戒絕絕望，刪除幻想，切切實實地面對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實事。

話扯遠了，我喜歡磨坊這個形象，法國 19 世紀作家都德（《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的作者）寫過《磨坊文札》，也是我喜歡的一本書。我現在所住的社區原屬一個「南磨坊」鄉的地界，我暗暗想，讓我也能寫出我的「磨坊文札」吧。

2004 年 6 月 2 日

隨筆作為文體，就是作者放任不羈、片斷式的自由記錄；內容上，隨筆是不安分的、嘗試的、探索的，用於記錄日常生活，但更多的是藉以承載思想。也因此，沒有生活及思想上的自由，就沒有隨筆。

在「隨筆六種」中，六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作家——邵燕祥、王得后、趙園、錢滿素、筱敏和林賢治——不約而同圍繞着社會、歷史與時代，回顧中西方極端權力下的歷史歲月及社會現實，反思黑暗的過去，關切人的生存境遇，警惕專制的重臨，揭示自由的非必然。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最血腥殘酷的一頁。邵燕祥以納粹希特拉的大肆焚書、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恐怖血洗屠殺和斯大林治下的極權蘇聯為切入，道出法西斯暴政的殘酷，今天讀來仍然驚心動魄。

希特拉、斯大林都已死，但法西斯並不只是極端民族主義，還意味着專制獨裁、思想禁錮、屠殺、戰爭、毀滅和死亡。在恐怖主義、戰爭仍然威脅平民，極權政治思想依舊以不同面貌出現在人間的今天，足證人仍然犯着同樣的錯誤，生活在奧斯維辛之後的我們仍然面對着法西斯的威脅。

很多人想否定歷史真相，當權者尤甚。但歷史都是曾發生過的事實。以史為鑑，該記住的還應記住。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396-2



9 789629 373962